

工史資料

第七輯



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东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4年6月

目 录

旧地重游

——陪三位日本朋友访问黄河三角洲 … 符 浩(1)

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回忆

…………… 郭春波口述 刘中兴整理(22)

忆李人凤同志在渤海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

建设等工作片断 …………… 崔光炜 崔振华(39)

广博蒲工委和三边政府团结争取社会名流

抗日纪事 …………… 崔茂斋口述 朱青杰整理(49)

一曲人民战争的颂歌

——记抗战中的西南李 …………… 褚洪顺 李存秀(69)

发展经济 支援战争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忆战时广北县合作事业的发展 … 宋立言(83)

广饶盐业发展综述

…………… 宋致公 张广文 古培勇 郭之英(92)

广饶县供销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	常锡银(108)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印钞厂 侯荫南 刘敬石 王级三 李广仁(122)	
广饶农机事业发展概略	梅庆玲(126)
忆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	王政民(142)
革命战争时期垦利县工商管理工 作	赵继良 李永乐(155)
清河区税务工作片断	景 涛(165)
著名工商业家毕鸣岐	戴翩英 罗先哲(173)
延国符事略	延珍卿(183)
鲁青救济分署简介	王经伦(191)
渤海区接收救济物资经过	曲 溪(195)
龙口宝地 厚物载道 ——东营市成立记述	杨玉珍 张月锐(204)
黄河下游南展宽工程	史兴华(235)

旧地重游

——陪三位日本朋友访问黄河三角洲

符 浩

去年（指1992年—编者）是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在这喜庆的时候，我们邀请三位日本老朋友来中国访问。他们除了去上海、杭州、桂林等地参观游览外，主要到山东各地，特别是在战争年月里我们曾一起战斗、同甘共苦时间较长的原山东渤海地区的后方根据地——八大组地区。

他们是松木嘉次郎、中野谦吉和青山耸先生。我与前两位相识是在1942年的春天；与青山初次见面，也只晚一年，算起来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在人生的旅途中是漫长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难忘的脚印，值得珍惜和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松木和中野时，他们两人都是山东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起到江苏东海县的桃林镇向敌军据点喊话。我们第二次见面是时隔一年后的1943年初冬，就在我们这次旧地重游的八大组。为了便于回

忆，我翻阅了当年的日记，现摘抄几段于下：

1943年10月24日 羊角沟外海上 晴

几天来，我懂得了船上的不少东西，什么叫桅、橹、篙、老大、老二（大副、二副）和舵手等。水手们还告诉我许多海上的故事。亲眼看到了活生生的石决明和牡蛎。我坐在船头向远远的岸边了望，汪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大队长告诉我，我们的船队已进入安全区。这儿水浅，敌人的舰只来不了，小的快艇我们可以对付。我乘坐的是一艘较大的双桅渔船，我们海防大队队部就设在这艘船上。有一个班的兵力，船头还有一挺经过伪装的轻机枪。人们把这艘船称之为我们“海军”的“旗舰”，前后还有两艘张帆的“护卫舰”伴行。

下午，船队进入王河口（海边的河汊），约行二十多里路，船抛锚靠岸。我在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海军的基地吧。可茫茫荒野，荆条丛生，什么建筑也没有。我告别大队长和政委及全体同志，并感谢他们从寿光的白浪河口，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胜利地送我到达目的地。

上岸后，我兼程进发，约行五十里滩涂、沙丘小道，四周浑蒙蒙一片，没有树木，更看不到人家。大约午夜时分，到达有几处窝棚和茅草房的刘家屋子。

10月25日 八大组 晴

整整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我既感到兴奋又觉得疲劳，加之海上的两天，虽没有晕船，但却处在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中，也难以好好休息。所以，一觉睡到大天明。

早饭后，一位姓魏的同志带我到八大组鲁北日本人反战同盟驻地，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的赵克修干事（东北人，很精干，又懂日文）在这儿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工作。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新任科长，一见面就叫我科长，特别客气，但却有些拘谨，反使我觉得不好意思。

黄昏时，松木和中野从前方回来了，既惊奇又高兴，笑得合不拢嘴，说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我。他们中的“秀才”中野说，中国有句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这使我想起一年多前的中野沉默寡言，现在也能打趣说笑了。松木是我在滨海时的老战友，想起他初来时的顽固劲儿，怒气冲冲的，一脚把一挺新缴获的九二重机枪踏翻在地，还寻死寻活的，并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真叫人啼笑皆非。现在被推举为反战同盟鲁北支部长，谈笑风生，腰里还挎着一把手枪，真有点派头。可见真理和政策的感召力：变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

我和焦玲同志与来访的三位日本朋友一起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那年冬天。他们随主力部队北上送行时，我们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再见，在新中国。”“再见，在日本。”此后，我们天各一方，但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继续奋斗！

三位日本朋友，在东北解放后，松木先行回国，中野和青山随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广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

战后，我们久别重逢是1977年的秋天。这时我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国大使，焦玲被任命为大使馆参赞。是年8月2日我们由北京飞往东京的途中还在谈论那一年于渤海惠民城与几位日本朋友分手时说过“再见，在日本”。我们和他们这一近乎梦想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没有料到，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几经曲折，我们到任两个多月后才有机会见面（笔者另有文记此事）。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聚会。三位日本朋友结伴也曾三次访华：第一次是应有关部门邀请来华友好访问；第二次是专程来华追悼老首长、抗战时期的渤海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日人称之为慰灵祭；第三次就是这次，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

朋友们每次访华都少不了来济南，他们对济南是熟

悉的。但济南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同全国一样，变化很大，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这次来适值5月上旬，正是“无边光景一时新”的季节。我们下榻于济南南郊千佛山下风景区新建的齐鲁宾馆，更觉增加了几分新意。

几天后，我们和朋友们乘汽车经淄博市到达博兴县城。松木还是日军时曾在此驻过防，欲寻旧迹，却一无所得。

博兴县城，新房、新街道，树木也多是新栽的。虽不象淄博市那样街道宽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对几位日本朋友来说，与50年前比真是面目全非，引起他们很大兴趣，拉我们一起照像留念。

下午，我们一行到达东营市，受到市领导亲切、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款待。三位日本朋友很兴奋，晚餐后，不顾大半天旅途的劳累，也忘记自己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不肯回房间休息。好象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稀有的文化层，对这儿的一切都感兴趣。问的人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回答的人却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有人找来东营市的区域图，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旧时的地名多已不复存在，或者改了新的名称，如垦利县政府所在地，那时还是一个小村庄；又如八大组，现在改为永安镇等。所以只好摊开地图，先找到八大组，当时在

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鲁北地区支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然后再找到周围的几个点：羊角沟、广饶县城、北镇（蒲台县城今已不存）、利津、沾化和义和庄……。三人在琢磨，在议论，突然发现辛镇，高兴地指着地图上的东营市，三人齐声说：对了，对了，1943年冬，日军大“扫荡”时，我们那天晚上摸出重围就是经过东营以东的荒草洼转移到小清河以南的。

接着，大家兴致越来越浓，把话题转到1943年初冬的敌人大“扫荡”上：敌人动用26000人兵力，陆、海、空联合行动，称之为“拉网合围”、“梳篦战术”、“驻屯清剿”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妄图一举摧毁我清河区抗日根据地。三位日本朋友同我们一起经历了敌寇这次兵力最多、时间最长，也是最残酷的一次进攻。经过20多天反“扫荡”斗争，解放同盟的朋友们亲眼看到貌似强大的敌人遭到可耻的失败；亲身体验到军民鱼水情，亲密如一家；军区领导人杨国夫、景晓村、刘其人、袁也烈、徐彬洲等首长机智灵活、神出鬼没的战术；变敌包围我，为我包围敌；充分利用在总体上敌强我弱，在局部敌弱我强的优势。总之敌明我暗，我占天时、地利、人和；敌则孤军作战，草木皆兵，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敌军侵占八大组后，缺水无电，一切供应都要从敌占交通线和主要城市运来，还不断遭到我军游击队、武

工队和民兵的袭扰与破坏。身临其境的日本朋友深有体会，说对他们也是一场有血有肉的教育，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说这是课堂上和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家谈到这里，松木习惯地用拳头轻击自己的脑袋说，初来时顽固大大的，中野则连连点头表示同意。青山咧着嘴笑，想要说什么。松木接着说：“青山君也不例外，但数他进步最快。”这时焦玲在一旁插话，对着青山说：“我还记得1944年春节时，在联欢晚会上，你还登台演戏，在《上冬学》一戏中扮的是王二嫂。”这一回忆使一向寡言微笑、三人中数他年轻、年方70岁的青山终于开了口，说他不仅记得，还能背诵几句台词。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的丈夫前线杀敌人，托人捎来一封信，俺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苦处害死人！”青山的腔调和他那忸怩的表情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夜深了，大家尽兴而散。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八大组（永安镇），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因为我们都是战后第一次回到八大组，寻旧访新，探亲会友，“吊古战场”……。这儿是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们长达四年之久生活、学习、战斗过的地方，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总部所在地。这儿的坑坑洼洼，一草一木他们都熟悉，甚至连哪一口水井的咸味淡一些他们都知道。自从1977年冬我们

恢复联系后，几位日本朋友曾不只一次地说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同我们一起回八大组看看那里的乡亲们，看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之一——突飞猛进的黄河三角洲。

我们先来到新的抗日纪念碑前，使我们顿时想起1943年夏修建的清河区抗日烈士陵园，遭到当年冬天敌人大“扫荡”时的彻底破坏。我们在纪念碑前伫立、默哀，多少烈士的面孔在我们的脑际浮现，热泪不禁夺眶而下。当我们拭去泪痕，回头拟寻旧日驻地时，从街口迎面走来二位老人，一位是白发苍苍、年已84岁的理发员吴增禄老人，另一位是71岁的张继亭，当年的民兵队队长。他们紧紧握住日本朋友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高兴的脸上挂着泪水。我想，这比千言万语更能说明深如渤海、长似黄河的战斗情谊。我触景生情，吟哦了几句，书以赠几位日本朋友，以纪念旧地重游：

五十年前鏖战处，
重逢热泪意如山。
浩浩春风暖大地，
迢迢陆海心相连。

走遍了全镇，但却没有发现旧日的残垣断壁，几位日本朋友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连摄影留念的遗迹也找不到。正在这时，旁边的一位老人拍拍脑袋，眉头一皱说：“过去北海银行的门墙还在。”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院

落，指着院墙上用青砖砌的门拱，原来的门洞已经填满泥块，如不留心是不容易发现的，也很少有人知道是50年前的遗迹了。几位日本朋友经老人一说，又亲自一看，才知道我们现在是来到当年八大组的什么方位。这也许是我们这次八大组之行的最有意义的收获之一。我们遂和当地的几位老朋友、老战友以旧日门墙为背景合影留念。

离开八大组，告别老乡亲，我们在东营市领导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孤东油田。汽车在平直的公路上飞跑，沿途所见：抽油机林立，不断地点头弯腰，人们形象的称之为“磕头机”，四面八方，比比皆是；输油管道纵横交错，通向高大的储存油气的钢罐；沃野平畴，麦浪滚动，亦工亦农，别有天地。

我们来到孤东油田的东部边缘，登上防潮大堤，极目南北，数十里铜墙铁壁把日夜吼叫的潮水挡了回去。车行其上，陆海相间，十分壮观。

经介绍，我们才知道，孤东油田命名的由来。原来她位于当年我们远远望见，而没有到过的河口孤岛的以东，那时还是一片汪洋。大家都赞叹不已。50年来天翻地转，变化之大，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令人难以置信。

在我们返回的途中，路经胜利油田的指挥中心之一的仙河镇，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飞车而过，虽是

浮光掠影，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只有仙鹤栖息的沼泽，如今是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市镇。

我们约定中午到达利津县城休息并与县领导共进午餐。路经垦利县境内的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刺槐林区。据说周围数十里，面积 52000 亩。林深境幽，鸟语花香，蝶舞蜂忙，溪水漾漾，却又是另一番景象。沿路有来自湖北省的养蜂人，带着一箱箱蜜蜂到此采蜜。这使我们感到，这儿不仅成千台机器昼夜开动，百里麦田波光闪闪，还看到自然景观迷人的“世外桃源”。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没有想到。

利津县城，可以说新旧参半。县的党政领导用当地的特产，刀鱼、对虾、苦苦菜拌虾酱，以及佳酿白酒款待我们。这很适合日本朋友的口味，也引起我们对往日的回忆：1944 年初，我们俘虏了一名日军飞行员，年仅 21 岁，名叫山田敬马。他驾驶一架战斗机，由青岛基地起飞作练习飞行。因方向舵失灵，被迫降落于潍县以北海滨瓦城附近，被当地我民兵俘获。当送到军区时，他的一双手还包扎着。我问他手是怎样受伤的？山田说，被民兵包围后，他为了吓退民兵，就用随身带的刀锥，用力锥握在手里的机枪子弹的引火帽炸伤的，真是滑稽可笑。当我对山田讲述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日本士兵为日本军国主义、财阀、军阀卖命时，他很反感，就写了

“骂人不君子”几个汉字递给我。就是这个山田，在反战同盟的帮助下，觉悟较快。几个月后，当领导同意济南日军指挥部提出的如我放回山田，他们愿意放回被其捕去的我清河区公安局长李震和我临淄县长李铁峰等人。一切都谈妥了，二李已被押到利津县城。敌人要二李联名写一封信给军区首长，以此要我们相信他们的诚意。并传话说，准备随时交换。

二李的信很简短，但其赤胆忠心跃然纸上。信的大意是：不知何故，敌人突然押送我们到利津，请组织和首长相信，我们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后来区党委还为二李被捕后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通报表扬。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却吃尽了苦头。

事到临头，我们才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同山田谈开，以为他会高兴的，但开始却被他严词拒绝，说我们把他往火坑里推。经过反复说服，并告诉他，是他在关东军的舅父托济南日军司令派人来说项的。他的回去还会换回我方的几位重要干部，这也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时，山田才勉强同意。

后来，青山君告诉我，他一回到日本，就到山田的家乡长野县去探望，可悲的事实使他大失所望。原来山田被送回国后，经过“洗脑筋”，又被派到马来西亚前线，据山田的叔父说，不久就阵亡了。

抗战期间，有关利津和垦利的故事一长串。上面我已谈了山田敬马换二李的概要，下面再谈几句捉放竹田大尉的故事：1944年的8月中旬，我军一举扫清了利津城外围的几个伪军据点，守敌被我全歼。这时我军兵临城下，敌伪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身为伪利津县顾问并兼任伪华北治安军二十七团教导官的竹田大尉，却躲在北平享福作乐。据竹田告诉我，他知道利津危在旦夕，不愿意回来，可上级限令他立即回利津，否则以失职论处。由此看来，他是硬着头皮，冒死返回利津的。果然不出所料：竹田乘坐一辆大卡车，由全副武装的五名伪军护送，车上还架着一挺显眼的旧式水压重机枪，表面上装得威风凛凛，实则胆战心惊。当竹田的坐车由济南行至博（兴）蒲（台）公路中段时，中了我博兴县一区区中队的埋伏，竹田大尉和伪军被我全部活捉。竹田大尉被送到军区，他的头上还裹着绷带。我问他是怎么负伤的？竹田两眼瞪着我说：“你们口口声声说优待俘虏，但做的跟说的不一样。”竹田没有等我问个明白，接着指着他的头说：“这是我被俘后，被你们打伤的。”旁边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连忙解释：竹田讲的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应具体分析。战斗结束后，回到根据地，天色已晚，在村外一个场院里暂息，也好找点水喝。就是在这时，村里人传开了：区中队活捉了一个鬼子“太

君”，都来场院里围着看。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还不到学龄的儿童，捡起一块瓦片，悄悄地挤进人群，猛的向竹田的头部扔去，还真准，就这样打伤的。同时，由翻译翻译成日语给竹田听。竹田没有再发怒，低下头也再没有说什么。随后，我说，这件事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很值得你深思，为什么一个三尺孩童对日本侵略者如此仇恨？竹田面无表情，也一言不发。我安排他好好休息几天，把伤养好。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过几天我们再谈。

竹田大尉年近 60 岁，是个老军务，说句不好听的是个老兵油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中混了一辈子，老于世故，不象其他日军官兵，俘虏后那么顽固。经反战同盟的朋友进行工作，竹田主动要求参加该组织。反战同盟鲁北支部考虑到竹田才来不久，又是个军官，对他的要求表示欢迎，希望他继续努力，相信会达到目的的。就这样被拒之门外。后来，经与反战同盟反复研究，权衡利弊，以及竹田的思想情况，认为放他回去会在日军下层军官中产生好的影响，就决定送他回去。

当我们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为竹田饯行时，他表现得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喝了几杯酒后，涨红着脸，说他回去吉凶难卜，不禁潸然泪下。

松木、中野、青山他们都说始终没有打听到竹田的

下落。

我们知道竹田是日本山形县人。我们在日本工作期间，曾几次到山形县访问，也没有打听到竹田大尉的归宿。

我们和几位日本朋友曾议论过：毕竟竹田不比山田，很可能出乎我们预料，回到日军后以“瓦全”之罪被处决。

利津和垦利县先是清河区，后来是渤海区根据地的中心。利津城也是我军反攻时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利津人民和整个解放区人民一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我们同几位日本朋友利津之行，虽是来去匆匆，但感触良深。看到各方面建设欣欣向荣，人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使我们更加想起这儿的老乡亲、老战友和当年的老首长们。下面谨录杨国夫司令在他的遗著《战斗在清河平原》一书中对1944年8月17日攻克利津县城，全歼敌伪军，人民欢迎子弟兵时一段描绘，以资深切的怀念：

利津县城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子弟兵进城，他们扫街平路，出城二里多路迎接我军。有些小学生一天没吃饭，跑出八里多路，争着给我军扛枪。欢迎的群众载歌载舞，一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笙、笛、唢呐齐奏，场面十

分热烈，城里的商业界还自动捐献巨款，支持我军。

告别利津，我们抵达滨州市。

滨州市，解放前是惠民地区滨县的一个小镇，现在是滨州地区的中心城市。环境十分幽美，大河长堤、湖光树色，新房栉比，街衢整洁……。前几年，又在黄河上修建了一座大桥，势压滔滔巨浪东去，沟通南北交流不息，这无疑给新兴的滨州市增加了活力。

我们到达滨州市政府和市的负责同志会见时，在座的有曾经担任过地区副专员的刘之申同志。之申同志紧紧握住松木先生的手说：“还记得吗？52年前，我们在寿光北部初次见面，是我送你到分区的。”松木愣了一下，猛地说：“记起了，记起了！啊！刘队长。”还是老习惯，用拳头轻击自己的脑袋说：“顽固大大的……。”大家都为他们的久别重逢鼓掌。

离开市政府，由之申夫妇和当地几位负责人陪同我们一行人来到黄河大桥西侧的道旭渡口，我们遍寻昔日战斗过的地方，但连个残砖碎瓦也没有找到。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留连，只好回到桥头合影留念，并辞别滨州市和这儿的朋友们。

在回济南的路上，我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回想1945年6月上旬发起的以收复蒲台县城为中心的蒲（台）滨（县）战役。军区首长杨国夫、刘其人、周贯五、

袁也烈等亲临前线与广大军民奋战的日日夜夜。战役开始，首先扫清蒲台城外围的小营、玉皇堂、道旭等据点。特别是在攻克道旭据点战斗中我军英勇善战，杀敌陷阵的壮烈场面，我每每想起，都要沉思良久，激起对战友们无尽的怀念！

道旭据点位于黄河南岸大堤上，博（兴）蒲（台）公路边，既扼交通要道，又是蒲台的门户。日军一个排的兵力，凭藉坚固的碉堡和岗楼长期驻守，并不断骚扰附近的村民。

坐在我旁边的松木一语不发，似在闭目养神，又好象在想什么。我用手臂撞了他一下说：“松木君，你在想什么？”松木毫不思索地说：“我在想那天的战斗。你记得吗？那天我们和杨司令在一起。”说着他又合上了眼睛。此时，我想大概他和我一样不肯中断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道旭战斗：

以往，我军攻击日军据点总是利用青纱帐，或是多在夜幕笼罩的晚间，这次却一反寻常，不仅在麦收刚过的6月上旬，而且是烈日当空的白昼。很显然，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的第三个阶段——我军反攻阶段的帷幕正在缓缓拉开。

那天，我们随部队以道旭东面河堤上的民房为掩护

向敌据点靠近，杨司令的指挥所就在我们近旁，大约距敌碉堡百米之遥。我和反战同盟的几位朋友选好了一个掩体开始向敌人喊话。当松木喊了几句，大意是据点已被八路军包围，死守待援没有希望，八路军优待俘虏，赶快投降等等。但招来的却是一阵阵密集的机枪子弹，“噗噗”地落在我们周围。接着中野从松木手里接过话筒继续喊话。为了压过敌人的枪声，他提高了嗓门使劲地现身说法，可招来的不仅是机枪弹，而且还有掷弹筒弹打在我们的近旁。这时杨司令一声命令，我军的迫击炮、掷弹筒一齐轰鸣，轻重机枪集中向敌碉堡火力点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的火力被我压下去了，趁敌人转移火力点的瞬间，班长李志业同志第一个跳出掩体，带领突击组迅猛如飞般地冲到敌据点的墙边。敌人见势不妙，作垂死挣扎，发起突然反击。我突击组除李志业班长抢先一步，已冲到敌碉堡的转角处，没有被敌人发觉，其他同志在我火力掩护下被迫撤回。这些，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都为李志业的勇敢机智所感动，也为他着急。就在这紧急关头，杨司令一面指挥我军集中火力掩护，一面要我接过话筒向李志业同志喊话，提醒他注意敌人突围，并告诉他在他紧贴的房屋顶上有敌人。我们亲眼看到李志业同志只身冲入敌阵，距敌咫尺，在敌猛烈的火力面前沉着、从容，毫不畏惧，并机智地利用

地形和敌人的火力死角，以及不断挥手示意与进攻部队相呼应，还不断地往敌人房顶上扔手榴弹，使敌人不再敢利用屋顶向我射击，也使敌人搞不清其碉堡外面究竟有多少我军。这就有力地配合了我突击队再一次向敌人发起冲击。敌据点的东门在枪炮声和我军喊杀声中被炸开。李志业同志率领突击组，在硝烟弥漫中杀进敌穴，与守敌展开肉搏战，守敌被我全歼。

当我们快要回到济南时，松木突然关切地问我李志业同志后来的情况。我们告诉他，李志业同志后来在多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是渤海全区著名的战斗英雄，不幸于1946年济阳战斗中英勇牺牲。渤海军区追授他为特级战斗英雄，并命名他所在的排为“志业排”，以资永远纪念。

松木先生听后，又是闭目不语。此刻，我在想，他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我们陪同三位日本朋友来到山东旧地重游，快要结束了。朋友们还要到我国南方几个城市继续访问。我由于本月下旬参加一个代表团赴日访问，也要回北京做准备，因而我们只好在此分手。

5月13日，用过早餐，我们就在餐厅旁的休息间话别。我们都想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以概括我们这次寻旧访新的印象、观感和依依不舍之情。松木首先满怀深

情地说：“几年来北京和山东变化之大令人刮目相看。”并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中野插话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松木让中野继续讲下去。青山和松木夫人也点头以示赞成。看样子中野胸有成竹，似乎他们是商量好的。中野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发生变化最大的，莫过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因为我们熟悉它的过去。昔日纵横数百里滩涂、泥洼、荆条遍野的荒草原，水鸟天堂，狐兔出没的地方，今日已建成中国第二大石油基地；良田、牧场、人造森林、水产养殖等，无不生气勃勃；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人们说，黄河三角洲继长江、珠江三角洲悄然崛起，我们深信不疑。”

几位日本朋友对旧地新貌感触颇多，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对此行感到十分满意，如果说有所不足的话，只是嫌时间短了些。我们表示，在他们方便的时候，欢迎再来。中野和青山欣然说，相信一定有机会再来。可松木却想了一想笑着说，希望能如愿以偿。我们完全理解松木先生的心情。因他不仅年逾古稀，且因患胃病，几年前还动过手术，医生嘱咐他在家静养，不宜出远门，但他这次还是到中国来了。

与朋友临别一席话，却引起我的遐思和一段回忆：我于战争年代，在当时称之为渤海区的这个地区整整待了六个年头，足迹踏遍了黄河两岸。这里的人民是勤劳的，

纯朴的，祖祖辈辈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吃饱、穿暖。可是，人们这个起码的愿望，随着滔滔的黄河水，一代一代的石沉大海。

中华文明五千年，黄河入海口地区虽有渔盐之利，齐桓之治，但千百年来，始终也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才有今天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面对今天的现实，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43年冬日日军大“扫荡”时，一方面，迫于形势，我们科也化整为零；另一方面，为了深入敌区，利用两面政权向敌占据点和敌伪控制区开展工作，我被地方党派人于深夜送到离滨县城十里路的十里铺村。我们进村时引起一阵犬吠声。我们叩开村长的门，老汉既亲切又热情，煮茶烧炕，吩咐老伴准备早饭。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让我等着他回来一起吃了饭再休息。说完他就出去了。又是一阵犬吠，并听到老汉大声吆喝的声音。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我猜想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以掩盖我进村时夜深人静发生的“情况”。

我们一起用过饭，东方已麻麻发亮。老汉要我先好好睡上一觉，等他回来再商量工作。我问他到何处去？他说到县里新民会去报告。我急着想知道报告什么？老汉抢着说：“请同志放心，我正是考虑到安全，才一早进城

……。”

午饭时，村长回来了，告诉我他到新民会向鬼子顾问报告的情况：昨夜本村和邻村的狗叫，他到村外察看，八路军大大的，由北向南朝黄河滩方向走去。鬼子问有多少八路军？村长说，不敢接近，看不清，只听到脚步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鬼子听了很高兴，竖起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

我在十里铺村长家住了几天，同村长和秘密游击小组的同志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收获不少。尔后，我转移到附近一个叫秦台的村庄。村子里还残存一土台，相传是秦始皇东巡时，从琅琊到碣石山路过此地，曾筑台观海的地方。我认为这不无道理：从地理上看，由琅琊到碣石，当时这儿濒临大海，是必经之路；从历史变迁来看，尽管两千多年来黄河曾数次改道，但主要还是流经这儿入海。若以现在每年淤积造田 36000 亩的速度推算，说当时的海岸线就在这里，也绝非是神话传奇。如此说来，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登台观海，望洋兴叹；而今天，沧海桑田，富饶的黄河三角洲正以腾飞之势在崛起，象一颗璀璨的明珠，将为中华大地增光添彩。

（转载自《垦利文史资料》第五辑）

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回忆

郭春波口述 刘中兴整理

在艰苦漫长的 8 年抗日战争中，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是我党、政、军、民的根本任务之一，也是我军对敌开展强大攻势的主要内容。为此，我根据地广大军民通过各种渠道、关系和手段，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

1942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日伪顽狼狽为奸，到处烧杀抢掠，频繁扫荡，广大群众痛苦不堪。这时，我在清东军分区搞敌工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又调我去清中军分区（辖广饶、博兴、临淄、蒲台四县）工作。军分区司令员是马千里同志，这时军分区的根据地只有广北县略大一点，其他县受我控制的只是几块小片地区。广饶、博兴的敌伪军沿小清河南岸，在金家桥、利城、石村、尚道等村修筑了据点，凭借着小清河的天然屏障，严密封锁我根据地的南北交通，并经常派遣特务队（群众称之为“拉鸡队”）到我根据地边缘地区抢粮、抓人，群

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以来，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和开辟小清河两岸的敌区工作，就成为当时清中军分区最紧迫的任务。

军分区首长曾多次指示：作敌工工作的同志要全力以赴向敌伪内部开展政治攻势，千方百计突破其对小清河的封锁。我们也曾多次作过突破的尝试，但均因敌伪炮楼林立，我们又缺乏实际经验，当时当地群众基础较差，工作人员和武工队员食宿困难等原因都未成功。迫切需要我们抓紧时机，迅速创造条件，打开局面。

马司令员巧施计 突破敌人封锁线

1943年2月，军分区司令部通知我去领受任务，我立即到了司令部，马千里司令员已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刚坐下，他就对我说：“博兴县公安局把博兴五区伪区长戴长俭抓来了。我知道此人的底细，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要杀他还不够刀，要放他回去又便宜了他。他这个伪区长完全是被人利用，他本人没有什么能力，也不会有很大民愤，只是广博一带的‘青红帮’（三番子，又称安清道义会）头子。这个会道门在敌区非常普遍。敌人能利用他。我们也可以利用他，我看把戴长俭交给你们，利用他进行统战，开展小清河南敌占区的工作，会有用处的。”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马司令命公安局把戴长俭交

给了我们。

戴长俭被我捕获后，在公安局已关押了不少日子。因那时驻地不断转换，多是夜间行动，受跋涉劳累之苦，戴的眼睛有些红肿，几乎要失明的样子。一见到我们，他惊喜交加。我派一名武工队员侍候他，另派一名敌工干事张寿堂同志陪伴，对他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并请医生为他治疗眼疾。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戴的眼疾很快就好了。戴由畏惧转到感激，精神状态大有好转。我们便向他布置任务，他在感激之余，表示愉快地接受。这时，我派人给戴的顶门徒（收的第一个徒弟）梨园村张奎三及其村长许兰亭送去信，要他前来把戴长俭接回梨园村。他二人见信的第二天就来了。当他看到戴长俭食宿倍受优待，精神很好，都非常高兴和满意，连声感谢共产党的政策好。尤其是张奎三被感动得声泪俱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

1. 戴长俭回去后不能再干伪区长了；
2. 这次派我工作人员张寿堂和你们同去，你们要协助他做好金家桥、利城两个炮楼上伪军的工作，使我们往返小清河交通无阻；
3. 若有我小部队住进梨园村，要给以安全和食宿方便。

戴长俭首先说：“放心吧！这次八路军教育了我，挽

救了我，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从内心里感谢八路军，感谢马千里司令员，感谢你们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一定尽我的微薄力量，做点对抗战有益的事。用实际行动，弥补我的罪责”。许兰亭、张奎三都说：“派张同志和我们回去，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保证其安全。不瞒你们说，五区虽是敌区，但人人知道八路军纪律严明政策好，深得群众拥护，况且各村村长都是戴的徒弟，各个炮楼上也都有在会的，张同志去就住在‘安清道义会’的房子里，我们保证他绝对安全”。许兰亭还说：“只要你们的人去找我这当村长的，保证他们有吃有住”。饭后告别，他们4人便一同上了路。

半月之后，张寿堂同志来汇报工作，并带来了一位广饶五区大相村的爱国青年逯福东（该同志后被派驻梨园村，做了大量的对敌统战工作）。半个月的工作，收获很大，主要是伪军把持的广、博边界上的金家桥交通要道被我们打通了。上至伪军中队长柳雁宾，下到管小清河摆渡的高××都和我们建立了关系。当时我广北根据地通往鲁南的联络线，是由这里过河经过利城、戴家、小张南去的必经之路，路两边敌人碉堡林立，群众称“一枪打透了的”根据地。打通这条线路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随时来往于小清河的南北了。梨园和利城都是千多户人家的大村，参加“青红帮”的人很多，许多

头面人物都由张奎三介绍给张寿堂了。以这两个村为基地，逐渐向外扩展。这里的群众听说八路军过河而兴高采烈，敌伪军则闻风丧胆。例如：程金榜（天津市人）随其叔父博兴县伪县长程连甲，来博兴当了利城镇伪据点的中队长后，倚仗其叔父的势力，抢粮逼款，关押群众，无恶不作。伪据点中的汉奸共六、七十人，戴长俭的徒弟张立本，是利城街上有名的蒸馒头户，伪据点内每天由张立本供应馒头 200 余斤。有一天我们对张立本进行了教育，要他到据点送馒头时，抓紧时机对伪军恫吓施压，进行宣传。张立本言听计从，对程金榜说：“程队长，今后我不能给你们送馒头了，八路军晚上经常在村里活动，昨天晚上就来了百十号人，他们说给汉奸送馒头就是汉奸，我实在不敢再送了”。程听后吓得脸色苍白，呆了一会儿说：“求求你和他…们（指八路军）说说好话，我们是奉命驻防，从今后不做坏事，不欺压群众，你看怎样？”张立本回来对大家说：“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汉奸，一听说八路就吓得脸色变黄，说话也结巴了……”。此后不久，据点中的两个班长——张学孔和姚三元，通过张立本和我们建立了关系，经常向我们汇报情况，接受我们的任务也很坚决。

1943 年我军向敌人展开秋季攻势，我们事先向张学孔交待了任务：当我包围利城伪据点时，程金榜若出来

巡视指挥，就见机行事，把他当场击毙，并号召其他人投降。后来，果然是按照我们的计划，里应外合，解放了利城据点，俘伪军 72 人。

打人保安团 策反陈瑞水

伪十六旅一团李青山部，1940 年投降日寇后，被编为广饶警备二团，（亦称广饶保安团），下设四个营，一营营长先是刘家祥，后是燕寿才；二营营长崔桂祥；三营营长徐金刚；特务营营长陈瑞水。当时的清河军区领导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向靠我边区的伪军开展统战工作。先由军区敌工科派桑林祥（后为孟邦杰）做燕寿才的统战工作，我负责活动于广饶五区的陈瑞水营的统战工作。

陈瑞水，原籍菏泽，黄泛时逃到广饶县石村落户。石村附近的东关村，有一商人刘好英，和陈瑞水交往密切，并拜为金兰兄弟。“七·七”事变后，李寰秋以抗日名义成立了保安十六旅，但下属各部独树一帜各行其是，横征暴敛无恶不作。陈瑞水投到十六旅一团李青山部，积极为李青山摇旗呐喊，得到李青山的青睐。李青山投降日寇后，在毛王安了据点，封陈瑞水为特务营长，和李青山之内弟崔桂祥营据守毛王庄，保护李青山的团部。

李青山部的军需，除日军供应外，多数由各区征收。如一营燕寿才由广饶四区供给，陈瑞水则由广饶五区征

收。陈瑞水在五区有一个以崔开吉为头子的 30 多人的特务队，专管征收任务。崔是博兴县蔡家村人，其叔父是本村伪村长，也是戴长俭的徒弟。张寿堂同志通过戴和崔的叔父，与崔开吉也建立了联系，但此事对陈瑞水是绝对保密的。

我们对广饶五区大相村的进步青年逯福东同志进行训练后，将他派回原籍，负责联络站工作，以经商为名，往来于广、博间，专门物色线索，开展敌区工作，成绩比较显著。1943 年 2 月，逯福东之友刘好英到逯家拜访，因他二人自幼在北平一油店共事，交往甚厚，两人相见万分钟情，畅所欲言无话不讲，随即谈起生意经，谈论解放区与敌占区的生意怎样做法，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最后刘好英谈到陈瑞水愿和八路军建立联系一事，并问逯在解放区有无熟人，能否给牵个线？逯知刘是陈瑞水的拜交兄弟，在此重要问题上还是谨慎为是，还不能直接敞开。便有意的说：“我们这一带有很多八路的人，可惜我不认识他们，我注意打听一下再说。”逯接着问道：“陈营长住在毛王，和八路军联系有啥好处”？刘说：“上次陈瑞水来石村看他母亲，派人把我找去，托我寻找和八路军有关系的可靠的人，想和八路军的杨国夫司令取得联系。”我问他‘和八路联系有何打算’？他说：‘八路军的势力一天一天地扩大，燕寿才为了保存自己，早和

他们（指八路军）通气了，我为什么不找条后路呢？”逯福东听后说：“我尽力而为吧。”话毕各自散去。

几天之后，逯福东回到清中军分区政治处，向李焕主任和我汇报工作，其中谈到陈瑞水愿和八路军联系一事。我们感到此事较为重大，便同程绪润司令员和张文涛政委（此时马千里司令和王效禹政委已调离清中）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派我直接和陈瑞水面谈，并研究了向陈提出如下条件：

1. 在配合日兵扫荡时，不要伤害群众，禁止特务队到我边缘地区抢粮拉人，破坏农业生产；
2. 日兵对我根据地有大的扫荡时，要迅速派人送出情报；
3. 在陈的管辖区内，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
4. 对抗日救国确有贡献的，人民政府和八路军武装部队，保证其生命财产及其家属的安全。

最后程司令员说：“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广饶县城是敌人威胁我根据地的主要集结点，如果打通我根据地到广饶县城这条走廊，建立一条稳定可靠的情报线，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分区首长的指示，我们向逯福东同志部署了任务及工作方法，要他早日回敌占区，通过刘好英同陈瑞水商谈与八路军代表会谈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并随时

通告我们。

逯福东同志遵照我们的安排回了敌占区。约半个月左右，张寿堂同志便星夜赶回军分区向我们汇报，说和陈瑞水商量后，决定3月25日上午9点在小相村学校内会见我方代表。我当即向政治处主任李焕同志作了汇报。李说时间紧迫，叫我作好充分准备，按期前往，由他向司令、政委说明此事。

奉命深入敌占区 批驳“曲线救国”论

第二天（3月24日）上午，我由张寿堂同志陪同，便踏上了通往敌占区的路程，当天到了梨园村。在村民尹廷梓家住了一夜，次日上午8点前逯福东来接我到了刘好英家。上午9点，我们三人一同到了小相村。在村头上我们看到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说明陈瑞水已早到了。我们进了小学校教室，果然有两位军官在等候，不久陈瑞水也到了，刘好英做了介绍，彼此寒暄之后，陈瑞水说：“我很钦佩八路军抗战救国精神，早想和八路军取得联系，但无适当门路，今天由逯先生介绍能和郭先生见面，十分幸运。”他接着说：“我是个老粗，不会说话。所以，今天约我的陈营副（副营长陈福清）同来，他也是上过中学的读书人，由他谈谈我们的意见和情况。”接着就是陈营副的大篇所谓“曲线救国论”。并说：“我们走

的路线不同，目的都是为了抗日救国……。”闻之令人作呕，但他却滔滔不绝的讲着。我抬头看到小学南边的围墙上，有十几名伪军，向前面摆开3挺歪把子机枪，很显然，这是陈瑞水在我们面前炫耀他的威风和力量。好不容易等到那位陈营副讲完，我便重点地、客气地反驳了“曲线救国”的错误思想及其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然后，根据军分区首长的4点指示精神，详述了我们的要求条件。他们听了之后，极为赞赏，并表示坚决做到。但也作了些解释：如对我边缘区抢粮拉人一事，他们说特务队很多，只管了本营的，其他营他们管不了等等。并再三询问杨司令对此事的态度。从各方面看来，他们最关心的是怀疑我是不是杨司令的人，能不能见到杨司令。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保证回到解放区后，就将这次会面一事向杨司令汇报。

和陈瑞水会谈之后，各自回防。通过一段观察，敌特在我边区的活动明显减少。刘好英以陈营副官名义，长期住在毛王村，不定期地向我驻梨园工作人员报告一些敌伪军活动情况，我们在广饶五区的武工队可以开展工作了。例如可以到广饶西关散发宣传品，给五区伪区长宁××家中送教育争取信，到石村敌据点维持会作宣传教育工作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戴长俭的徒弟李根臣争取了

石村日军翻译王郁文。武工队夜里可到日伪据点周围打枪震慑敌人。还叫王郁文向日兵大谈八路军神出鬼没、太厉害等情况，吓得日兵不敢擅自出来胡作非为。

和陈瑞水建立关系后，我向清河军区敌工科科长符浩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在当年四、五月间，陈瑞水派刘好英由逯福东陪同一起到我根据地来，带了些汽水之类的东西，说是来看望杨国夫司令员。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是探试他同我们建立关系一事杨司令员是否知道。我将刘、逯带到军分区政治部（时驻广北刘家营）敌工科，和杨司令联系后，于当天下午3点，杨司令接见了刘、逯，并对陈瑞水谈了些鼓励的话。刘好英非常满意的回去了。

二人敌占区 营救宋彩云

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原清中军分区与清东军分区合并为渤海第五军分区，辖昌、潍、寿、广、博等县，赵寄舟为司令员，岳拙园为政治委员，丁士采为政治部主任，调我为敌工股长。当年七、八月间，军区政治部给分区政治部主任丁士采一信称：军区话剧团演员宋熙（女，号彩云）同志，被陈瑞水的特务队捕去，要我分区设法营救。丁士采主任令我亲自办理此事。我再入敌占区，渡过小清河到梨园村，

与逯、刘两人商谈此事。要他们转告陈瑞水迅速将宋熙释放，我在梨园等候消息。两天以后，刘好英来说：“确有此事，但宋熙早被释放，现在住自己家（广饶城里宋家胡同）中，住几天就会回去，并没有受到关押。”对刘的上述谈话，我确信无疑，我回到解放区后，先到军区敌工科向符浩科长作了汇报，然后回到分区。一个月之后，宋熙仍未回来。军区又来函催办，我又南去敌占区梨园村，找来刘好英催办此事。刘好英回去两天，又来我处说：“陈营长再三表明说宋熙非他所押，但愿协助宋熙脱离敌区。”我回来后，大约半月左右，宋熙果然回到了根据地。

利用张梓甫，建立联络站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军妄图以“三光”政策，来扑灭我军民的抗日火焰。在我广北根据地扫荡后，还在北隋、车李、周楼等村设了据点。面对险恶局面，我军分区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反边”战术。当年7月，程绪润司令员和孙干卿参谋长，要我协助参谋处二股，建立一条广饶城到我根据地的情报线，以便专门掌握日兵在广城大量集结，扫荡我根据地的情报。由于我们和陈瑞水已建立了联系，广城至梨园的信息来往已基本解决，只待物色适当人选，最大困难是扎根何处，

如何解决情报的来源问题。

经过和逯福东同志商量，问题有了眉目。逯说：“有一个人叫张梓甫，年近古稀，博兴利城镇人，早年干过土匪头目，外号叫‘狷虎老九’在当地颇有名气。他那伙人不在近处作案，专吃远处大财主。后来钱多了，跑到北平和同乡们做起了生意，并在北平安家落户，婚后生四男二女。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兵来了，他生意不能做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生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已而求助于老友广饶保安团长李青山，才由北平迁到广城西关居住。我在北平卖油时，和张时有来往，张迁到广饶西关后，我每逢西关大集常去张家走走，在和张的谈话中，知张对八路军艰苦抗战和英勇奋斗精神，甚感钦佩。但因张已年迈，又加历史复杂，对抗战救国一事从未深谈”。逯说：“张梓甫若愿为抗战救国出力，他的情报来源是很多的。（一）其长女震西，每日在日本宪兵队教华语；（二）次男震南，年方十六，思想进步，城里西关都能活动；（三）侄儿张麻子（名字忘却了）是驻广城日军的翻译官，虽是铁杆汉奸，有其叔父的关系，但也可以利用；（四）张梓甫本人友人多，只要他留心工作，情报极易到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其本人，只要他本人心甘情愿担当这一任务，就可以说百事大吉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程司令和张政委汇报时，张政委说：

“我看可以用他，我知道张梓甫这个人是个足智多谋、有情义的人。我过去也听说过他不少故事。必要时请他来一趟，我和他谈谈”。程也同意张的看法。

我将军分区首长的指示，向逯福东同志作了传达，并请他抓紧时间工作，以单刀直入的方式，突破张梓甫。逯按上述精神，对张进行了工作。果然，效果很好。张不仅慨然应允，而且还说：“为了国家，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是应该为抗战出力的”。

张梓甫对张政委要他访问解放区的邀请，极感兴趣。他来访的日期确定后，为引起他的重视，我军开往靠小清河北岸最大的龙注河村。这天上午张梓甫由他儿子张震南用小推车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张政委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程司令陪同一起吃了午饭，在交谈期间赞扬了他的救国热情，并鼓励他为抗日救国立功，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在与首长接谈和往返的路途中，他看到军分区首长平易近人，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军队纪律严明，他与儿子很受启发教育。住了两天，临别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情报来源解决了，接着就是情报的传递问题。经研究，广饶至梨园一线由逯福林、许梅冬担任，必要时张震南直送梨园。梨园村至根据地一线由王兆欣负责，必要时尹廷梓出马。

这条情报线自建立起，情报都比较及时准确。例如1943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收到广城送来的情报，内容是：在一天之内，从辛店车站开来广城汽车百余辆，战马数十匹，并运来日兵千余人。当晚又收到博兴、蒲台等地情报，均说有较多数量的增兵。军分区首长据此分析断定，敌人要合围清中根据地。便立即通知地方政府，动员群众，作好应付敌人扫荡的准备。随之，我武装部队化整为零，当夜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程司令和李主任带领的武装，很顺利地转移到了小清河南敌占区。不料下午5点左右，我便衣警卫来报：日军汽车向我驻地开来，程司令下令隐蔽好，不被发现不准开枪，准备拼刺刀！不多时，20多辆满载日兵的汽车，从村内疾驶而过，开向索镇方向去了。

这次扫荡，敌人采取了“拉网合击的战术，最后收缩于博兴六区辛集镇。敌人将捕来的青年男女，驱赶到康家坊前的广场，要他们排队坐在地上，两旁用高粱秸燃起大火，看谁不顺眼，就把谁绑起来丢到火里烧死。其中有一个青年被丢进火里，绳子烧断了，他从火里跳出来，猛然夺了日兵一支枪，打死两个日兵后，又被日兵枪杀了。被捕的人对他这种英勇行动，深感钦佩。

情报工作要求具备“及时”、“准确”两大要素。广城情报站建立后，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当年12月的

一个晚上，广城有一重要情报送到梨园尹廷梓家，又加天气寒冷，此时无人送往小清河北。年近花甲的尹廷梓，决定亲自出马。这时小清河已封冻，可从冰上往来。不料，这天金家桥炮楼的汉奸，为防止夜晚偷渡，在河中间打开了一个十多米长的冰洞，尹不慎掉进了冰洞中，幸而水浅只把棉裤淹湿了。他好不容易爬上北岸，迅速将棉裤脱下，挤去水又穿好，撒腿就向三里路远的龙注河村跑去。当跑到村头时，棉裤已如铁裤，实在走不动了，只得爬行，爬到一家大门底下，天近午夜了。好不容易叫开门，说明了情况。这家主人将尹抬到家中，用火给他烤化了裤上的冰，又将情报托人送到马家。第二天将尹廷梓送到军分区医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最后只得切除了六个冻坏脚趾，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1944年2月，我常驻寿光县牛头镇一带，广饶县的对敌统战工作仍由我们负责。联络站的逯福东同志每月都到军分区汇报工作。广饶城至梨园的情报线一直畅通无阻，成绩显著。同年12月下旬，逯福东又来汇报工作时，说逯福林已失踪半月多了。我们得此消息都十分忧虑。一个月之后，发现离石村日军不远的小清河一个冰洞中，用麻袋装着一个人的尸体，他就是逯福林同志（后政府追任其为烈士）。

经过分析，我们断定惨杀逯福林同志的凶手就是陈

瑞水及其特务队长崔开吉等人。他们与我八路军建立关系，并不是真心实意，而是脚踏两只船，想在必要的时候找条出路罢了。广饶解放后，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凶手，都被我人民政府处决了，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广饶县政协供稿)

忆李人凤同志在渤海区加强抗日 民主政权建设等项工作的片断

崔光炜 崔振华

渤海区抗日根据地，是1944年初由清河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合并而成，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五大战略区之一。该区地处平原，人民强悍且富有民族气节，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1932年，博兴县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过革命暴动。“七·七”事变后，我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时任临淄西关小学校长的李人凤在共产党员李曦晨同志的帮助下，建立了“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此部后编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

抗战初期，李人凤同志曾任三支队第十团团长、三支队副司令员等职。1940年起，李人凤同志开始从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曾任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清河区行政公署主任、渤海区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等职。李人凤同志自负责民主政权工作后，严肃认真地贯彻党的

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把握政府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三三”制，坚持民主建设，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抗日的民主力量。虽然政权工作是一项新的、生疏的、又是复杂的工作，但是他有毅力、有信心、有办法，结合渤海区的具体情况，工作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渤海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加强抗日政权的建设

渤海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早在1939年7月就开始了。首先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是临淄县。随即邹平、长山、桓台等县也相继成立了抗日政府。至1940年5月，清河区成立了行政专员公署，李人凤同志为专员。

抗日民主政府，是各抗日阶级联合的“三三”制政权机构，代表着各个抗日阶级的利益，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在政权领导机构内，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目的是在保证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

上层抗日民主政权机构建立以后，为了更好地贯彻民主建政的方针和政府的各项法令，基层政权的改造是

重要的一环。李人凤同志非常重视此项工作，他把村政权看作是我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亲自领导了对乡村政权的改造工作。

在开展抗日斗争、铲除伪政权的过程中，旧政府中的一些明显的坏人，如汉奸、恶霸、伪保长等大都跑掉了，也有少数隐蔽下来，直接或间接地操纵村政。另外，贪赃枉法、欺压群众的行为，在一些村政中严重地存在着。在这些“坏人掌权，好人受气”的村庄内，民主政权的政策法规难以贯彻，严重影响抗日斗争的发展，根据地也难以巩固。李人凤同志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地开展了改造村政权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记载，仅在1943年上半年，就改造了村政权32个，整顿了50多个。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党和抗日政府更加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实行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

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抗战，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实行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政策，目的在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抗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减租减息，既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适当地改

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使农民有力进行再生产；同时也保证了地主的财权，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或者争取在抗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民主政府保证减租减息，也保证交租交息。

李人凤同志生长在人民群众之中，深知农民的苦难，非常重视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他积极参加了对“双减”工作的领导。行署机关也组成驻地工作组，每到一地，就抓所在村镇的“双减”工作。李人凤同志常常亲自听取汇报，进行指导。据记载，在清河区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和1943年，全区为1283户佃农减了租，共减租粮2250斗（每斗30斤），减去租金5361元；为151户贫农减了息，共减去息金1386元；为1561个雇农增加了工资，共增粮1731斗，增资1818元。

坚持自力更生方针

开展大生产运动

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不仅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还进行严密的封锁。挖壕沟、筑碉堡、设卡子，严禁敌区与我抗日根据地贸易往来，曾给我根据地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的政策是反扫荡、反封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一、开荒种粮棉，全民办纺织

渤海抗日根据地是山东重点根据地之一，也是敌人进攻、扫荡、封锁的重点地区之一。在那最困难的年月，环境残酷异常，吃穿都非常困难。但是，我区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在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下，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首先利用沿海地区地域广阔的有利条件，组织军民开垦荒地，增种粮棉。据1944年统计，全年开荒7000多亩。同时组织互助组、变工队，提倡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力宣传增产典型，奖励劳动模范。为解决军民穿衣问题，提倡全民办纺织。1943年，根据地内的棉布即达到了自给自足。同时还开办了被服厂、卷烟厂、合作社等，使根据地的经济情况和军民生活都逐步有所改善。

二、发展晒盐事业

渤海区东临渤海，“七·七”事变前，沿海居民大都从事渔业生产。日寇入侵后，对海口进行封锁，渔业遭厄，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李人凤同志对此情况非常关切。他通过调查，了解到晒盐成本低，获利大，操作简便，销路广，可以满足根据地军民的需要，还可以开展敌区贸易。所以，李人凤同志提出：将沿海一带划为晒盐区，组织群众晒盐，生产自救。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支持帮助，发放必要的贷款，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晒盐合作社

等。晒盐事业发展起来之后，沿海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的用盐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三、建立各种合作社

随着封锁反封锁形势的发展，针对军民生产和生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李人凤同志具体领导下，由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大办合作事业，目的在于生产自救，方便群众，改善生活，繁荣经济，支援前线。当时在有条件的村庄，纷纷办起了生产、运输、消费等合作社，按股投资，合股经营。当时李人凤同志的日记中记载了清中地区一个村庄合作社的情况：“全村 130 户人家，有运输合作社 1 处，资本 20000 元，经营 10 个月，每月每股赚利 25 元至 50 元；消费合作社一处，资本 3000 元，3 个月一结帐，每次每元分红 0.3 元至 0.5 元……。该村全年营业收入 30 万元以上，全村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提高。”我们从这一个村庄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根据地的合作事业所取得的良好效果。

组织救济灾民

日寇的侵略暴行，给清河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李人凤同志批发的 1943 年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载：“邹长边区被敌重占后，近一年的时间，敌人修公路、挖封锁沟、修据点、毁良田达 12000 亩，用

费达 13137 亿元”，苛捐杂税极多，有交不完的税，数不清的费。” 地税、屋税、门牌税、居留税、狗税、猪税、牲畜税……20 种之多。” “区公费、乡公费、送礼费、过节费、鞋费、袜费、出差费、灯油费、输养费……30 多种。” “敌人修据点拆民房难以计数，人民无法活命，张庄修据点拆民房，逼得母女二人悬梁自尽。” “四边石桥敌人据点逼钱，老百姓拿不出，关了 30 多人。” “人民被逼得把树皮吃净，家俱卖光，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不少难民逃到我根据地，政府拨给土地，借给耕牛，发给种子，为之购买大体够用的农具，贷给粮食 202 石，使他们能够生产自理。如泰山敌区难胞来我根据地的人就组织了三个村庄。” “除安置来我根据地的难胞外，1942 年和 1943 年两年中，救济敌区难胞达万户以上，用粮 27 万多斤，用款 11 万多元。”

由于日寇的“扫荡”、封锁、烧杀、抢掠，给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1941 至 1943 两年不完全统计，在日寇扫荡中，“人民伤亡 2700 多人，被敌俘去 1500 多人，拉去牲畜 5790 多头，抢去粮食 40 多万斤，烧毁房屋 26500 多间，物品损失达 1500 多万元。” “我抗日政府帮助根据地人民一次次重建家园，在日寇抢光的村庄里一次次发放赈粮。日寇反复抢去人民的牲口，我则反复帮助人民购买，保持人民的生产力。白云山区

抗日根据地，三次被日寇烧光，我政府三次帮助重建。”“两年来共贷款 416 万元，贷粮 4100 石……。”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暴行，也看出了李人凤同志在主持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中，在生产救灾、救济难民方面，是费了很多心血，做了很多工作的。从而在扩大党和政府的影响，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指挥消灭蝗虫

垦利县抗日根据地，位于黄河入海处，满目荒凉，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和红荆条，兼有一部分开垦的耕地。此处是蝗虫的滋生地。1943 年春出现的蝗虫之多是几十年没有过的，面大，虫密，小虫一堆堆、一片片出土。若不及时消灭，虫成后，一群群到处觅食，每到一处，吃光一处，危害极大。不仅该区颗粒不收，还会危害其他地区。我抗日民主政府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打蝗虫。李人凤同志组织了机关、学校、部队和人民群众 6 万多人，并亲自指挥，开赴灾区。当时我们随李人凤同志来到灾区。李人凤同志到灾区后，就去现场察看灾情，他骑着马看了一天，并与当地群众讨论，回来后将蝗虫生长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扑打方法向大家详细作了说明，提出了“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即必须早动手，趁幼虫时

打，要打彻底)，拟定了“作战方案”。主要是挖壕沟，将荒地和良田隔开，将幼虫赶到沟里埋死。为了做到彻底消灭，要挖第二道壕沟，将逃跑的幼虫赶进第二道壕沟中消灭，并将主要劳动力分配挖沟，分出部分劳力就地扑打。

这场灭蝗战斗非常艰巨。当时小麦还未成熟，秋苗刚出土，受蝗虫的威胁很大，必须及时消灭，时间十分紧迫。时在初夏，中午已很炎热，加以当地水源极缺，吃水十分困难。那里的水井是：“口大十来米，井底如盆底，下井去淘水，桶水一小时。”且水质浑浊苦涩。李人凤同志对此情况非常关心，决定各队组织供水队伍，以保证饮水的供应。经过努力，挖灭蝗虫沟二百余里，基本上把蝗虫消灭，按计划完成了这一任务，得到了群众的热烈称赞。从而避免了一场蝗虫之祸，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好的收成。

开展大参军运动

渤海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和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难关。1944年初，军民配合拔除了敌人不少据点，改变了过去被日伪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1945年春，为了扩大主力准备反攻，渤海区党委、行署号召人民踊跃参军。记得杨国夫司令员和李人凤同

志分工负责此项工作，他们日夜为大参军操劳。李人凤同志深入到各个村庄了解情况，参加动员，解决问题，检查优待抗属、代耕代种的情况，解决抗属的困难。当时渤海区的优属工作做得较好，村村设有专人负责，承担军烈抗属的春耕生产等等。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我根据地的人民掀起了参军热潮。广饶县周家庄和商家庄各成立一个新兵连集体参军。还出现“一门三英雄”、“一门四英雄”、一家兄弟父子同时参军等动人景象。从1945年的2月起，不到半年的时间，共参军二万余人，壮大了我军主力部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我党政策的威力及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崇高威望。

※ ※

我们和李人凤同志相处几十年。他忠于党、忠于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工作、呕心沥血、刻苦学习、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襟怀坦白。这样一位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四人帮”诬蔑陷害致死！今天在纪念清河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5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写了此文，以寄托对李人凤同志的哀思。

广博蒲工委和三边政府 团结争取社会名流抗日纪事

崔茂斋口述 朱青杰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我清河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迅速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政权。我对总的统战工作了解不多,仅就广(饶)、博(兴)、蒲(台)工委和广、博、蒲三边政府在团结、争取社会名流参加抗日情况能追忆些。

我外祖父薛凤台,是今东营区一带的三义堂(青帮)头面人物,社会交往甚广,尤其和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多有接触,当时“三边”政府就把他列为社会名流。

因我外祖母早逝,我从小和母亲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所以和外祖父交往的人我都熟悉。后来“三边”政府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一些人对抗日工作起的作用我了解些,现在还记忆犹新。

(一)

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主要城镇后,在今东营地区周围的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如李法熹、成建基等,乘机打起抗日旗号扩大队伍。1940年初,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跨过小清河来到广北和广、博、蒲三边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这一带形成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军和八路军三股势力。随着形势的变化,地方上的上层(权势)人物也在分化,少数卖国求荣的家伙直接投靠日本当了汉奸;一部分势利小人,为求一官半职投入了杂牌军的怀抱;再一部分就是我们称谓的士绅名流了。

称他们士绅名流是因为这些上层人物大多富有,但不同于恶霸地主。他们有权势,又有别于仗势欺人的政客。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心计多,识时务,重义气,爱面子,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政权纷杂的年代,从我外祖父的表现看得出,这些人们的心理也很矛盾。他们虽惧怕凶残的日本人,但不愿去当汉奸遭世人唾骂。他们瞧不起本是盗匪草寇出身的杂牌军,但又与他们的头头或要人因帮会或故友有割不断的关系;他们虽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坚决抗日,是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但又见他们武装薄弱、土里土气,怕成不了大器。他们这些一向习惯出人头地的

人，又不甘心当凡人。在这段时期，他们是左右逢迎，处处留路。一方面他们各自拉拢部分人设个小圈圈、小天地，说话办事好有个挑旗捧场的；另一方面，借助他们过去的威望，当遇有群众发生争端纠纷时，站出来说说些公道话，打个抱不平，为人出出急，以赢得众人的抬举。当时这些人是上有依附，下有基础。

这些人物，虽为数不多，但在当时的农村，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很有影响，在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以前，政府搞什么活动，老百姓先看他们的态度。三边政府成立后，在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时，团结争取这部分人，孤立打击部分投靠日伪、破坏抗日的上层人物，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新政权，非常重要。

(二)

我所了解的绅士名流有：

我外祖父薛凤台，字星斋，今东营区龙居乡北薛村人。只生我母亲。外祖母去世后，他鳏居一人，母亲便带我去和他生活在一起，家境并不太富裕。

外祖父生于清同治年间(1866年)，自幼厌文好武，爱管闲事，打抱不平。他秉性刚直，不恋钱财重情义，在亲友乡邻中有较高声望。1900年因涉嫌义和团逃往关东。

1920年在当地加入了青帮。1930年因其侄干土匪受牵连，曾坐过大狱。在当地青帮中，因他入帮早，辈份高（二十三“悟”字辈），被推为当家的，四方帮友交往甚密，尤其与成建基、李法熹、郭麟甫、孙尽忠等当时的权势人物交往更深。

他还信奉佛教，家中供一铜佛像。他热衷社会上的善事。大门口青帮“清理公所”的牌子旁，还挂着个“广饶县劝戒烟酒会”的木牌子。“七·七”事变后他已近耄耋之年。由于这一带政局混乱，一些人为求得一个路子保身，把青帮这个帮会组织视为依靠。当时广博蒲三县边境出现了“入帮热”。如当小学教员的张立吉、方金璧、薛秀田等都入了青帮。就是任区财粮助理的张玉明，交通员马本鲁也当了帮徒（不过他们都拒绝加入汉奸组织“安清道义会”）。这些人入帮都是靠外祖父引见的。“入帮热”使外祖父捞到点好处，一是通过给人收徒弟、找师父、开香堂、做日子混个吃喝，弄点钱化，解救了当时家庭生活的窘迫；二是进一步抬高了他的身份。别看李法熹、成建基、郭麟甫耀武扬威，可是靠帮会扩充势力，按帮规还得过老当家的薛凤台这一关。就是利津保安七团张家麟于1943年春在尚家庄开香堂时，还是派人来请外祖父主持的，自然一般人物就不必说了。可见当时外祖父在社会上的名望很高。

冯统一，字仁斩，今博兴县魏家庄人，家庭富有。他与成建基有特殊关系（一说他是成建基的干儿，一说是成的帮徒）。此人心计多，在人面前善于故弄狡狴，专登高门交往上层人物。他常赶四集，一六去会刘集刘祚亭，二七去盐坨拜初卫元，三八到龙居杨家园子，四九去史口福顺兴，可随便入三里庄成建基的据点。见了三边政府的干部也是殷勤逢迎，逢人炫耀他去××处，××对他怎样怎样，又说三边的××主任、××同志对他怎样器重等等。因而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个身价很高的人物。

初卫元，字子庭，是当地的富户，堂号“广济堂”。他曾是早期的国民党员。兄弟五个，他是老大，二弟务农，三弟初子贞在广饶县伪县长张光汉处干事。四弟开着大中药铺，五弟在广饶城开染坊。家中土地很多，雇着长工，宽大宅院里还盖着两层小楼。因他家大业大，说话有人听，办事有路子，有求于他的人很多，家里常是宾朋满堂。

南薛村（今属东营区西范乡）张守农，家庭富裕。其二姨夫是干过盐坨镇镇长的马英三，表弟是干过国民党广饶五区区长的马春晓，五姨夫是前面提到过的薛凤台，六姨夫是南薛大地主薛相臣。给成建基当黑军师的翟希武是他的姑表兄弟。他的儿子张凤翔，在外地教学，加入了共产党，他在两面政权里都有人，可说是进退有路。因此当地人对他是敬而畏之。

陈庄(今属东营区西范乡)陈玉珩,字鸣卿。1931年曾干过广饶北部南三保的保务社长,后来又干范干乡乡长,还当过陈庄的村长。陈庄是个大村,他与附近的上层人物交结甚广,非亲即友,也算得上社会名流。

王玉华,字荣奎,今东营区西范乡官庄桥人。他家是拥有几十亩地的财主,兄弟三人,他是老三,两位兄长管农事,他游手好闲,花用无度。1936年,盐坨镇办理土地陈报时,他当过总管,与镇长马英三有厚交。那时他头戴礼帽,身穿洋服,整天大摇大摆,很有派头。“七·七”事变后,仍吃喝游闲乡里,结交了些上层人物,如牛家牛寅东、阎家阎之训、盐坨初卫元、北薛薛玉庆、百户张张×官等。那里的官庄桥靠北辛店过往广饶的大道,是广北去广饶办事的必经之地,上层人物多到王玉华家落脚。因而他家常是友朋盈门,他也成了有影响的人物。

薛玉庆,字子超,今龙居乡北薛村人。家庭富有,开中药铺,他儿子当坐堂先生,家中雇有长工料理农事,他专事借贷债务,他曾为张店高利贷主张传诗代办放债。1937年黄河决口,黄河西一冯姓来广北放一斗糝子,来年收一斗麦子,就是他当的帮手。由于他善于社交,周围的上层人物多是他的座上客。

李龙江,字金三,今龙居乡双庙村人,祖辈四代外科,开着大中药铺,名气很大。当地有名的大户麻湾刘家、北

隋隋家专请他医病，在当地名望很高。

张锡范，今龙居乡大张村。他父亲是清朝秀才，兄弟三人，他是老二，大哥在河南省某县任县长，其弟跟大哥谋事。他的儿子任小学教员，由于他家是诗书门第，在当地颇有影响。

薛连章，今西范乡南薛村人，1939年马春晓拉起民团队伍后，辞去了盐坨镇镇长职务，薛被推为镇长。这个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当时的权势人物除自己的名外还要起上个号，才觉得身价不俗，但他不要这个雅气，当镇长后仍只有薛连章这个名。他衣着朴素，整天穿着老伴做的粗布衣服、庄户鞋，因而他在当地老百姓中，威望最高。他对镇长这个差使并不热衷，从不到镇公所办公。民团、杂牌军找他时，总是想法躲起来，他常说：“就是看着这些‘种’不顺眼。”1940年八路军过来后，宣传抗日的主张就投了他的心思。当时的旧乡长多数依附了日伪，唯独他在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边”政府为了不让他暴露身份，表面上也以士绅名流对待。

(三)

据我所见，广、博、蒲三边工委和政府成立不久，就加强了统战工作。工委书记张力生，副主任杨公田经常往来薛凤台、薛玉庆、初卫元、冯统一家。张力生家属久住南

薛,对张守农和薛连章做了不少工作。

记得 1942 年秋,三边政府在陈庄召开了当地士绅名流大会,会议形式很隆重,会前发出的请柬是用毛笔写的正楷字,内容是:

××先生:

定于×月×日,三边政府在陈庄村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届时请您参加。

广博蒲三边政府

×年×月×日

接到请柬的人,不管心里怎样想,但从表面上看都很高兴,有的拿着请柬逢人炫耀,也有的掩而藏之。不过开会这天,大多穿戴整齐,有的还穿上长袍马褂,确象个绅士派头。

会议由杨公田副主任主持,他在会上讲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国内抗日形势,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给他们指出了今后的出路。杨公田副主任是当地人(今博兴县纯化乡杨家村),有德有才,早在周围乡里就有很高的威望,抗日道理他讲得头头是道,参加会的无不佩服。一些人迫于面子,还表了态,讲了些拥护抗日的話。

这样的会不同形式地举行了多次,不过开会只是一种形式,大量的工作主要是靠平日具体地下功夫。

杨公田副主任经常来找我外祖父。有一次我见他拿

来一张《群众报》，把报上关于号召三义堂(青帮)要和日伪组织“安清道义会”划清界限，要成为“忠义兄弟救国会”的文章念给外祖父听，以报上内容为话题，劝告外祖父可利用这个组织争取群众，做些对抗日有益的事。1942年夏天，有个叫孙立的，也找我外祖父谈过，当时我也在场。孙立讲了三义堂的来历，在全国的发展情况，他说：“我赞成三义堂仁义互助的精神。可是这个组织的首要人物多都是与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紧接着他列举了从民国初期以来至现在三义堂屡被反动势力所利用的事实。孙立走后，外祖父对我说：“姓孙的这个人真了不起，讲古论今都条分缕析。他讲的三义堂的历史，连我这个老当家的也懂不了这么多，‘土八路’可不土，里头能人真不少！”由此，外祖父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想法大大改变了。

“三边”工委和政府对我外祖父是采取举大德、掩小过，逐步争取的办法，如：明明知道他常常暗地里开香堂，但不指责，连他门口挂的清理公所的牌子也没摘掉。除每次让他参加士绅名流座谈会外，还邀请他和薛连章参加广北县政府组织的参议会。1944年7月，国民党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司令王道率领部队反正，区干部让外祖父带领本村剧团去祝贺。外祖父是个最重义气的人，他常说，共产党、八路军这样器重咱，咱不能不识抬举。外祖父就这样从不自觉到自觉地站到拥护共产党八路军这一边来

了。那几年,他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工作的事情。

“三边”政府对其他人的争取教育,我知道的没有这样具体,但这些人常和外祖父接触,从他们的言谈中,我知道“三边”政府干部因人而异对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初卫元这个人由于是个老牌的国民党员,又加他财大气粗,争取教育比较困难。可是盐坨村是在我们抗日政府控制下,杨公田主任和他是邻村,过去就熟悉,也最容易接近他、感化他。有人求初卫元出面的事,只要不违背原则,政府也作点让步,给他些面子,他很受感动。时间长了,他觉得共产党宽厚待人,认识逐渐转变了。

冯统一也是比较难争取的一个,因他和成建基关系特殊,受敌影响深,“三边”工委和政府的态度是:他做对抗日有利的事就联络他、团结他;他干坏事就孤立他、打击他。这个人的特点前面提到过,他好出头露面,能说会道,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个有本事的人,“三边”政府就利用他这一点争取他做了些我们难以办到的事。

其他的人,如张西范、李龙江、薛玉庆、陈玉珩等人,对他们着重宣传党的政策、抗日主张,对他们经营的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在他们对抗日工作做出贡献时,及时给予鼓励,他们或早或迟地都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了。

(四)

“三边”工委和政府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些士绅名流不同程度地做了些对抗日工作有益的事情。

先说我外祖父薛凤台。

1942年，三边特务队队员李星奎（龙居乡西南李人，1945年在寿光牺牲）被成建基的队伍捕去，因李星奎家属与薛凤台是“瓜蔓子”亲戚，当天李星奎家里人就去找我外祖父保人。外祖父当时没答应，他说：“我私自去三里庄，会被人认为是和成建基勾勾搭搭，最好你让‘三边’政府写个信来。”李星奎的家属也理解外祖父的意思，便找人到“三边”特务队写了封信来。我见此信是毛笔正楷，信的内容是：薛凤台先生：求你去三里庄保人的事，对抗日有利，你可以去办。署名李子元。外祖父一见是“三边”特务队指导员的亲笔信，当天下午就去了三里庄。

回来后他向人们讲了保人的经过：

“我到了成建基屋里，成汉三、刘成身等十来个官都在那里，他们没一个不在三义堂的。见我进去，呼拉一下子全部站了起来，这个呼大爷，那个叫大哥，让座倒茶。成建基问：‘大哥怎么来了？’我说了来意后，成建基一听，脸色变了，连说：‘不行、不行！李星奎是八路’。我说：‘我不

管什么是八路是九路，是我的亲戚，你就得放他！’成建基拒不答应，我就耍起无赖来，蹲在他的椅子上，不说话了。其他虽都是熟人，见我们顶了牛，满屋没有吭声的。成汉三见大家都很尴尬，说了句‘看来薛大哥这面子使不下来是不散伙了！’起身抬脚走了，其他人觉得无话好说，也都相继拱手告辞。屋里只剩下我和成建基了，成一再解释不能放人的理由，我只静坐不语。天黑了有人送来饭我也不吃，成给我找了休息的地方我也不去，我知道有三义堂这一层，他不会对我怎么着。

“原来他把抓住李星奎作为一功已向郝家日本鬼子据点报告了，如再放人怕郝家日本人给麻烦。可是他不给我这个老当家的面子，也觉得说不过去。他在屋子里来回转了几圈，抓起了电话，一听是要郝家，我赶紧凑到近前，成问：‘是二哥吗？’‘是，你是立堂（成建基的号）吗？什么事？’电话里回音很清楚，是郭麟甫的声音。我真想把电话抢过来，同老至交哭诉一下。成答道：‘凤台老大哥来了，他要保出我刚抓住的那个人。’

‘来保人，你放就行了。’

‘不行啊！我抓的这个人，是八路军的特务队员，我已报告维持会，转告皇军大院了’。

‘凤台哥还在你那里吗？’

‘在，正在这里生我的气呢，他说不放人就在这里不

走了。’

‘那就让他带走吧，这边过问，有我应付。’

“成放下电话，变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向我讨好说：‘大哥，不是兄弟有意难为您，没有麟甫大哥打保票，我真犯难啊！这下好了，明天把人领回去，让他今后别干就是了。’我借机下台睡觉去了。在床上一夜未合眼，担心有变卦。第二天天刚明，就有人把李星奎领来了。我急速告别了成建基，让成汉三送出围子门。我们脚不沾地到了徐家，李星奎连家也没回找特务队去了。”

事后薛凤台夸耀：“我办事是使硬面子，一文钱不花。”

至此，薛凤台的名气传开了，都说他的本事大，成建基抓去八路的官，他都能要出来。其实，他担的风险，受的难为，别人可不知道，就是村里的人被抓去也求上门来，薛凤台对这样的事有求必应。

龙居乡高家村的农救会长、共产党员张存德，有天晚上开完村民会，独自在清理会场的东西，敌人突然包围了村，他发觉晚了没躲开，被成建基的队伍抓了去。他当农救会长的职务不好隐瞒了，可共产党员的身份他没有暴露。去探信的人回来说：张存德承认是会长后已绑上绳子了，看来是不好办了。张存德曾拜薛凤台为师父，加入过三义堂，不过已多年没有联系了。张存德家属求上门来，

薛凤台说：“他又没干过八路，仅在村里负责，不用我去，写封信就行了。”张存德家属问需要多少钱，薛凤台说：“我办事从不花钱，用钱的话就别找我。”信的内容写的是：张存德是我的亲戚，又是顶门大徒弟，见信放回，不然我上门去领。结果硬面子又很奏效，信去人来，一分钱未花。

1943年春节，北薛村的人们正在街上玩，突然从村外交通沟里钻出十几个便衣队员，问村公所在哪里，有人没问来意就冒冒失失地指给了他们，这些人涌进去就把村长带走了。原来这些人是三里庄伪广六区的区中队，他们临走还留下了要粮、要款的条子。

村长叫张宗英，是建立新政权后大家民主选举的。村内三大份聚在一处商量如何营救的事，特请了北薛的富户薛玉庆、薛增祥、薛岑山等，也把薛凤台请去了。

大家说他们带走村长，留下条子，必定是为了钱，大家凑上钱保人就是了。薛凤台不同意，他说：“来抓人就送钱，会惯坏了他们。”有人劝说：“凤台，此一时彼一时，光使硬面子不灵了。既然留下条子就是要钱。”最后大家的意见是凑交部分钱。可是钱怎么出，大家主意不定，让群众摊派会违背“三边”政府“不资敌”的政策，最后决定还是富户们私人拿钱，当场薛玉庆决定拿出100元法币，薛增祥出上50元，其他又凑了150元，一共300元。

当时法币已贬值，怕钱少，大家一致让薛凤台再写上封信，他信中的话很严厉：

“立堂吾兄大鉴：

你的人把我村村长张宗英抓去了，村长是我让他当的，此人是我的门徒，你的人不向我招呼声就抓走，对我太瞧不起了。随信附上 300 元，速将张宗英放回。”署名后写上“叩上”两字。

信到人放了，可 300 元换来了一张广六区伪区公所的回条，薛凤台生气地说：“成建基变得见钱忘义了。”

成建基敬重薛凤台，一方面三义堂有仁义互助之帮规传统；另一方面为了扩充势力收帮徒、做日子必须由薛凤台出面。薛凤台对成建基投靠日本人很生气，可没办法制止他，但利用成及其部下都在三义堂的帮情，还可以为八路军和老百姓作一些事情。当时“三边”政府就是利用了他这种复杂的关系。他门口清理公所的牌子，直到“三边”政府撤销还未给他摘去。

1943 年初，环境还相当恶劣，各村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积极改造地形村貌。除村与村之间挖了交通沟外，村内街头、巷口都设了障。刚过正月十五的一天晚上，住在南薛村的广博粮秣干部刘允南，在薛凤台家坐了一会儿，刚回小学去休息，突然人喊马叫，刚上炕的薛凤台知道是汉奸来包围了，赶紧穿上衣服冲出门去，一面叫人

去通知刘允南，一面走上街头。迎面来的还是成建基的队伍，带队的成云冈抢先认出了薛凤台，跑上来向大哥问安。成云冈是1936年在周家设香堂时入三义堂的，和薛凤台是一个辈份，现在是成部的副官。薛凤台故意亲热地拉住他的手说：“你们是为事来的，可这村里太平无事，我也不让兄弟们进屋喝茶了，免得村里老少爷们担惊受怕，也误了你们的要事。”一个鲁西口音的长官坚持要进村，薛凤台有意识地问了句：“他是谁？”成云冈介绍说：“他是饶连长，和大哥不熟悉。”随之向饶使了个眼色，把手一摆，队伍折回村外了。成云冈临别时指着村口路障说：“大哥，明天让他们把这些玩艺拔掉。”

从此成建基的队伍再没进北薛村，周围的群众把北薛村称“保险楼”，形势一恶化，晚上一些人抱上被子到北薛村来睡觉。

其他士绅名流也做了不少对抗日有益的工作。

盐坨的初卫元是上层人物中的上层。由于杨公田主任经常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进步很快。1942年他就将在伪政府的三弟劝回了家，并脱离了关系。他还通过在广饶县城开染坊的五弟的关系，帮助军区后勤田根同志购进不少洋布、火柴、酒精等敌人控制的物品。后来他还四处奔波，为我广兴布店、广裕布店筹集股金。北薛薛玉庆入了北海币2000元，薛增祥入了1000元，我还入了500

元。蒲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初卫元当了县商会会长。

薛玉庆，在我政府号召减租减息时，就主动拿出一部分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当时还未施行土地改革，因此称他为“开明士绅”。后他弃农经商，和张敬宗跑寿光，购进些中西药，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做了些贡献。

官庄王玉华，过去曾与在盐坨镇当镇长的马英三交情甚笃。1942年马英三的儿子马春晓在广饶五区干伪区长，他借父亲的旧关系拉拢王玉华，王玉华不好正面对抗，躲到北薛住了很长时间，至碑寺口据点撤了，他才回家。

薛连章掩护军区情报站两年多没出任何问题。

清河军区有个情报站，站长是张瑞云，情报员有李书琴、阎嵩山、王伙子。1941年住北薛，1942年环境恶劣时住南薛，隐蔽在薛连章家里。除这四名情报工作人员外，还有两个瘸子常来往薛连章家，一个姓张，就是后来的广北县委书记张力群，另一个姓王，后来听人说是“托派”。那时穷八路，一天2斤4两粮食和几角钱的黄烟费，供应不上全由薛家添补。当时南薛没有水，吃水要到北薛去挑，生活上薛连章从未计较过。

情报来自四面八方，都是专人密送。那时部队、机关没有固定住处，把情报送出去相当困难。为了保证时间和

保密,常是日夜兼程,没有可靠和认真负责的人不行。薛连章介绍了忠厚老实的薛保秋(离休前任上海市五角场镇镇长)协助情报站送情报,有时忙不过来,薛连章就叫他的儿子代送。

薛连章以后和我说:“情报站住我家时,光受点累是小事,天天提心吊胆怕出事。1942年冬,牛学增(范干村,当时是伪区长),突然带着区中队闯入我家,他虽是我过去当乡长时的同僚,但也把我吓得失魂落魄,我强作镇静问明了他的来意,原来是要我帮助他为三里庄筹款的,我才松了口气,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又一次是1943年春节期间。一天晚上,日伪突然包围了南薛,抓去了许多青年人,情报站的阎嵩山也被抓走了。阎嵩山不是当地人,身上还带有一支手枪,万一到了据点,身份暴露,后果就严重了。我急坏了,也顾不了许多,趁夜间混到汉奸队伍里,我紧跟住阎嵩山,一步不离。出村不远,乘敌人还在混乱中,找了个机会,拉着他逃跑了。”

薛连章虽在旧政府里当过乡长,但在党的教育下,和共产党贴了心。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媳,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张守农,宅院大,房子多,1942年军区把战地医院安在他家,他全家成了义务护理员。一次敌人“扫荡”到了仅离南薛三里的盐坨,全村人都逃走了,张守农一家人帮着

掩藏重伤员。他把夹壁屋倒出来，把伤员抬到里面，外面伪装好。虽敌人未到，可他全家为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使军区首长深受感动。这年又一次敌人大“扫荡”，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转移了，可是一个命危的伤员已无法转移。张守农一家人无微不至地服侍，可这伤员仅活了三天。他临死时提出一个要求，让张守农给他临胸苇子河家中的大哥捎个信去，把尸体弄回家去。可是当时临胸苇子河还是敌占区，信不好捎，张守农只好将其收殓好，埋在庄西北自己的地里。这件事他一直忘不下，至1945年我当村长时还常提这件事。一天一个人背着个大木箱来了，说是来收弟弟的尸体的，我找上人起出尸首装好。来人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到张守农家叩了三个响头走了。

1947年斗争复查时，因张守农是地主，有人把他列为复查对象，区委书记宋焕章以他对革命有贡献说服了群众，免去了对他的斗争。

冯统一在抗日政府的教育下，也做了几件好事。

1942年冬，成建基的队伍把住在魏家庄的抗日干部刘猛同志（行署主任李人凤的爱人）抓去了。“三边”政府副主任杨公田找到冯统一，开始冯推诿，经杨主任一再说服，他出面去了。幸亏是刘猛没暴露身份，成建基不违碍冯的面子，将刘放了。后来成知道底细后埋怨冯不该出

面,可是已经晚了。

1943年春挖支脉沟时,任务很重,“三边”政府所辖地面不大,一些村还在敌人控制下,民工不好集中,需要一个两面政权的头面人物出面召集领导,“三边”政府选定了冯统一。冯借助自己的声望,很快组织起了各村民工,他亲临工地指挥,一月的时间按工程要求完成了任务。

可惜冯统一后来经不住成建基的利诱,为其兜售假北海币,数额巨大,损害了金融信誉,罪责难逃,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东营区政协供稿)

一曲人民战争的颂歌

——记抗战中的西南李

褚洪顺 李存秀

地处黄河三角洲的西南李村，在抗日战争中，是渤海抗日根据地远近闻名的“模范村”，是保护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堡垒村”。这个村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英勇战斗，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民战争的颂歌。

建立党组织 创立新政权

从东营市出发顺郝纯公路，向西南方向行 15 公里，跨过打渔张四千渠，向东行 1 公里，便是西南李村。西南李村原属博兴县，1942 年划归广（饶）博（兴）蒲（台）三边行政区，1944 年属蒲台县，1956 年又划归博兴县，1984 年后属东营市东营区龙居乡。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李是一个由小张、褚家、南

李 3 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有 230 多户人家，900 多口人，9000 多亩土地（其中荒碱地占三分之二），牲畜 180 头，大车 18 辆，是一个贫困村庄。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大好河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自动撤出济南，把省城让给了日寇。鬼子、汉奸到处横行，抓兵、抢粮、敲诈勒索，对我解放区进行疯狂地掠夺。日寇从 1939 年到 1942 年，先后在西南李周围设碉堡、安炮楼达 15 处之多。敌人把他们直接统治的村称“爱护村”、“良民村”，并在周围挖上又深又宽的封锁沟。敌人的据点离西南李最近的 6 公里，最远的 15 公里。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先后 20 多次到西南李进行扫荡，烧、杀、抢，无恶不作，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0 年农历 8 月 24 日，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基干一营和清河区青年营进驻了西南李村，敌人闻风丧胆，百姓拍手称快。过去，群众只听说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善战，这次亲眼看到自己的部队，对待百姓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全村呈现一派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景象。在部队的支持和帮助下，首先开展了反恶霸、反封建势力的斗争，清算了伪村长李经章欺压群众、为敌效劳的罪行。在群情激奋、踊跃参加斗争的前提下建立了村政权。第一任村长李永修，自卫团长李

鸿岭，妇救会会长李张氏（李在洲之母），农救会会长李龙溪，工会会长李聚业，青救会长李阑章（后李纪元），青救会副会长李宝德，儿童团指导员褚洪顺，儿童团团团长李存秀。从此，西南李村成为与敌占区相望的第一个抗日政权（向北三公里的徐家、林家就是伪十六旅旅长成建基的地盘）。

西南李村于1941年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李子元是西南李村的第一名党员。1941年7月以后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张玉选、张长征、李纪元、李德全。11月，区委书记田浮萍来到西南李宣布西南李党支部正式成立，由李德全、张长征、李纪元组成支部委员会，李纪元、李德全先后担任支部书记。1942年春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是：李德顺、李景福、李阑章、李荣魁、李秀章、张元荣。这年秋季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是：李龙溪、李占一、李忠元、张元良、张金宝等。1943年发展的党员有李瑞章、李荣起、李殿魁、褚左武、李忠臣、李松山等。从1944年起，支部书记先后由李秀章、李龙溪担任。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村政权的建立，给西南李村注入新的活力，从此，这个渤海平原上的偏僻村庄，到处充满着光明和希望，到处洋溢着团结抗日的热烈气氛。

军民并肩 除奸抗日

1942年5月，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广、博、蒲三边工委和政府成立。三边工委和政府的负责人经常活动在西南李。三边工委委员、宣传部长田浮萍，三边工委委员、青救会长伊觉非，经常到西南李指导工作。特务队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西南李的基干自卫团和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他们以西南李为依托，以基干自卫团和青抗先为骨干，军民并肩，经常给出来扫荡抢粮的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对那些窃取我军情报、民愤极大的汉奸给予镇压。

三边区特务队刚成立时只有7人，西南李是特务队的根据地，第一任队长李国华（后李病宋鲁源接任）。清河军区只给特务队七九步枪1枝，还没有子弹。李队长从博兴带来折枪3枝，30多个手榴弹。他们就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消灭敌人。

特务队成立后的第三天，据情报得知，伪十六旅广八区区中队队长张家修，要带兵到张家店去赶集。特务队决定在初家以北谷子地里潜伏，截住这些汉奸，夺取枪枝弹药。在指导员李子元、队长李国华的带领下，由西南李3名青抗先队员李洪明、李星奎、李明远配合作战。李洪明带路到了纪家，发现了10多名汉奸正在村长

家门口喝水，就大喊一声：“队长，他们在这里”，接着扔出一个手榴弹。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扔下武器狼狈逃窜。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批子弹和手榴弹。虽然战果不大，但为当地群众壮了胆，给汉奸鬼子一次震慑。

1943年夏季，据侦察，伪蒲台县大队李汝珍经常到各村催粮催款，敲诈百姓，并常赶西史集。特务队利用关系果真在集上发现了他，一特务队员把枪往其屁股上一顶，令其到村外走一趟，李即随特务队员来到高粱地里。宋鲁源向其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并给他指明悔过立功的前程。他提供了蒲台县大队一班伪军在曹店防汛屋子驻防的情况，并答应立即带路去袭击。特务队去了3人，其余8人都是西南李的青抗先队员，由李带路，宋鲁源、李星奎、郭光禄为一路，李子元带队为另一路，他们埋伏在大堤上。第一路快接近目标时，李汝珍发现了流动哨是王洪祥，就指着两名特务队员上前介绍说：“这两位是我的朋友，赶集回来渴了，想喝点水”，王便把特务队员领到伪军驻防区内。正巧里面的敌人也正在过道里喝水，都没拿枪。队员们突然举起手榴弹，敌人见事不好，就往西屋跑去拿枪。特务队员扔出两颗手榴弹，埋伏在大堤下的队员听到爆炸声，便高喊着“缴枪不杀”冲杀过去，敌人没顾得拿枪就逃跑了。结果不到半小时就

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步枪 12 枝、折枪 1 枝、子弹 100 发，俘敌 3 名。

1942 年夏季，郝家、张许、小楼等据点的鬼子和汉奸，在一天拂晓对西南李进行了突然袭击，声称消灭特务队，活捉李子元。他们扫射许久，进村后连特务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就把 14 名群众抓到据点里。全村 180 头牲口和 60 多车各种物资被抢走。

经侦察，敌人对西南李的几次袭击，是张许据点的汉奸曲文成提供的情报。曲是万家村人，家中有老母一人，家境贫困，曾在西南李当过长工，对西南李的情况很熟悉。他在 1941 年当了日本鬼子的秘密侦探，向其主子提供了大量我党我军的情报。对这一罪大恶极的败类，群众早已恨之入骨，要求正法。1942 年 10 月，西南李青抗先配合三边区特务队，经过周密安排，在曲文成回家时将他抓获。由于曲文成死心塌地的甘当日寇的走狗，经抗日政府批准，在西南李村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一害人虫。除曲之外，还有一个铁杆汉奸，是郝家据点伪军刘佩忱部办公室主任张子诚。对西南李村的突然袭击，是他带领干的。三边特务队长宋鲁源与李德全、李洪明、李身修决定除掉这个汉奸。他们于 11 月 24 日晚，从十一图越过封锁沟，到了郝家张子诚家。先搭人梯把李德全，李洪明、李身修送上房顶，又由李身修手把手

地把李德全、李洪明轻轻送到张的院内。李洪明率先一脚踢开房门见无人，又揭开炕席一看，张子诚赤身藏在炕洞里。就这样，这个汉奸被活捉了，在11月日寇大扫荡时被就地处决，为民除了一大害。从此，敌人再也未敢进犯西南李村。

西南李村的青抗先经常配合特务队、三边区中队、清河军区及其他部队，对敌人进行斗争。1942年秋，李德全、李星奎、李善修，去龙居集想捉日本高级特务山岸等，去了两次没见鬼子，但发现两个汉奸侦探正在赶集，李德全等队员先到龙居集村外埋伏好。当这两个汉奸侦探到达时，3个队员突然冲出来，敌人束手就擒。这两个汉奸一个叫张松林，一个叫王同训。张松林经教育，表示悔改，放回据点，后来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王同训坚决与人民为敌，经上级批准，立即把他处决了。1943年，西南李的青抗先还配合特务队宋鲁源等5名同志到史口集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吓跑过正在集上抢东西的伪军刘佩忱部的一个连。同年秋天，青抗先配合特务队攻打西三里庄据点；1943年又配合清河军区基干营攻打龙居据点，当时因炸药出了问题未能成功，后来敌人被吓跑了。青抗先还经常以各种形式瓦解敌人，打击敌人，如贴大标语、散发传单、到据点近处喊话等，还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施。敌人白天挖封锁沟，晚上

青抗先带领群众给它垫平，搞得敌人精疲力竭，穷于应付。西南李村有8个闾长，从村政权成立后，就召集他们进行了7天的思想教育，讲明形势指明前途，同时揭发了个别闾长秘密给敌人送东西的罪行，从此后再无一个敢资助敌人。

减租减息 巩固政权

1942年秋，西南李村在三边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张彪帮助下，率先开展了雇工增资、减租减息运动。当时的政策是：增资，一个年富力强的雇工，每年所得工资能维持一个半人的生活；年老体衰的雇工酌情减低，凡原定工资不足上述标准的，要适当增加。减息，实行分类减息，即不管高利贷者和债户原定利息是多少，一律改按一分半计息偿付。这一工作是紧密结合反霸斗争进行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职工会为主，以自卫团青抗先为骨干，充分发动群众，对有雇工、放高利贷的十几户，先是个别教育，对那些经教育自愿增资，减租减息，拥护政府政策的，不批不斗。如地主李龙江，既有雇工也放债，但经教育他再三请求政府、群众批判他的剥削思想，并自愿捐献，支援抗战，取得了上级政府和群众的谅解，成了开明人士，是我党的统战对象（解放后是蒲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对那些经

教育后，还以各种借口进行抵制，讨价还价耍赖的，甚至进行破坏活动的，各群众团体敲锣打鼓上门进行说理斗争。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增资“双减”斗争，雇工工人取得了增资的利益，农民得到了减租减息的实惠。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给了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激发了广大农民对敌斗争、搞好生产、支援抗战的热情。

经过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西南李村的党支部更加坚强，村政权更加巩固。西南李从1940年建立村政权以后，领导群众做了大量抗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要求，在三边工委负责人张力生、田浮萍、宋鲁源、伊觉非等同志的领导下，对西南李的党组织和村政权又作了调整，李德全为党支部书记、副村长，李润德为村长，李荣魁为自卫团长，李兰章为民兵队长，李纪元为青救会长等。当时各抗日群众团体在开展对敌斗争和其他工作中都起了骨干带头作用。

自卫团：负责镇压敌人，保卫人民的安全。他们昼夜站岗放哨，观察敌情，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施，挖抗日沟，破坏敌人的扫荡，配合部队打击敌人。

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简称妇救会）：她们的任务是带领妇女求平等、求解放，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搞生产支援前线，配合反扫荡。她们冲破封建枷锁，首先带

领全体青壮年妇女剪发放脚，动员 200 多名文盲参加了识字班，其次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各项活动，为支援前线，解放人民，自愿动员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军。她们做鞋袜、慰问袋，给部队烧火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子，把一腔母爱献给了人民子弟兵。西南李的妇女在抗战中的贡献非常显著，因此，村妇救会成为全边区的模范。

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是一支半武装性质的青年组织。党把许多热血青年团结起来，用军事化的组织和行动，教育他们训练他们，成为对敌斗争的突击队。西南李村的“青抗先”是三边行政区的模范先锋队。1943 年春，三边工委负责人伊觉非在村长李润德家召集五、六个村的青年干部开会，许家据点敌人从抗日沟里偷偷窜进村子，被青抗先队长李兰章、队员李星奎发现，他们一面鸣枪还击，一面派人报告，在他们的机智掩护下，大家胜利突围，伊觉非同志的帽子被敌人子弹打落，但没有一人伤亡，受到三边青救会、三边青抗先大队表彰。李纪元、李星奎、李德全、李明远、李洪明等队员配合三边特务队经常到边缘地区侦察、除奸、反霸、消灭小股的敌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抗战中的儿童团：爱国抗战教育是以学生为重点，以学校为中心进行的。大唱革命歌曲就是先从小学生中开始的。建立的青抗先为骨干的夜校、妇女识字班，都是

以学校为主，儿童团是他们的小先生。那时西南李村特别活跃，家家户户，村里村外，都能听到歌声。尤其举行村民大会，或者过年庆节，先以大唱革命歌曲开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儿童团员们手握红缨枪，在村头巷尾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儿童团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同地主、富农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儿童团员们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受到了党支部和群众的赞扬。

抗战中的吕剧团：西南李吕剧团有一个完整的班子，如青衣褚殿阁，花旦李洪明，老生李善修，花脸张金宝，小生李中元，文武全才的李龙池等。这个戏班子早在战前就时常演梆子、京剧，后来多演吕剧。八路军来到西南李后，吕剧团又活跃起来，党支部加强了对剧团的领导，李纪元、李德全、李秀章等亲自组织编节目。剧团除演出《休丁香》《朱卖臣休妻》《水漫金山》等传统剧目外，还编演了《庄阎王》、《大扫荡》、《破除迷信》、《老两口顶嘴》、《参军》等新节目。剧团不仅在本村演出，还到区县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西南李剧团实际上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一支宣传队，他们的演出，对于动员群众、支援抗战、打击敌人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军参战 多做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西南李村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不仅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还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每年支援抗战的粮食多达 50 万斤，布匹万尺以上。1944 年 2 月广博蒲三边撤销，西南李划归蒲台县。张玉珠曾被选为全县的劳动模范。1945 年春县里奖给他一头大黄牛，为根据地发展生产起了带头作用。

为了支援抗战，西南李人民从 1942 年初就开始挖抗日沟，到年底先后和东面的宠家、陈庄，南面的方家、大张、盐坨，西边的位庄根据地接通，还与北面徐家、林家敌占区相通，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既能攻又能守的战略要地。

1945 年渤海平原已是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但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最后被消灭，为了祖国的解放，党号召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西南李村报名的有 37 人，是全区第一名，批准正式参加部队的 20 名。在未到达部队前，连、排、班级干部全由自己配齐，指导员李德全（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现已离休），副连长李占一（后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装备部副部长，现已离休），李星奎为一排长。一个村有这么多年青年参军，那时在全县也为数不多，震

动是很大的，对全县的大参军运动起了带头作用，县里奖励了这个村一面“参军模范”的红旗。

西南李村是一个英雄的村庄。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当我们回忆这段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远不会忘记勤勤恳恳、出生入死、一心为革命奋斗一生的革命老前辈们。

褚殿宝，西南李村村长，为给正在西南李召开党支部会议的三边工委组织部长张彪同志和支部成员送信，掩护同志们，同张彪同志一起牺牲了，终年42岁。

李星奎，很小跟着伯母长大。1941年在青抗先中经常与三边特务队到边缘地区进行侦察，有机会就抓舌头，除奸消灭敌人。1942年秋，李星奎同志在本村被捕，当时敌人以为他是八路，就吊起灌辣椒水，又被带进据点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未泄露任何秘密。后伯母变卖了家产折洋400元，全村老少又凑了钱，把他赎了回来。李星奎同志又回到特务队，1945年在渤海军区直属团一营一连任副排长，攻打寿光县赵家庄子时光荣牺牲，年仅24岁。

李阑章同志1944年在广饶县五村执行任务时，被特务所害，光荣牺牲。

西南李村，这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战斗堡垒村的

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载入中国革命历史史册。西南李村的英雄业绩，应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以激励大家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发展经济 支援战争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忆战时广北县合作事业的发展

宋立言

1941年1月，中共清河区党委、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广饶县北部（大体以小清河为界）建立了中共广北县委和广北县行政公署。

广北县地处黄河入海口的边缘地区，有大片的碱荒土地，除了荆条、黄蓍、碱麻根等耐碱的杂草丛生之外，当年村庄稀少，交通不便，淡水缺乏，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但是，这里日伪军的统治较差，便于我军活动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至1945年，中共清河区（后为渤海区）党委、行署机关和军区部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42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数次大“扫荡”。尤其是1943年，日伪军在北隋、车里、董家等村安设了据点，派兵驻扎了一月之久。日军

和汉奸相互勾结，在这年的春秋两季对广北县实行夹击，骚扰广北抗日根据地，烧毁房屋；“拉鸡队”常常偷袭群众，强奸妇女，抢掠牛羊，甚至有的村庄的鸡鸭被他们抢掠的几乎绝迹。日伪军还对广北县实行经济封锁，沿着小清河岸从羊角沟到石村就安设了5个据点、卡子，除盘查过路行人外，严禁粮食、棉花、食油、布匹及日用品流入广北县，企图摧毁和窒息广北这块根据地。加上当时粮食歉收，地方干部和老百姓主要靠吃黄蓍菜和草种子生活；部队因为作战需要，除了到垦区搞点粮食之外，也主要靠吃草种子。因为营养不良，有的战士得了夜盲症，晚上行军时扶着前面同志的肩膀才能走路。部队的被服也成了问题，战士往往冬天穿不上棉衣，夏天换不上单衣，有的冬天连双袜子也穿不上。此外，更是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然而，英雄的广北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搞好生产自救，支援抗日战争。清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专门作了研究，决定党政军民齐动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度过难关，并且指示广北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搞好经济工作，解决军民的吃穿问题。广北县委进行了认真地研究，认为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时，我任广北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

会主任，主要领导工会、农会、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因此，县委决定由我牵头，组织开展广北县的合作经济工作。为了加强对合作事业的领导，县委决定我兼任合作社经理，王子平任副经理，刘志远跑外，智明德、李鲁民任会计，领导全县的合作经济工作。

当时，我们都未搞过经济工作，不知从何着手，就四处拜师求教，召开座谈会，向群众学习。1943年10月，我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聘请了30多位有纺织经验的人参加。经过座谈，集思广益，总结出三条意见：1. 提高生产技术，把手纺车换成纺纱机和织布机，把手梭改为拉梭；2. 成立纺织合作社，做好产品收购和原料供应；3. 建立了由15人组成的推销委员会，请商会会长隋殿九任主任，王子平任副主任。就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成立了广北县纺织生产合作社。为便于经营，对外称“广兴布店”，店址设在八区牛家庄，我任经理，王子平任副经理，工作人员有智明德、解士修、刘志远、隋景岫、孙锡鹏、李鲁民等。经营方针是以发展纺织为中心，供给社会纺织原料，推销产品。

清河区党委对“广兴布店”的成立非常重视，特意从粮库借给一部分粮食，用以支付纺织人员的报酬。区党委和行署机关集体入了股。还发动工作人员入了一些股。当时定为一元钱（北海币）一个股（相当10斤粮食

钱)，股数不限，完全自愿。如果没有钱，交上一幅裹腿也可以顶一个股。挣了钱，按股分红。“广兴布店”创办初期，社员就发展到 4700 余名，股金达 14 万元，向银行贷款 33 万元。布店从市场上购置棉絮条（土称“布绩”）贷给群众。社员领回“布绩”27—30 两，20 天内交回一匹面宽 8 寸长 24 合尺的布，可得工资粮 30 斤。“布店”还向社员供应农具、纺织工具及其他生活生产用品。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穿衣问题，社员也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了自己的生活困难，亲身体会到合作社确实是社员自己的组织。同时又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合作社，推动了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广北县纺织生产合作社从 1944 年 1 月正式营业，到当年 7 月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仅半年的时间就贷出棉絮条 23402 斤，收回土白布 1 万多匹和大量的军用裹腿等。组织了 1369 名妇女专业从事纺织（多是一人挂名，全家妇女干活），有些十多岁的女孩子也参加了纺线。这对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据社员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数字：半年内盈利 22 万元，1 元股金可分红 1.20 元。会上还发放奖金 1400 元，奖励纺织劳动模范 22 人。至年末，广兴布店股金发展到 598 万元。

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合作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经营的业务范围从

生产资料到日常生活用品，凡是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合作社就派出人员千方百计地筹集，保障供应。合作社成了军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组织。到1946年2月18日，广兴布店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时，合作事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3月底，广兴布店在广北六、七、八、九4个区成立了“广裕”、“广丰”、“广信”、“广源”4个分店。随后，小清河以北的村社发展到135处，社员达30786人，股金5162万元。事实上，合作社已经成为组织全县经济生活的枢纽，它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对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日，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4月，福顺兴渔业合作社（对外称“福顺兴盐店”）成立，属县工会领导，县工会主任王德卿任经理，十区各救会会长许树堂任副经理。工作人员有宋振庆、张兰馥、万龙川、张兰桂、隋安民、张子良等。店址在十区田庄，后迁到武王。这所盐店是渤海区党委、行署派出工会主席孙学之同志创办的，并资助高粱300担（折北海币55万元），有股金6万元，社员3000人。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海水晒盐，供军民需要；也向游击区或敌占区销售，换取物资。除盐业外，也兼营棉花、粮食、纺织和日用品。

1944年10月，广济医药合作社成立，对外称“广济

药店”，社址在八区牛家庄，经理黄金印；工作人员有陈介范、孙仲甫、程士忠、崔立雪等；医生有吴珏、王子元、高有法、古培德等。当时，根据地内医药问题非常紧张，药材没有来源，大部分药店倒闭，个别私人药店又囤积居奇，抬高药价，部队、干部、群众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此，广北县政府建立了“广济医药合作社”，面向全县服务。医术较高，药材价廉，对烈、军、工属和无钱治病的贫雇农免费医疗。仅据 1946 年药材销售量计算，即为群众节约医药费约 400 万元。据在当地 7 个村的调查，广济药店成立前农村医生看病治愈率是 18.02%，广济药店的治愈率是 98.2%。1946 年上半年，广济药店就治愈病人 12000 余人。

1946 年 11 月，由广饶县人民武装部带头，机关集资，正式创办了“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经理黄存厚，副经理武家训，厂址在八区贾刘村，另在牛家庄设立门市部。该厂于 1947 年 1 月正式开工生产，以制造农具和轧花、纺织工具为主，兼制手榴弹供应地方民兵，群众称其为“贾刘铁工厂”、“贾刘兵工厂”。全厂共有干部、工人 46 人。该厂从 1946 年 11 月成立至 1948 年 2 月合并于县联社，正式生产时间是一年，共生产各种产品 2.2 万件，总产值为 1576 万元，供应社员农具、工具优待额为 111750 元；兼营其他业务收入较多，全年共盈余

31582708 元。工人的待遇是：工人分为一等工、二等工、三等工、四等工，每月供应粗细粮各半，依次是 180 斤、165 斤、150 斤和 120 斤。职员享受分红，无工资待遇。1947 年职员按等级分红额分别为：一等每人 14 万元，二等每人 13 万元，三等每人 12 万元，四等每人 11 万元，五等每人 10 万元。

1944 年，广北县八区东武村办起了农村第一个合作社——“同兴铁木业合作社”，东武村农救会长武士选兼合作社经理。七区辛桥办起新兴合作社，赵明珠任经理。这是广饶县农村第一批合作社。

1948 年 2 月，广饶县委决定将广兴纺织合作社、福顺兴盐业合作社、广济医药合作社、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合并为“渤海区广饶县县联社”，从此，广饶县的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4 年是广北地区合作事业兴起的一年。广北县发展合作经济的方针是明确的，就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具体任务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决军民的吃穿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燃眉之急，粉碎敌人的封锁，度过难关。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组织和发展合作经济，即通过县、区、乡、村各级农会、妇女、青年、民兵组织，层层发动，向群众宣传，揭露敌人的残暴兽行，激发群

众的抗日觉悟，分析当地的有利条件，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号召群众生产自救，特别强调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就是拥军抗日的实际行动；宣传合作社的性质、任务、组织办法，讲明合作社是群众自己的组织。我们通过农、工、青、妇组织去发动群众，把组织生产作为这些组织的中心任务之一。并在组织过程中，以抗日宣传为动力，进行教育，巩固和发展组织，两者相互促进。当时，纺织组员大都是妇救会员。有的女青年把自己的“私房钱”、准备出嫁用的棉絮、布匹献出来作资金；动员参军中，她们带头送子、送郎、送兄弟参军，涌现出一批拥军、生产双优的模范。合作社也在实际分配中给予股东以优厚的红利。

实践证明，广北县发展合作经济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早在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就发出在根据地内试办合作社的指示，但当时条件不成熟，故未引起重视。1942年，我们推行了减租减息和借粮运动。1943年，清河区的经济形势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敌人不再进行军事进攻，仅靠经济封锁也会将根据地窒息。为形势所迫，不搞合作经济，抗日根据地就坚持不下去了，这才着手组织合作社。1944年，由于我们发展了合作经济，形成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物资潜力发挥出来了，当年就解决

了部队的被服供应问题，第二年就达到军需民用自给有余，并支援了胶东和鲁南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也基本解决了。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县的合作社干部、职工，直接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负责调运粮秣物资。1947年10月，合作社干部万龙川、隋安民、徐士英3人在押送棉花去胶东的路上壮烈牺牲。1948年12月，广饶县合作社组织生产裹腿85000副支前，并拨出137万斤粮食救灾。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北县合作经济的发展。

广北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这是广北县合作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我们自始至终依靠群众搞好生产自救、度过难关、支援抗日战争。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动力之源。正如薛暮桥同志指出的：“事实证明群众的抬头翻身及其高度生产热情，是发展合作事业的最重要的保证”。

（宋景国 刁洪运整理）

广饶县盐业发展综述

宋致公 张广文 古培勇 郭之英

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既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又是化工业和医药业的重要原料。盐业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所以,历代相沿,视盐为宝,广收税利,以充裕国库,自古至今,都专设盐业机构,对盐实行专运专销制。

广饶盐区位于广饶县城东北 55 公里的莱州湾西畔,沿海岸线南北长达 16.5 公里,滩涂面积为 80 余平方公里,南靠小清河,北依支脉沟,东临海岸,西至南北河,地势平坦,水陆运输四通八达,地下卤水资源丰富。利用地下卤水晒盐,比之用海水投资少、成盐快、效果好,又加地理位置、土质、气候等条件,均适应盐业生产。可谓得天独厚,优越无比,曾被史学家誉为“山东各盐场之最”。自 1959 年扩大开发盐区以来,广饶盐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 30 多年的恢复、改建和扩建,至 1990 年,已建成年产原盐 25 万吨—30 万吨的盐业基地,还有年产 3 万吨的洗精盐厂及 5000 吨再制盐和 500 吨卤块工程,并有年

产 500 吨的溴素厂。另外,还有广北盐场、乡镇和村办盐场 7 处,象镶嵌在盐区周边的颗颗明珠,璀璨发光。尤其是广饶盐场,通过技术改造发生了根本变化,由犬牙交错的小滩池,变成了联片成方,已经成为适应机械化操作的大型盐田,面积达 21.3 平方公里,年产量 18 万吨的中型 I 企业,该场通过深化改革必将得到更大发展。

广饶盐业历史悠久。据《中国盐政史》载:早在公元前 20 世纪虞夏之时,“洪水初平,盐业早兴”。据《尚书·禹贡》篇载:本地为“古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斥卤,厥贡盐湑。”沿海居民赖煮海水为盐,每年向官府交纳大量盐斤作为贡赋。至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初期,《史记》云:姜尚治齐,鉴于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通渔盐之利,而人民归之”。说明本地为盐斤重点产地,民多其富,外地迁入沿海煮盐者日增。公元前 685—公元前 645 年的春秋前期,按照齐相管仲“官山海”政策,本地盐业实行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所产盐斤,概由官收、官运、官销,齐国赖煮海之利,国富民强。据明嘉靖《青州府志·山川》乐安海篇记载:“管子称海王之国,谨正盐荚,故告其桓公,伐菹薪煮海水为盐,正而积之,十月至三月成三万鍾,公使巢之,得成金万斤,而国霸天下,即此海也。”这说明齐国充分利用乐安沿海这块宝地,大兴渔盐之利,所产之盐顺济水运销宋、梁、卫、赵,而得以富强。

到战国初期(公元前 547—公元前 490 年),齐景公废除“民制为主,官制为辅”的政策,改民制为官制,民多怨愤,盐业时衰。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的秦朝时期,本地盐制改为产、运、销听民自由,盐业苏醒。特别是汉兴以后,盐制多为贵族豪强所垄断,在齐地经营煮盐、捕鱼,家产达数千万,富比王侯。至公元前 119 年(汉元狩四年),汉武帝采纳张汤建议,盐的产制概由官府招募民众及被流放的人制作。煮盐器具概由官府供给,所产之盐为官盐,由国家统一收购,官运官销。至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元封元年),为加强盐业管理,推行官营专卖制,朝廷于千乘郡乐安县(今广饶)设置盐官,为全国 37 个盐区直派盐官县之一。本地盐业大兴。

公元 758 年(唐朝乾元元年),本县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直接专卖制,凡制盐者,须经官府许可,专户立籍,集于亭场,称为亭户,所产之盐概归官收,私自产运者按私盐论处。至公元 1053 年(宋朝皇祐五年)3 月,齐地大风,海水暴涨,千乘(今广饶)沿海盐民遭灾,家产荡然无存。死者几半,生者背乡离井外逃,弃滩务农,盐业时衰。经过灾后 74 年,到公元 1127 年(北宋靖康二年),盐业已走上复苏,为便于缉私,在盐场周围修筑场塹,盐的产制、储存其内,此为建坨之始。公元 1138 年(金天眷元年),千乘县改为乐安县,隶属益都府。据《中国盐政史·

盐产》山东篇：元、明两代均设盐场 19 处，本地即有三处。公元 1265 年（元世祖至元二年），本县即有辛镇、王家岗、高家港三场，是年盐斤旺产，辛镇盐场司创修圣庙，庙宫、学舍俱备。至公元 1283 年（元至元二十年），为加强盐斤管理，朝廷在高家港设滨乐使司，至公元 1368 年（明洪武元年），朝廷将高家港滨乐使司改为滨乐分司，掌管高家港、海沧、掖县等 11 场船只运盐验证签发。是年，整理场产，签民为灶，对灶户普遍进行登记，按户计丁，按丁计盐（名为盐额），每灶一引，支付工本，并划给草荡以供柴薪，可耕者准其开垦，并免其杂役，每交盐一引（合 200 斤），支付给灶户工本费粮一石。为发展盐业，官府规定对灶户犯罪者，准予杖后计日煎盐赎罪。公元 1369 年（明洪武二年），又置乐安批验所，公元 1391 年（明洪武二十四年）盐业兴盛。据史料记载：青州府发盐钞时，乐安县所在 13 产盐县中占据第二位。公元 1522 年（明嘉靖元年），为缉私护税，在乐安县城北门内置税课司，设大使一员（从九品），攒典一员，巡警 12 人，并在交通要隘分设守备。

公元 1644 年（清顺治元年），辛镇、王家岗、高家港三场仍属滨乐分司。其中王家岗灶丁 820 人，辛镇灶丁 885 人，高家港 736 人，每丁定额产盐 214 斤 8 两。至公元 1662 年（清康熙元年），乐安县盐业由煎制转为晒制，这是盐业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开创了晒盐历史新纪元。至

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高家港和辛镇二场裁归王家岗场,拥有灶丁2758人,灶地616顷82亩2分8厘,滩池32副,年产原盐224万斤。据清《盐法志·穿筑》篇载:“王家岗场,东西以小清河为交通最便之中枢,南有鳧汀河、扒拉沟,北有支脉沟、咸水河,引纳海潮极便,故山东各盐场以此为最”。沟滩晒盐大兴,因此,王家岗场署除扩大沟滩晒盐外,对八面河(原高家港场)实行挖井提水、修滩制卤晒盐,新建成井滩15副,从此原盐产量大增。当时该场共有滩地47副,年产原盐280万斤,正如新修《盐法志》记述:“王家岗场二月修滩开晒,六月雨季停晒,王家岗场以截潮纳沟入滩,以风车向滩池汲水,井滩以柳斗汲水入圈制卤灌池,天晴三、五日即可成盐,若遇阴天,尚须多日,池大者一次可得盐1500斤,池小者可得盐1000斤,盐质清白,味咸带甘”。为加强盐斤管理,从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至公元1733年(雍正十一年)分别在辛镇、王家岗、八面河各设坨垣一处,将各滩场所产之盐,集运归坨管理,各盐商持证入坨筑包运销。

此后,由于多次海潮暴涨,又遭渤海大地震几次波及,盐田每次受到较大破坏。例如: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渤海湾(北纬38.9°,东经11.9°)发生大地震,破坏面波及纵横300余里,盐田遭受严重破坏。公元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春,大海潮漫溢

盐区,浸入内地 80 余里,潮位高达 6—7 米,持续四、五天方退,盐田滩池皆被荡为平地。海潮退后,八面河井滩整修生产,王家岗重整滩池相继开晒。到公元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又重新治理小清河,从博兴龙注河东至羊角沟海口,正河长达 110 里,拓宽河面 30 丈,挖深 1.3 丈,出土成堤,使海运与河运连接起来。王家岗盐,由小清河上运济南黄台码头转销各地。公元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为防御海潮对盐田滩池的侵袭,动工修筑了马家楼至沙营防潮大坝,全长 20 里,高达八、九尺,为本县盐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到公元 1894—1896 年(清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黄河 3 次决口,永阜盐场被冲毁。原由永阜西运 60 州县之盐不敷需用,改由乐安县的王家岗和寿光县官台两场借运。

为保证食盐供应,王家岗场署奉省抚运使司之命,在本县境内南自宁海寺起,北至沙营这百十里滩涂上,择地建滩。在王家岗、沙营、辛镇扩建沟滩百余副,在唐头寨、高堤、田家坞等地新建沟滩 60 余副,在八面河、龙车道、宁海寺建井滩 440 余副,共建滩池 600 余副(滩池布局,沟滩每副为 5 圈 6 池或 5 圈 12 池,井滩大部分是一滩一井 5 圈 4 池)。年产原盐 20—36 万包(每包 400 斤)。据清《盐法史》称:王家岗场所产之盐皆由新辟新清河航道

西运济南,供销本省为北运,供河南归德属者为南运,每年运出盐斤 20—30 万包,是本县盐业史上极盛时期。至公元 1908 年(宣统元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日深,政局日坏,加之盐区屡遭海潮和洪水侵袭,盐田受损严重,盐民弃滩增多,盐业严重衰落。

公元 1914 年,乐安县复名广饶县。9 月,山东盐运使署令广饶王家岗场和寿光县官台场合并,初定名“官岗场”,场署驻寿光县的侯镇。全场共有滩池 1062 副,至 1917 年,因王家岗、辛镇、沙营滩场生产积压过胜,盐斤滞销,再加距小清河远,运盐不便,奉令废除。1918 年“官岗场”更名“王官盐场”,场署迁驻羊角沟,设知事 1 人(后称场长),在侯镇设场佐 1 人主管盐务。1920 年,王官场对盐田滩池进行丈量,登记造册,小清河南北 4 个盐区,共有滩池 517 副,盐民 2848 人,年产原盐 140 万担。直至 1932 年 8 月,省政府指定王官场署将小清河北岸的高堤等 28 副盐田,因滩池小,漏税甚巨而撤除。但在唐头寨滩主之盐田仍在维持生产。至 1937 年 8 月,黄河从蒲台县正觉寺大堤决口,洪水一泻千里,将广饶县小清河北 200 多个村庄和盐区的三义堂、德聚昌、福花泰、会昌等盐田全部冲毁,广饶盐区之盐田皆废。

1939 年 1 月,日本侵略军占据广饶县城,羊角沟盐区也为其占领。日军为推行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对

食盐实行统治配给，对解放区实行禁运禁销。为粉碎敌人封锁，广北人民在中共广北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遵照“发展盐业，增加收入，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于1942年在三岔和三柳树等沿海一带村庄，发动群众择地建滩晒盐。当年新建滩池200余副，所产之盐除盐民以盐换粮自需外，并输入敌区以盐换回战需物资，支援抗日战争。为加快盐业发展，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明令废除封建滩主对滩场的世袭制，宣布滩场为国有土地，谁开发归谁使用，大大的调动了盐民生产积极性，是年产盐800万斤。

为大力发展盐业生产，1943年冬，中共清河区党委派工会会长孙效之和妇联主任王月村来广北县。与县委协商后，会同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宋立言、十区区长庆开三等人，组成原盐开发领导小组。一面发动群众插伙择地建滩晒盐，一面组织群众集资入股创建福顺兴盐业合作社（后为盐店）。他们将盐民所产的原盐，收购集坨专运、专销。经组织发动，入社群众达1700多户，筹集资金39892元，粮食28.8万斤。为鼓励农民发展盐业生产，1944年春，政府还贷给盐民粮款20万元，先作为购盐定金，后以盐偿还，盐民借本生财，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三岔、赵咀一带群众，到三柳树、闫家沟、刘家沟一带择地建滩，支脉沟两岸广阔的滩涂上，盐田滩池星罗棋布。是年，

滩池已发展到 300 副，盐工达 854 人，年产原盐 1212 万斤。1945 年 7 月，渤海后勤处在广饶县唐头寨一带，择地建公营“新兴盐场”，修建滩池 8 副，盐田面积 6825 亩，年产原盐 2400 吨，该场对外为盐场，对内为军用仓库。是年，广北三柳树村，在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长李田英的带动下，有 26 名青年妇女参加晒盐，被称为“荒滩上的一面红旗”。1945 年盐滩发展到 407 副，盐工 2868 人，年产原盐 1600 万斤。

在解放战争期间，盐业生产相继发展。据 1946 年《渤海日报》载：广饶七区民主政府，春天贷粮贷款发动群众晒盐，共有滩池 314 副，组织盐民 1030 名，年产盐 2575 万斤。是年 10 月，渤海行署颁布《盐业运销管理暂行办法》，实行民产官销，并确定本县食盐向以博兴、桓台、高青、邹平等县为主销售，及时扩大了盐斤销路。1947 年秋为扩大原盐销售量，福顺兴盐店增设福东（驻田庄）、福成（驻辛镇）、福昌（驻武王）三个分店，并在牛庄、南薛、宁家、史口等村设立办事处。1948 年，广饶盐区已有 61 个村，建滩 204 副，年产原盐 2640 万斤。当时的生产条件非常低劣，压池人拉碌碡，提水人工曳柳斗，提卤柳斗量，收盐用榆木杠、大荆条筐靠肩抬，全是笨重的体力劳动。

根据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华东和山东省盐务会议决定“改变广泛增产与轻税倾销政策，

为增税减产,发展集中滩,限制分散滩”的精神,本县年内共裁盐田滩场 204 副,转业盐民 880 人。为便于集中管理,国营新兴盐场机关由唐头寨迁往河岸南台,后又迁往羊角沟。此时,广饶盐区仅有 8 副滩。1952 年因广北农场引河水灌田,淡水冲淡地下卤水,经上级批准将其废弃。从此,广饶盐区至 1958 年,在 6 年期间无滩场。

1958 年 8 月,广饶县委根据省工业会议精神,组织各公社在东海熬肥,后因实效不佳而停办。1959 年 2 月,中共广饶县委和县人委,根据国家对原盐的大量需求和国务院《关于恢复与发展民营盐滩的指示》,决定将已在盐区熬海肥的 18 处公社的 1327 名熬肥工人,转入辟滩晒盐。至 4 月底,已挖土方 17 万立方米,修复老滩池 19 副,建设盐田 4278 公亩,打井 45 眼,挖大型排水沟 7 条计 6 华里,滩沟 48 条,当年产盐 3515 吨,每吨售价 193 元,可收入 67.8 万元。为加强盐务管理,撤销县东海熬肥指挥部,设置广饶县盐务局,管辖 1 个县盐场和 18 处公社盐场。由于初创时缺乏管理经验,当年有 6 处公社弃滩,所遗 670 公亩盐田,由县拨款 3 万元抵偿。并以此为基础上组建地方国营广饶县盐场。当时有盐田 3608 公亩,职工 56 人。1960 年,通过扩建,全盐区共有盐田 14532 公亩,年产原盐 14896 吨。当时十九户村的户籍为羊口镇城市户口,经省决定划归广饶所辖,并经县人委批准,将

该村 19 户 80 人归入县盐场,30 名男女青壮劳力转为盐场工人,壮大了盐场职工队伍。

1961 年至 1962 年,由于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通过调整,县砖瓦厂、菌肥厂、糖酒厂、陶瓷厂和渔业队部分工人、财物相继并入县盐场,职工由 150 人调减为 100 人。社办盐场除保留牛庄、张枣、赵咀、民丰四处盐场外,其余均并入县办盐场。1962 年,当时全盐区只有县盐场、广北盐场和 4 处社办盐场,滩池 12 副,盐田面积为 6165 公亩,制盐工人总数不足 300 人,年产原盐 9608 吨。

1963 年 1 月,县盐场由全民企业转为县集体企业,改名为广饶县东海合作盐场,至 1964 年通过“填平补齐,充实提高”,新增盐田 7286 公亩,年产原盐 18976 吨。至 1966 年 6 月,广饶盐业在中国盐业公司和省盐业公司统一安排下,实行“托拉斯”盐业改革体制,广饶县盐务局与寿光县盐务局合并,定名“山东羊角沟盐务管理局”,广饶县合作盐场与山东莱央子盐场和寿光岔河盐场合并,定名“山东羊角沟盐场”,局场合署办公,隶属中国盐业公司。

1966 年 7 月至 1970 年 10 月,广饶盐业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遭到严重干扰,特别是 1969 年,原盐产量由 1965 年 18975 吨下降到 9361 吨。在这期间,盐产量远远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于 1967 年春,县人

委拨出无息贷款 3 万元,支持 18 个生产大队到盐区择地建滩。至 1969 年,全盐区有县盐场、广北盐场、民丰社办盐场各 1 处,生产大队盐场 18 处。共建盐田 15620 公亩,产量未达到设计能力。

自 1970 年冬到 1976 年,广饶盐业趋向高潮。由于广大职工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在 1970 年冬天,县盐场用自有资金,新开辟联片成方适应机械操作的新型盐田 4970 公亩,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新设置县盐场第七生产队。1971 年盐业“托拉斯”撤销,广饶年产原盐 21464 吨,超当年国家计划一倍,创建场以来的最高水平,获惠民地区轻工局通令嘉奖。《大众日报》、省广播电台报导了《广饶盐业工人创高产》的先进事迹。自此,盐区按照三化(盐田结构合理化、工艺科学化、生产机械化)、四集中(扬水、制卤、结晶、集坨)和新(卤)、深(卤)、长(长期结晶)的工艺要求,对老滩进行改造。1974 年,县盐场用扩大再生产的自有资金,在支脉河南岸新建新型盐田 8000 公亩,新设置第八生产队,使盐区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从 1970 年冬至 1974 年,全盐区已有 3 处公社,25 个生产队相继来盐区建场。到年终滩池已发展到 68 副,盐田面积已达 34068 公亩,年产原盐 48533 吨,产销基本平衡,每年上交税金 500 万元。1976 年,全盐区已有 3 处公社,40 个生产大队来盐区建场,盐田已达 45758

公亩，年产原盐 52565 吨。为及时把滩场的原盐归坨，省投资 23.3 万元建设东坨基，面积达 3 万平方米，坨房 49 间，容量可达 6 万吨。为保证原盐运输，投资 33 万元，建设盐区四通八达的沥青路，保证了运输畅通。

1977 年至 1987 年，在这 10 年中，盐业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广饶盐区历经了大干、调减、实行“三个转变”到稳步发展的过程。其中 1977 年到 1978 年，为加强盐区建设，省投资 22 万元，架设从广北农场至盐区东坨基 10 千伏输电线路，长达 17 公里，盐区自此开始了电气化生产。至 1979 年，由于受当时求成过急的影响，全县有 21 处公社、44 个生产大队，近万人大军纷纷来盐区择地建滩，有史以来建滩达到高峰期。到 1981 年，盐田面积由 1976 年的 45758 公亩增至 81684 公亩，年产原盐由 1976 年的 52565 吨增至 13.2 万吨，致使产大于销的矛盾日益突出。1982 年全县存盐 16 万吨，相当于当时年销量的 3.3 倍，造成全县乡镇、村办盐场的经济困难。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县盐务局经两次请示省财政厅批准减税 112 万余元，社队盐场仍亏损 61 万余元。为摆脱这种困境，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原盐积压情况和调整意见”的精神，实行“以销定产，限制产量，提高质量”的措施，并对社、队群众自动开发的小型盐田，通过讲明政策，做好工作予以废弃。对已

废弃盐田的原盐,由县盐务局按计划逐年销售。经过以上工作,到 1983 年,全盐区已有 30 个社、队盐场弃滩停晒,计废弃滩田 26573 公亩,削减盐年生产能力 4.3 万吨。到 1984 年底,经限产和转产措施,有盐场 27 处,其中县盐场和广北盐场各 1 处,乡镇盐场 9 处,村办盐场 16 处,盐田面积为 61246 公亩。县盐场经过狠抓原盐生产质量和加强技术管理,年产原盐 5.5 万吨,质量全部达到优一级品。从 1984 年到 1987 年,连续被省评为全省盐业系统先进企业。

为了谋求盐业更大发展,1984 年广饶盐场根据省盐务局“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实现三个转变,努力开创盐业新局面”的部署,结合本地盐区资源丰富,对原盐实行“以销定产”,并由单一的原盐生产转变为洗精盐和盐化工生产,利用沿海滩涂,发展水产养殖业和开源节流多种经营。经过艰苦奋斗,至 1985 年建起养鸡场和养鱼场各一处,养虾 1000 亩,年产虾 3.77 万斤,年收入 36 万元,养鸡 2000 余只,年产蛋 26185 斤,年收入达 52 万元,并新建养鸭场一处,当年养成鸭 5000 只。建成年生产能力 3 万吨洗精盐厂,并生产部分加碘盐和营养盐,畅销淄博、济南、临邑、邹平、滨州、东营等 12 个市县。生产的大众营养盐远销广东的佛山市和山西太原等地。同年被省评为全省盐业系统先进企业。并有部分原盐打入国际市场,向

朝鲜出口原盐 12281 吨。为了改善运销条件,1987 年经省盐务局和小清河航运局批准,投资 54 万元建设小清河运盐码头(后定名广清码头),现已为省辖盐业转运站。当年 6 月动工兴建,至 10 月 2 日竣工。可泊 800 至 1000 吨货轮,年吞吐能力为 20 万吨。可由小清河西运直达济南,东运可由海路直达龙口、威海、营口、大连;陆运可由广青沥青路直达东营火车站,运往全国各地。为了进一步开发盐区,1988 年,广饶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国家对原盐需求和广饶盐区的资源丰富的实情,在省盐务局全面规划、统一部署下,投资 3000 万元,开发年产能力 18 万吨规模的技术改造项目。经过 3 年奋战,至 1992 年建成投产。广北盐场与广饶盐场同时迁移地址,开发适应机械化操作的新型盐田 2 万公亩。广饶盐场已建成联片成方的大型盐田,从上水、制卤、收盐、运盐、堆坨等主要生产工序,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生产。

广饶盐业自 1959 年恢复生产至今已达 30 余年,现有县营盐场和广北盐场各 1 处,县营洗精盐厂 1 处,乡镇、村办盐场 7 处。其中县营盐场,固定资产原值 8200 万元,净值 7670 万元,职工 95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36 人,占职工总数的 3.7%。全县盐田面积,由 1959 年的 4278 公亩,扩大到 23.6 万公亩;原盐生产能力由初建场年产 3515 吨,提高到年产 30 万吨能力;原盐质量由初建

场一级盐占 37%，二级盐占 55%，三级盐占 8%，提高到特级品占 32%，优级品占 67%。30 年来，盐场扩大到当今规模，并累计实现盐税 13035 万元，从 1971 年至 1979 年，每年平均实现盐税 560 万元。

广饶盐场的科研项目亦取得显著成效。如地下卤源调研，已摸清卤源分布、储量、水位变化、化学组成等情况；解决卤水混浊，以盐田生物净化和防渗试验研究，已进入申报鉴定阶段；丰年虾（卤虫）加工技术研究，已取得了新进展；塑膜苫盖结晶池，已由推积法改进为浮卷法，现已苫盖结晶池 1.2 万公亩，增强了抗御天灾的能力；并有 17.5 万公亩盐田圈埵和结晶池埵用砖瓦砌护，改善了盐区卫生条件，使盐区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预见，广饶盐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广饶县供销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

常锡银

我党为了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于1941年初，在广饶北部建立了中共广北县委、广北县民主政府，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日伪合流后，敌人妄图窒息我区军民的生存，对我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恐怖和经济封锁的毒辣手段。广北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和工农业生产，保证军用民需，支援前线”的反封锁措施。这是在军事战线、政治战线对敌斗争的同时开辟的一项在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供销合作社的诞生

1. 广兴纺织合作社(广兴布店)

1943年，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大扫荡之后，广北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广北农村十室九空，劳动人民过着少吃缺用的艰苦生活。吃的是黄蓍菜种子，用火石火镰点火，以蒿子油点灯照明。敌占区的生活用品，严禁流入我根据

地。中共广北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决心领导群众度过难关，恢复生产。于这年10月19日聘请在纺织、商贸方面有经验的30余人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和根据地盛产粮、棉的优势，当地群众有土纺土织的技术条件，土布可以解决军用民需，又可以到敌占区换取其他军需急用物资，当即提出3条措施：

第一，成立纺织合作社，收购棉花，收购产品或推销产品，来料加工付加工费等方式开展业务。对社员实行优先优待政策。

第二，提高生产技术，将手梭改为拉梭或纺纱机、织布机。

第三，成立以隋殿九为主任、王子平为副主任的15人推销委员会。

会后即筹备创办了广北第一个纺织合作社，命名为“广兴纺织合作社”，对外营业名称为“广兴布店”，店址设在八区牛家庄。广北县各救会长宋立言为经理（兼），王子平为副经理。

广兴布店创办初期，群众踊跃入股，发展社员4700名，股金14万元（北海币，下同，至建国前），向银行贷款33万元，于1944年元月正式开业。经营方针是：以发展纺织为中心，保证军用，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发展农副业生产。具体做法：贷棉、收布、支工资（以粮作为工资

支付方式),为群众推销棉花。同时经营当时群众需要的中、小农具、纺织工具、日用杂货、文具、砷石(精)等。同年7月召开了首届社员代表会议,对上半年的经营及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贷出棉花23402斤,组织纺织妇女1369人,织布机220张,安排熟食业120户;半年盈利22万元,社员股金每元分红1.20元。为奖励纺织模范,发奖金1.4万元。会议期间就扩大股金5.7万元。年末股金达到598万元。

2. 福顺兴渔盐合作社(福顺兴盐店)

1944年4月,由渤海军区牵头在北十区田庄、武王一带建一处以王德卿为经理、许树堂为副经理的渔盐合作社,对外营业名称为“福顺兴盐店”。以利用地下卤水晒盐和为盐民生产、生活服务为主,兼营棉花、粮食,发动群众为我军织裹腿、做军鞋,并经营群众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等。拥有社员3000人,股金6万元,渤海军区资助红粮300担(折款50万元)开业。

3. 广济医药合作社(广济药店)

中共广北县委、县民主政府为了解决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于1944年10月,经上级同意成立了一处医疗卫生机构,即在牛庄村创办了以黄金印为经理的广济医药合作社,对外营业商号为“广济药店”。设有药铺,进行草药和草成药加工。有4名在社会上各有专

长的名医治病,还专门配备了其他医护人员。在成立后三年半的时间里,为解救群众的病痛疾苦、社会防疫(接种牛痘防天花)、平抑药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群众欢迎和称赞。据有关资料载,如薛暮桥著《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文中称:“广饶广济医药合作社为全县人民治病,今年(即1946年)上半年就治愈12000余人。”《渤海日报》1947年2月22日报道:以燕儿口附近7个村的统计,在广济药店成立前的1943年,经农村医生为患病者诊治疾病中,治愈率为18%,广济药店成立后的1946年,经广济医药合作社医生诊治的病员,治愈率为98.2%;接种牛痘防治天花,对贫农、烈、军、工属实行免费;广济药店销售的中药饮片、膏丹丸散的价格与私营药铺售价比较,仅1946年全年销售量计算,即为群众节省400多万元。

1948年2月21日,广济医药合作社的药材业务和部分人员合并于广饶县县联社。以广济医药合作社的医疗设备、部分干部、医护人员为基础成立了广饶县人民医院(今县医院前身)。

4. 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

为支援解放战争,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由县人武部牵头,发动机关、民众团体集股,于1946年11月18日成立了以黄存厚为经理、武家训为副

经理的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主要任务是：制造地雷、手榴弹，为地方武装和民兵修理枪械。同时修造中、小农具、轧花机和零件、纺织工具和铁锅，兼营粮、棉、杂货等。集资入股社员 767 名，股金 2312577 元。集股社员均系机关、团体股。如三分区人武部入股 20 万元，广饶县人武部入股 26 万元，博兴县人武部入股 41 万元，机关入股 141 万元，余为农村群众团体入股。从成立到合并县联社的一年内，生产各种产品 2.2 万件，产值 1576 万元，对社员优待额 111750 元。综合盈利 31582708 元。分配比例为：股金分红 50%；公积金 30%；职员分红 13%；劳动分红 4%；公益金 3%。社员股金每元分红利 5.3 元。

广兴纺织合作社（广兴布店）、福顺兴渔盐合作社（福顺兴盐店）、广济医药合作社（广济药店）、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业务上的从简到繁，已成为广饶县农工贸经济综合部门。是渤海行政区根据地建社最早、门类齐全的合作事业组织，是当时广饶县对农副产品收购、推销，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组织军用民需生产的农工贸经济枢纽和主要经济命脉。

“广兴”、“广济”、“福顺兴”、“群力成”4 社的成立和它走过的路程，办社的民主性，管理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性都在各方面体现出来。对于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支援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经济，繁荣市场，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减少流通领域中间盘剥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为适应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和老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按照山东省实业厅提出的“扶持群众纺织，发展运输业务，保证供给，直接支援战争”是合作社基本任务的要求，在中共广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于1948年2月以广兴纺织合作社、福顺兴渔盐合作社、广济医药合作社、群力成铁木业合作社，合并成立“渤海区广饶县县联社”，分别选出了县联社负责人：理事会主任王子平，副主任宋振庆，监事会主任徐田村（兼），社址仍在八区牛庄村，于1949年迁往广城。1950年6月，根据省政府通知，改为“山东省广饶县合作总社”。1951年，更名为“山东省广饶县合作社联合社”。1956年更名为“广饶县供销合作社”（即今名）。

县联社成立后，当即派员在掖县（现莱州市）沙河镇设立了运销站，该站对沟通两地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县社由八区牛庄村迁至广城后，在牛庄设立了运销站，主要负责小清河北六、七、八、九4个区社和部分乡社的业务指导；购销业务协调；农副产品购销和工业品的批发业务。在工作上除对广北4社进行业务巡回督导外，牛庄大集（二、七）实行业务调度制度，起到了分片指导的作用。该

站于 1952 年撤销。

“广兴”、“福顺兴”、“广济”、“群力成”4 社的成立,为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信赖和拥护。在物质上、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启发了群众自己办社的要求和愿望。在以上 4 社的影响下,八区东武村、七区辛桥镇于 1944 年办起了村和联村合作社,即东武村办起了“同兴铁木业合作社”;辛桥镇办起了 7 个村的联村“新兴合作社”。这两个社的成立,为军用民需和当地的农副业生产服务,对繁荣农村经济,成立基层供销合作经济起了示范作用。

“同兴铁木业合作社”、“新兴合作社”各有特点,分别主要是:

1. 东武村属八区,是一个有打铁传统技术的村庄,“武家镰”在当地颇有名气。这里农业主产粮棉,又有土纺土织的技术。“同兴铁木业合作社”的成立,首要任务就是服务于本村的传统技艺(打铁),收购、推销农副产品;服务于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的采购和供应。合作社成立后,门庭若市,交售铁器制品、农副产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人来往不断。全村户户生炉火,昼夜打铁忙,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2. 辛桥镇属七区,是一个交通、经济闭塞区域,“新兴合作社”成立后,承担了为部队军用纺线、织布、做军鞋、

织裹腿(任务性给料加工)、收军用柴草的任务。对农村推销农副产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设医设药为群众防治疾病。同时承担着渤海行署部分区域军、政、民需物资向胶东、辽东半岛及济南沿河输出、输入的任务。为此,在大湾(通小清河的一个水域名称)设了装卸、转运物资、停泊船只的码头,成了鲁西北地区连接胶东、辽东半岛及济南沿河的物资转运枢纽。码头内外车水马龙,合作社的门店人来客往,川流不息。农村的农、副业生产热火朝天,日趋繁荣。农副业生产收入增加,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当地群众对“新兴合作社”视为吉祥的象征,当时有不少人给小孩起“新兴”、“社”的乳名。事隔近50年,现在当地群众到供销社的门市部买东西,还沿用“上社”、“赶社”的习称。

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普及和蓬勃发展

原广北县辖7个区(五、六、西六、七、八、九、十),从1944年起,我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我根据地更加巩固,胜利的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因此,基层供销经济组织相继在广北的4个区内迅猛发展。广兴纺织合作社分别在六、七、八、九4个区,设立了“广丰”、“广源”、“广裕”、“广信”4个分店。“广济”医药合作社也在六、七、九、十4个区设了分店,从

而推动了农村合作经济的大发展。到 1946 年底,广北 4 个区的村社、联村社发展到 135 处,社员 30786 人(股),股金 5162 万元。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把 4 个区的 8 个分店按行政区合并为 4 个区联社。村社、联村社是区联社的社员社。村社、联村社除冠以自然村和驻地村名称外,对外营业有的以商业字号命名,如八区牛庄村合作社商号为“聚东”。同时一些联村社成为区联社与村社联系的桥梁,形成了乡社的雏型。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广饶全境解放,恢复了原来的县境版图,广北县改称广饶县建制,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移驻广饶县城。随着全县整个工作的进展,广南各区的村社、联村社也相继发展。到 1947 年 10 月广城二次解放后,广南各区的农村合作社发展到 110 处,但由于对办社的方针不明确,办社经验不足等原因,到 1948 年即有 48 处村社因经营管理不善,折本解散。

1948 年,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整顿村社。主要是教育干部职工,在全国解放后即将进行全面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树立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思想。办社平均入股不分红,实行对社员推销农副产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优待价的办法,使合作社转为供销合作社。

1949 年底,没有设立供销社的区,由县联社派遣干

部,带着简单设备、货物到当地一面经营一面组社(如三区、四区、五区、十区)。已组社的区和乡、村联社比较巩固或已打起骨架的,以他们为基础,进行巩固。如一区虽没有设立区供销社,但城郊、梧村、颜徐都建立了较巩固的乡供销合作社。到年底共有区供销社8处,乡(中心社)供销合作社和村供销合作社196处,社员57577人(股),股金234670573元。到1950年,11个行政区建制内,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

业务范围和承担过的历史任务

广饶县的供销合作社,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坚持生产自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军用民需供应,当时的区、乡、联村和村合作社,为战时的军用民需,组织农村群众加工土布、军鞋、军袜,收储军用柴草及上级安排的其他任务,为农民推销农副产品。各级合作社,还根据本区域的条件开展业务。一般地说,都设有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农副产品的收购推销,并设有医药、粮棉油购销、印染、弓坊、铁木加工、饭店等项业务,并为军队和国营贸易单位及上级社代购代销。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军用民需的唯一依托。建国后,随着整个经济发展,除原来业

务的进一步扩展外,农村的主要农副产品、土产废品的收购、加工、推销、调存和新式农机具、药械的推广、维修及农业技术指导,农村种、养、加工、多种经营的指导管理都由供销合作社承担。对农村的集贸市场,进行全面安排和管理。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承担了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的组建任务。从1953年起,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供销合作社承担了手工业和农村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它在各个时期,都卓有成效的完成了任务。

供销合作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领域不断扩展,逐步形成了一身兼二任的农村商品流通和无所不包的农村经济体系。形成了城乡经济必不可少的纽带和枢纽,是农村经济和商品流通领域管理、流通的主体。五十年代,在农村已成为唯一的经济命脉。它所承担的任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分工细、业务专的要求,有一部分业务,按业务性质,逐步移交有关部门,成为专业组织。

供销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机构实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领导机构由社

员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选出的理、监事会各尽职守。为了保障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供销合作社坚持民主管理的制度。社员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不论入股多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关供销社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社员或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帐目、经济公开，经济、经营管理、干部作风和服务态度、执行政策接受监督。

办社的原则和经营方针

供销合作社在建设中，始终坚持“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原则。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的指导下，坚持自主灵活的经营特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经营作风，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群众服务，又购又销，综合经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顺应了农民群众的心愿，赢得了社员群众的信赖。

供销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中，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的保本经营，有的折本经营，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合同预购、订购，预付定金或实物，同时对生产和生活资料还实行订购合同制度。不论商品的收购或供应，都要坚持维护社员群众的利益，严格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和购销政策，做到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童叟无欺。在经营方式上，除固定网点外，为了方便社

员群众买卖，它的干部职工，推车搭担送货到村到户。生产和生活资料，根据一年四季的实际需要，做到商品及早到位，保证正常供应。节日（如仲秋、春节等）供应，据群众必用的节日物资，从吃、喝、穿、用、玩都是提前安排计划，花色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供销合作社的干部职工，一心为公，一心为社员群众的思想，团结奋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俭节约办社的作风是值得赞誉的。供销合作社，从业务经营，到干部职工的思想、作风和服务态度，与社员群众结成了鱼水关系。

目前，全县供销系统现有干部、职工2290人。县联社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下设11个科（室），5个直属公司，一处广饶大厦，四台型的油棉加工厂3处。现境域内基层供销社15处，216处销售网点，拥有固定资产2243万元（原值），公积金2275万元，社员股金135万元。1989年，全县供销系统完成纯购进总额13012.70万元，商品纯销售额完成9563.7万元，实现利润704万元，全系统上缴税金440万元。

广饶县供销合作经济，历经50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经营上从简到繁，已成为全县农村商品流通领域的主渠道，是农村商品流通、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中“一身二任”不可取代的支柱，是一个卓有经济实力的经济财团。供销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不论在历史上，还

是现在,都为广饶县经济的振兴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加速发展城乡经济的新形势下,供销经济是责无旁贷的桥梁和纽带。

(广饶县政协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印钞厂

侯荫南 刘敬石 王级三 李广仁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很多，有法币，有日本“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还有地方上许多私人的杂牌票。我们每开辟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推广使用发行我们的货币，与敌人争夺市场，抢购物资，支援抗日武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印钞厂，北海银行印钞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海银行印钞厂属于清河（渤海）行署管理，曾被成建基匪徒破坏，1941年底在垦区惠鲁村恢复生产。清河行署财政处处长王友山兼任北海银行行长，以后马汉三继任行长。

银行下设发行科，科长刘克文，以后赵子谦继任，会计科科长薛品三，出纳科科长刘绍久。每个科有三至五人。发行科下设印钞厂，印钞厂教导员是曹子明。印钞厂由保管股、印刷股、会计股和鉴定股组成。全厂加上警卫排，共五、六十人。印钞厂在惠鲁时是石印，有三

台手摇石印机，用脚踏子印号码，主要印角票。开始印的是“益寿临广流通券”，以后是“清河区流通券”。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会计科和出纳科的科长、保管员都住地屋子。

印钞厂在惠鲁时，因离八大组太近，日本鬼子常去扫荡，所以于1943年4、5月份迁到杨家村北。发行科和会计科仍留在惠鲁。1943年9月，冀鲁边区的30多名同志过来，全厂有七、八十人。这时指导员是曹子明、侯荫南、张瘦梅，厂长是李聘周，保管股股长王兴知，鉴定股股长刘敬石，总务股股长马相武、副股长毛振东。车间内分裁纸组、石印组和铅印组。印的北海票面值为一、三、五角和一元。票值与现在的人民币差不多。在印钞厂附近有家农民叫李万绪，我们吃的面都是他给磨的。

1943年阴历11月，敌人对我们所在地区进行了二十一天大扫荡。扫荡前，我们得到情报，把机器和印刷材料都埋藏起来，并在厂里埋了地雷，我们大部分人员荫蔽在工厂附近二里多的地方，其他部分分散转移到小清河以南、沾化县的郭家局子，还有的到了海里。日本鬼子进厂后，踩响了地雷，炸死一名汉奸，一匹鬼子的洋马。这次扫荡，我们损失比较大，警卫连和工人中，有几个同志牺牲了。炊事员许××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抓住后，敌人问他机器埋在哪里，让他领着去扒，

他宁死不说，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赶马车的李××也被俘，经不住敌人拷打，说出了机器的下落，并领着敌人去扒，结果，机器和印刷材料全部被敌人抢去。后来李××到八大组赶集，被我们抓住，公安局把他枪决了。大扫荡后，我们回到印钞厂，看到房子被烧，机器被抢，很多同志都难过地哭了。我们立即动手重建工厂，从胶东买来了新印刷机，又继续工作了。

印钞厂在惠鲁时有党员 14 名，一个党支部，书记是曹子明。支部以下有个分支，分支书记是张怀德。在杨家村时，有党员 30 多名，支部书记是曹子明、侯荫南、张瘦梅。

1944 年春，印钞厂迁往毕家嘴，有一部分在老爷庙。工厂近百人办得很兴旺。这时，印钞厂成立了办公室，厂长、指导员在那里办公。厂长是李聘周，指导员曹子明、侯荫南，鉴定股长是马俊杰、王政（女），总务股长是马相武、毛振东。这一年，印钞厂又成立了印制部、裁切部、成品部等，各部负责人分别是王曰彬、王精华、宋书城、王海元、李广仁等。

1945 年 8 月，印钞厂随银行迁往蒲台县的万家村，同年冬又迁往利津城，1947 年 8 月迁往庆云县。当时，有 6 个日本人在印钞厂工作，他们表现很好。

1946 年 9 月，因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鲁中南印钞

厂北迁，与我厂合并。这时印钞厂有 200 多人，工厂就比较正规了。厂里有警卫连，还办了铁工厂。

1948 年 3、4 月间迁往临朐县，1948 年 11 月迁往济南。

北海银行印钞厂之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保留下来，是因为有一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的职工队伍，有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我们的革命群众，才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王丁海整理)

广饶农机事业发展概略

梅庆龄

一、农机经营形式变革

农机经营形式，是指农业机械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归属问题。

1. 国营拖拉机站的建立与发展

国营广北农场，是广饶县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的先导和基础。该场始建于1950年，建场初期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培养干部，示范农民。”建场后农场的农业生产从耕、播、收全部机械化，附近的农民大开眼界，并逐渐产生了能在自己土地上使用拖拉机的渴望要求。农场为了示范农民，宣传机械化优越性，搞好场群关系，于1952年成立了为当地农业社机耕服务队，配备了6台拖拉机，18名机务和管理人员，杨匀任队长。当时机耕服务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组织较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全国劳模李田英、郭占一领导的三柳树、油郭农业社和杨耕田领导的民丰农业社等。凡机耕

播种的粮棉作物普遍显著增产，机耕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参观的农民、干部络绎不绝，扩大了影响，吸引了农民。

1954年4月，省农业厅召开了拖拉机站工作座谈会，总结了广北农场机耕服务队的工作经验。根据农业部“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的稳步建立新站”的要求，经省农业厅确定，在惠民地委、专署的重视支持下，以原广北农场机耕服务队为基础，于1954年5月正式成立了惠民专署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设在广北农场），李子元、李长文、杨匀分任正、副站长。

1955年3月，经上级决定将惠民专署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改建为广饶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为全省建站较早的13处国营站之一。该站建立后，于同年7月正式脱离了广北农场迁往六户村，住在农建二师调走后倒出的房舍，全是土平房，场地宽阔，可谓机械旋转之佳地。李长文、商堰仁分任正、副站长，党、政、工会、青年团组织健全，并设有机务技术、农业技术、财务、行政办公室和5个机耕队分片作业。

后因六户地理位置偏僻，当时交通不甚方便，经县委同意，省农业厅批准，确定在牛庄建站。当时国家投资21万元，于1956年开始兴建，占地面积133亩，建筑面积为2146平方米。1957年5月，农机站由六户移迁

牛庄。

拖拉机站由建站初期的 6 台拖拉机、18 名干部职工，至 1958 年底发展到干部职工 196 名、拖拉机 59 个混合台，并有多种配套农具和修理设备。除站内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较健全外，还设有 8 个机耕队，分布全县各地。作业范围遍及全县和博兴、垦利的部分农业社。

1959 年底，建站历时 5 年，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指示精神，国营机站要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到 1959 年 11 月 13 日下放工作全部结束。1958、1959 两年共下放拖拉机 56 个混合台和相应的机引农具、国家职工 62 名，机具总值 1,045,079 元。

国营拖拉机下放公社经营后，广饶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于 1959 年底撤销。

国营拖拉机下放公社经营，经过实践后证明，因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管理水平不适应，经营效果不佳。1962 年 1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前二、三年一度把拖拉机下放给公社实行社有社营，实际上投资还是由国家出，经营亏损还是由国家补贴，许多拖拉机站，在改为社有社营后，原有的一套规章制度废弃了，机器利用率降低，损失严重。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拖拉机由社队经营更为困难。因此决定一般收回，实行国有国营，

办国营拖拉机站。根据省农业厅指示，广饶县从1961年开始，除大王仍由公社经营（省农业厅指示保留）外，将辛店、牛庄、六户、花官、石村、城关、马头7处公社站收归国营。共收回机具价款（固定资金）671912元，配件物料等价款（流动资金）149567元，总计821479元。收回的机具价款，根据国务院1962年4月23日文件规定，本着既不平调社队财产，又不以现金偿付的原则进行处理。

根据省农业厅1961年5月26日《关于国营拖拉机站命名规定》的通知，广饶县拖拉机总站于1961年6月正式建立。站长杨凤梧，下设办公室、财务股、供应股、机务股和牛庄、花官、城关、马头4个分站，1个石村直属队，分片划分作业区，负责全县的农机作业。

1964年底，根据大王公社要求将拖拉机站收归国营的意见，经县人委同意，请示省农业厅以（64）农械字第64号文件批复，同意收归国营，并于1965年4月正式办理了收归国营的交接手续。

为了缩小服务半径，减少机车空行，更好地为社队农业生产服务，县拖拉机总站于1970年6月15日请示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了石村、西营、李鹊、稻庄4处国营拖拉机站。机具、人员主要是从原老站调配的。

至此，县拖拉机总站下属牛庄、花官、城关、马头、

大王、稻庄、李鹊、西营、石村 9 处国营拖拉机站，1 个拖修厂。

1970 年 9 月全省农机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集体的力量，国营拖拉机站下放公社经营，要搞好试点，有计划、稳妥地下放，条件成熟的先放，无条件的创造条件后再放，要下放一个巩固一个。

广饶县革委根据上述精神，制定了下放计划，从 1972 年开始至 1975 年 8 月先后将大王、城关、李鹊、西营、稻庄、马头、石村 7 处国营机站下放公社经营管理；牛庄、花官两国营站暂时保留。下放的机具和其他物资总值 348056 元。为了给社营站培养技术力量，加强技术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当时派往社营站工作的国家老职工 101 名。

保留的牛庄、花官国营站，1981 年 1 月花官合并牛庄站，1983 年底成立东营市牛庄区后，牛庄国营机站全部移交牛庄区辖管。

2. 社营拖拉机站的兴建

遵照毛主席“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的指示和 1958 年 5 月、1959 年 3 月、8 月三次全省农业机械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国营拖拉机站于 1958、1959 年分批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至 1959 年底全县先后建立了城关、石村、马头、大王、花

官、赵嘴、牛庄、六户、纯化、乔庄、辛店、民丰 12 处公社拖拉机站。1960 年底，12 处社营站拥有拖拉机 67 个混合台，机引农具 148 件。

但是，由于当时对集体经济条件、技术力量、管理水平的实际状况认识估计不足，片面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认真调查和试点，就急于求成，迅速下放，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结果证明，其管理和经营状况十分不佳。广饶县同样符合 1962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的情况。为此，根据省农业厅指示精神，于 1961 年开始将社营拖拉机站全部收回，继续办国营拖拉机站。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办企业的日益发展，人民公社办拖拉机站的积极性和条件日益高涨和成熟，国营拖拉机站已不能满足社队在农机作业多方面的要求。据此，根据省农机局的指示精神，经县革委同意，于 1971 年 6 月在颜徐公社进行社营站试点工作。试点结束后，县农机局根据上级有关精神，结合本县各公社实际情况，作出了分期分批建立社营站的实施计划，经县革委批准后，从 1972 年 12 月开始至 1977 年 8 月，全县 19 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社营拖拉机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机经营形式放开，在户营（个体）机械迅速发展的同时，社营拖拉机站受到影响，并

逐步产生了分化。

社营站的管理人员，一般设行政站长、机务站长、会计、出纳、保管、生活司务等，其余全是生产人员。社营站的职工，初建时，除派去的国家职工外，皆为亦工亦农的公社社员，其劳动报酬，不仅取决于社站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取决于所在生产队的收入水平。社员农机人员劳动报酬的支付，前期是“劳动在站，分配在队，站、队结算，适当补贴”的方式；后期是“站内分配”，即农机人员的劳动报酬，完全由拖拉机站直接支付。

社营站的机具设备是由公社筹集资金和国家支持购置的，直接为本公社农业生产服务，兼顾社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随着农业生产和社办企业的发展，社营农业机械发展较快，以1978年前后为最佳时期。从1972年建站至1979年的八年中，全县没有亏损站。1978年全县19处社营站拥有拖拉机155个混合台，7499马力，占全县总拥有量的21%，实现利润72万元。

社营站内部也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多数站的经济效益开始逐渐下降，有的机车承包后没有履行合同，不交承包费，机车损坏严重，有的将机车变卖。在个体农业机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营站的拖拉机台数大幅度下降，由1982年134个混合台，1985年下降为51个混合台。

3. 多种形式并存，农机事业大发展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农机经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国、社、队、户（个体）营农业机械各有兴衰、起伏时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成为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户营农业机械得到了全面大发展，并成为重要经营形式。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社营农业机械大幅度下降后，队营农业机械迅速发展起来。一部分土地多、经济条件好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了适时耕、播发展生产，积极购置农业机械，并逐渐由小型向大中型发展。队营农业机械以 1982 年为高峰期，至 1985 年大幅度下降。

户营农业机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放宽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兴起的。在中央 1983 年 1 号文件的鼓舞下，冲破了多年来“官办”农机的框框，使户营农业机械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农户自己购买，自己经营，或请帮手；亦有的联户购买，搞联营。在供应油料、供应配件、培训机手、考核发证等方面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

户营农业机械迅速发展为重要经营形式。1980 年全县户营拖拉机仅有 4 台、96 马力，1983 年发展为 780 个混合台、15036 马力，占全县总台数的 46.4%，农用汽车 38 辆，柴油机 1905 台。1985 年户营拖拉机迅速发展为 2160 台（小型占 60%）、53659 马力，占全县总数 2350

台的 91.9%，户营农机总值达 5182 万元，占全县农机总值 6145 万元的 84.4%。

广饶县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创办国营站、国营下放社营、社营收归国营、国营再下放至社营直至队营、个体户经营的发展过程，到八十年代初期，进入国、社、队、户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阶段。农业机械从建国初期示范推广发展到现在已成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的主要工具，改变了全县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1985 年底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228892 马力，其中拖拉机 2350 个混合台、64675 马力，农业机械总值 6145 万元，各类农机人员 9765 名。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维修、供应、人员培训、技术推广、安全监理、油料分配等工作，层层有人管，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日趋完善的农机管理体系。

二、农机行政管理机构

广饶县农机行政管理机构的设撤，均是随着两次国营站下放建立社营站而变动的。

1958、1959 年国营拖拉机站正在下放公社经营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社营拖拉机站的领导与管理，1959 年 1 月建立了广饶县人民公社联社农业部机械科。是年 8 月，随着广饶县人民公社联社的撤销，下属机构随之撤

销。

机械科撤销后，于 1960 年 2 月建立了县农业机械局，领导与管理全县农机工作，至 1962 年 6 月撤销。

1972 年国营机站开始逐步下放建立社营站，为了加强社营站行政领导与管理，撤销县拖拉机总站，建立县农业机械管理局。

公社农机管理站，是在农机多种经营形式并存，队营、户营机械大发展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县农机局根据省革委(78)187 号文件精神，经请示县委同意，至 1979 年底，全县 19 处公社均建立健全了农机管理站。

公社农机管理站受公社党委、管委直接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县农机局的指导；站长由公社配备专职或一名副书记、副主任兼任，县农机局配备一名能胜任工作的技术员（国家职工）；公社配备一名能胜任工作的社员任专职统计员，由县农机局发定额补助费，一般由 3 人组成。

农机管理站职责：一是宣传农业机械化的方针、政策；二是管理本公社的农机维修、供应和技术服务；三是农用柴油指标的分配、管理和节油工作；四是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理工作；五是全公社农机资料统计；六是维护农机专业户从事农机生产及经营运输业的合法权益。

根据其实际情况，农机管理站与拖拉机站必须紧密

配合方能更有利于工作，为此，根据地区农机局会议精神，县农机局在 1982 年农机工作会议上提出“两站”合署办公的意见。“两站”合一后，原工作任务职责范围不变，既是经营单位，又是农机行政管理机构。

三、农机业务机构

为农机事业服务的业务机构，修理、供应、培训、科研、安全监理，均是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先后建立的。

1. 农机修理

原拖修厂（今播种机厂）的形成与发展：

1959 年下半年，广饶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下放公社经营后，以原国营站的修理设备、部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为基础，建立了广饶县拖拉机修配厂，始建时住牛庄，1960 年 10 月迁址广饶城里（原轧花厂院），占地面积 9000 平方米，车间、办公室、宿舍、仓库、食堂等总建筑面积 3573 平方米。设党支部书记和正副厂长，分机修、机械加工、翻砂三个车间和生产、行政、财务三个办公室，党、团、工会组织健全。1961 年，全厂干部、职工 84 名，其中技术人员 7 名，固定资产总值 207 万元，共有各种修理设备 34 台。六十年代主要生产任务是负责拖拉机的大、中修理和在广北、孤岛一带施工作业的石

油勘探队送修的柴油机、柴油汽车等。同时，还生产部分 1140—12 马力柴油机油泵接盘、气缸盖和进口车上的气缸套、活塞环，缓解了当时配件紧缺的困难。1965 年 1 月，根据省里的指示，该厂移交工业部门领导，1973 年省确定为生产播种机定点厂，是全省 15 个定点厂之一。1975 年正式更名为山东省广饶播种机厂。

原拖修厂转产不再接受拖拉机修理任务后，县拖拉机总站于 1966 年建立了修理车间（今拖修厂），承担起全县拖拉机的大、中修任务。1979 年 5 月，经县革委批准，改建为广饶县拖拉机修配厂，属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隶属县农机局领导。厂内设生产技术、财务、供销、政工 4 个科室和汽修、拖修、机械加工 3 个车间，12 个生产班组，车、钳、锻、锤、磨、刨、铣、油泵试验、电器维修等工种。以其技术、设备条件所确定的主要任务是：以各种国产汽车、拖拉机的大修、部分机器配件的加工、排灌机电设备的修理为主，同时生产部分单缸空气压缩机、拖车、油罐、驾驶室等。

2. 农业机械公司

农机机械供应业务，1978 年前归供销社系统经营管理。1952 年县供销社建立了“供应经理部”，1954 年设立“生产资料经理部”，1970 年改建为生产资料公司。上述机构从经营 7 吋、10 吋步犁开始，逐步发展到各种新

式农具、半机械化农具、农业机械及其配件等。

1978年根据省革委33号文件精神，县委于1978年5月24日决定，建立了广饶县农业机械公司，从6月1日正式办公，属于企业性质，隶属县农机局领导。

3. 农业机械学校

为了适应农机发展形势，全面培养农机人才，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经县委决定于1978年4月建立广饶县农业机械学校，由王云生兼任校长，阮学科、韩庆元任副校长。校址设于广饶城东南3公里处，占地6660平方米，建筑面积590平方米，有教职员工10人。主要教学设备有泰山—25拖拉机2台，295解剖发动机模型1台，轮式拖拉机模型1台，液压系示教板2块，电器教学试验台1台。

农机学校建立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结合本县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农机人员培训，建校8年共培训各类人才1792人，其中有拖拉机驾驶员、修理工、公社农机技术员和社队农机管理人员。在培训地点、时间、方式上采取了灵活、适当掌握的工作方法。

4. 农机研究所

本县农机具研究和推广工作，长期以来坚持为农业、为生产服务，坚持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坚持机、电动力并用和人、畜、机相结合的方向，在农机

具技术推广、研制、使用上，起了积极示范作用。为了适应农机发展需要，推广新技术、研制新机具，于1973年2月建立了广饶县农机研究所，由王云生兼任所长，张祖臣任副所长。建所以来，共承担上级下达的主要科研课题7项，引进、改制、推广项目12个，除锻炼了人才，提高了技术以外，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小型粮食烘干机获惠民地区科研三等奖；滨海盐碱地区农机化途径的探讨、195柴油机更新期的探讨、机械化养鱼增氧均获县科委三等奖。

5. 农机安全监理站

农机安全监理，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其任务是对农用拖拉机及驾驶员进行检验考核和核发牌证，对其在田间、场院、乡村道路上作业的安全及技术状态的监理。

1955——1972年期间，县站及各分站均建立了安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62年后为领导小组），由机务副站长、技术员、职工代表组成。1973——1984年，拖拉机总站机务股配备专职安全监理员2人。安全监理组织或专职人员，除按上级规定的职责范围进行正常工作外，还要配合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处理农机系统在公共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在农业机械保有量迅速发展新情况下，1984年8

月，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建立了广饶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由牛绪业、李永池任正、副站长，全面负责本县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同时，各乡镇均配备了安全监理员，配合县农机监理站开展工作。

四、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机作业量和作业项目也在逐年增加。五十年代，本县农机事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年平均农机总作业量 27 万标准亩，机耕面积 17.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14.7%，机播面积 2.6 万亩，占小麦、棉花播种面积的 7.46%。六十年代为中期，年平均农机总作业量 140 万标准亩，机耕面积 52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61.86%，机播面积 13 万亩，占小麦、棉花播种面积的 21.61%。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是农业机械迅速发展的时期，农机总作业量由七十年代平均 310 万标准亩，八十年代增加到 603 万标准亩，可耕地和小麦基本实现机耕、机播；棉花机播面积受其他因素制约不稳定；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机械化。从农业机械保有量发展情况看，1985 年全县农业机械保有量（马力）等于五十年代的 90 倍，六十年代的 20 倍，七十年代的 4.5 倍。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大大缩短了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的时间。人工、畜力时期，夏收夏种全县一般需要 25 天（小清河南）至 35 天（小清河北）的时间，秋收秋种需要 30—50 天时间。机械化程度提高后（八十年代前后），夏收夏种全县 7—15 天，秋收秋种 15—25 天就完成任务，确保了农作物的适时收割、播种和丰产丰收。其次，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全县 4 万多劳动力（占农村劳力的 24%）从农业转移到工副业生产和乡镇企业中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85 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 31635 万元，比 1984 年增长 21.15%，其中非农业收入由 1984 年 37.1%，上升到 50.1%。第三，被机械化代替下来的一部分农民发展成为农机专业户，他们广开服务项目，精心经营管理，有的脱贫变成富裕户。1985 年全县农机服务专业户 945 个，总计纯收入 433.22 万元，年纯收入 5 千元至 1 万元的农机专业户 399 个，万元以上的 94 个。

广饶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 1950 年到 1985 年，经历了 35 个春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广饶县政协供稿）

忆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

王政民

我于1944年2月调到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工作，1945年10月离开，当时吕镜符同志任局长，刘群同志任监委。局机关下设秘书室、统调室、干部科、稽征科、经营科、工矿科、合作科等。在秘书室领导下还有一个警卫班、一个马车队。我任秘书室秘书兼任统调室秘书，以后调曲浩然同志来任统调室秘书。我记得干部科科长是张怀德，稽征科科长是李智，经营科科长是张逊三和范荣，工矿科科长是韩彪和王汉晨，合作科科长是马林才，我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因时间已久（距今已有五十个年头），对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的一些具体情况记不清了。虽与当时的老同志李宪章、耿曰芝等共同进行了回忆，但还是很系统，很不完整。现在只能把一些片断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机构和负责人的变化

1941年，清河区行政公署贸易科改为行署贸易局，

局长刘雨晨，当时的行署税务局长是张应举。1943年贸易局和税务局合并为贸税管理局，局长吕镜符，副局长李墨轩。局下分设6个分局，9个支局，还有6个公营商店。

一分局（又叫海上分局），驻沾化郭家局子，局长张应举（常国兴），副局长杜振东。下设5个支局：套儿河支局，局长韩彪；郭家局子支局，局长李长贵；夹河支局，局长陈伦；旺河支局，局长李有典；沾化支局，局长陈彬。

二分局驻寿光，局长鲁治平，副局长刘敬斋。下设两个支局：一支局局长张浩；二支局局长尹业三。

三分局驻广北，局长石晓村，副局长秦子敬。

四分局驻博（兴）蒲（台），局长许彦臣。

五分局驻清西，局长牟希明，副局长贾化民。下设两个支局：一支局局长贾化民（兼），二支局局长魏延梓。

六分局驻垦利，局长路瑶亭。

公营商店由所在地的分局领导。商店名称及负责人如下：

人和永商店，驻郭家局子，经理杜振东（兼），副经理吕竹村。

天增祥商店，驻垦利八大组，经理于仁光，副经理王凤瑞。

裕祥商店，驻广北牛家庄，经理耿曰芝。

华兴商店，驻夹河，经理张经溪。

永信商店，驻博兴陈户店，经理李杰三。

沾化商店，驻义和庄，经理韩彪（兼）。

1943年8月（有的材料说10月），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省的指示，成立了清河区工商管理总局（它的前身就是贸税管理局），局长吕镜符，副局长王有山，监委刘群。总局下设4个分局：

蒲（台）博（兴）分局，局长许子敬，监委张浩。

清西分局，局长刘乐川。

沾化分局，局长韩彪，副局长李长贤。

寿光分局，局长鲁治平。还有一个直属县局，局长张栋。

1945年10月，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改名为渤海区工商管理局（去掉了“总”字）。局长吕镜符，副局长王寅东，监委王有山。下设4个分局14个县局。

一分局驻乐陵，局长刘涛，副局长李光远，监委傅丙轩。辖振（华）吴（桥）、沧（县）南（皮）、靖（远）黄（骅）、乐（陵）庆（云）4个县局。

二分局驻临邑，局长张应举，副局长张曰义、赵鲁青。辖临邑、德州两个县局。

三分局驻索镇，局长刘乐川，副局长鲁治平，监委

姜克林。辖高（苑）青（城）、益（都）临（淄）、长（山）桓（台），邹（平）齐（东）、寿光5个县局。

四分局驻无棣，局长许子敬，监委马东昌，辖惠民（民）阳（信）滨（县）、广（饶）博（兴）、垦利、沾（化）（无）棣4个县局。

公营商店仍由各分局领导。

1946年8月2日，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机构人员又作了一次调整。局长吕镜符，副局长刘群，下设5个分局：

渤北分局（原一分局），局长李光远，监委许彦臣；

渤西分局（原二分局），局长褚芳珍，监委林青；

清河分局（原三分局），局长牟星桥，副局长丁芳圃，监委耿同麟；

渤中分局（原四分局），局长刘准，监委马东昌；

德州分局，局长朱光军，副局长谢祝柯，监委李怀之。

1947年3月，省府人事处（人字第44号文）记载：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吕镜符，副局长刘乐川，监委牟耀东。

1948年8月10日，华东财办（21号文）公布：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牟耀东，副局长刘乐川，监委张浩，各分局的干部未动。

1948年4月28日，渤海区工商管理总局以秘字第7

号文，决定成立渤海贸易公司（驻阳信县河坊区郭家村），经理刘向正，副经理朱光军，副监委巩丙如。下设5个分公司：

渤海贸易分公司，驻宁津县柴胡店，经理徐子光，副经理刘先洲，监委王士训；

渤西贸易分公司，驻临邑，经理王汉晨，监委朱敏三；

德州贸易分公司，驻德州市，经理耿曰芝，副经理刘云现；

清河贸易分公司，经理庞均；

渤中贸易分公司，驻北镇，经理王健农，副经理张悦道。

1948年12月10日，华东财办商字第1号决定：各级工商管理局长一律于12月底撤销。渤海贸易公司独立，经理刘向正，副经理张彤云，监委巩丙如。以上是渤海区工商管理局长从成立到撤销的主要过程。

但还有一点情况需要说明，就是1945年，渤海银行机关曾一度并入工商管理局长，统一领导，统一活动，组成一个党的支部，那时我兼任党的机关支部书记。计有党员48人，占机关人数的77%。我的笔记本中记载，当时机关共有62人，即吕镜符、王寅东、王子芹（银行行长）、李杰、徐元、隋志珍、王政民、马林才、曹子刚、

张怀德、张逊三、刘怀庆、李智、任锡朋、王级三、崔振远、崔振江、王正、宋岩、陈凤美、陈举胜、王放、吴纪茂、殷杰、贾杰、赵树坤、徐子光、燕文卿、王立壮、王汉晨、李健为、王敬民、李汉光、孟华、崔克东、王其然、陈庸、陈风舟、韩克胜、王金生、李烽、董青溪、李宪章、魏伯明、杨崇三、崔连成、杜延岭、李士红、黎明见、魏兰房、范玉、李有典、赵鲁青、常中溪、陈道远、李云、于彤、韩彪、杜仁山、刘超、杨金祥、刘硕领等。当时干部的流动性很大，如杨德润、许立华、李克、伊建华等，就是在这个登记数以前调走的。

二、工商管理局的主要任务

1. 采购物资，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决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工商管理局的主要任务。在战争年代，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造成军需和民用物资供应的极端困难。工商管理局即在根据地内采购土特产品（如粮食、棉花、食油、食盐等），除在内地供应外，还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和友邻根据地，换取渤海区军民所需要的物资，如武器弹药、医药和医疗器械、印刷纸张、电池、火柴及金属制品等。同时我们也封锁敌占区，不准私商把根据地内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花、土布、食盐等）向敌占区贩运，边缘地区都设有哨卡，见

有偷运者即予没收。

采集物资，不但解决本区军民生活和战争的需要，还支援了领导机关和友邻根据地。如1943年我们筹措了部分黄金和钞票，支援山东分局及鲁中抗日根据地。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号称粮仓的渤海区，把大批粮食支援友邻根据地的军民急需。如1944年，胶东根据地的粮食歉收，请求渤海区支援，1945年3月，我工商局配合粮食部门，从郭家局子海口，用小船运往胶东粮食4万多斤；5月20日，又从郭家局子海口，用13只小船运粮食25万多斤，支援了胶东抗日根据地。我在渤海区工商管理局工作的时候，亲自经手办过运送布匹和海货经邯郸到陕北中央。在这一方面，渤海区工商管理局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2. 发展工商业，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除工商管理局自己开办的公营商店外，还扶持和发展私营工商业，并组织小商小贩赶集串乡，方便群众。根据地的集镇和较大的村庄，一般都有五天一次贸易集市的习惯。集市上除工商管理局有计划地采购和出售一些必需品外（起着平抑物价作用），主要是小商小贩和农民群众相互调剂物资余缺。集市上的物资比较丰富，如大小牲畜、木料家具、铁木农具、棉花布匹、肉蛋蔬菜、衣服鞋帽、油盐火柴、绳经皮革、黑白铁制品、草柳编织、竹器等；铁

匠、木匠、小炉匠、饮食业等服务性行业很发达。集市管理也属工商管理局，特别是对物价、货币以及禁运和专卖（如酒）物资的管理。

为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工商局一方面发展公营工商业，另一方面还组织机关生产，组织机关人员到垦区开荒种地，组织机关合作社（如行署的烟厂）。

渤海区东、北两面濒临渤海，这给我们带来渔盐之利。工商局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和盐业生产，增加了根据地的收入。如盐业生产，1942年渤海区约产盐3000多万斤，外销120万斤，获利83万元。收盐税11亿元。据1948年统计：共有盐滩2421付，盐民（即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14903人，共产盐44092.8万斤（市斤）。盐滩盐民及盐产量如下表：

滩名	付数	盐民（人）	产量（万斤）	所在地
岔河滩	96	378	2000	寿光十区
北单滩	187	696	2000	寿光九区
官台滩	85	422	924.5	寿光八区
广北滩	220	877	76	广饶七、十区
河北滩	1556	1096	30000	海滨县
羊口公营滩	8	101	750	羊角沟
羊口私营滩	269	1467	7659.3	羊角沟
合计	2421	14903	44092.8	

渤海区北边有 9 个县靠海（即寿光、广北、垦利、利津、沾化、无棣、庆云、沧北、黄骅等县），海岸线长达 700 多华里，渔民较多。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土匪海盗的抢夺，有不少渔民不敢下海捕鱼。我们成立了海防办事处，组织了海防大队，把渔民组织起来（如渔民工会），保护他们下海捕鱼，渔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据 1947 年 5 月 20 日的调查统计，渤海区的渔场及面积如下表：

渔 场	坐落地区	渔场面积	鱼 种
大河口堡	河口东岸	长宽各 30 里	虾、梭鱼
沙头堡	沙河口西岸	长宽各 20 里	虾、梭鱼
岔尖堡	套儿河口	东西长 20 里，南北 40 里	鲁鱼梭鱼
新立堡	浦钢河东西瓦拉	东西长 30 里，宽 50 里	虾蟹大头鱼
洼拉沟	洼拉沟东岸	东西 20 里，南北 40 里	虾蟹大头鱼
杨可君	该河东岸	东西 15 里，南北 20 里	虾蟹大头鱼
半截河	该河东岸	东西 40 里，南北 20 里	虾蟹大头鱼
哑叭河	河西岸	东西 40 里，南北 10 余里	虾蟹大头鱼
大王庄瓦拉	河西岸	东西 60 里，南北 30 里	虾蟹大头鱼
烂 泥	黄河口东西两岸	长 100 余里，宽 15 里	刀鱼、梭鱼
羊角沟	在烂泥以南	长 130 里，宽 40 里	面条鱼、黄花

渔业生产，也是渤海区人民的一大收入。同时利用捕鱼的渔船掩护，对胶东根据地和天津敌占区的交通，创造了方便条件，有利于来往物资的运输。

3. 货币管理和货币斗争。北海币虽在 1938 年 8 月就开始发行，但在 1943 年以前，根据地内仍然是各种货

币（法币、伪币、地方私人银号的票子等）一齐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即用大量的法币来根据地内抢购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食盐等，造成根据地内物资外流，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清河区行署于1943年9月发布了《关于货币斗争的决定》，提出了禁止法币和伪钞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工商管理总局即根据行署的决定，开始对货币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凡是敌占区的商贩到根据地来做买卖，必须到工商管理总局把法币、伪钞兑换成北海币（即渤海币）。兑换比价根据行情而定。我们把兑换来的法币、伪钞，有计划地到敌占区购买必需物资。这样斗争的结果，法币很快贬值，北海币的威信日益提高，原来法币和北海币是1：1，有时还低于法币。斗争不到半年，北海币的币值高于法币币值。根据地的物价，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而敌占区的物价则常常飞涨。这样一来，北海币也流入了敌占区。

在管理货币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物价的管理，严厉打击奸商囤积居奇、轰抬物价和走私贩运。在敌占区和根据地物价悬殊的地方（如小清河南敌占区和小清河北根据地的棉花价格相差悬殊），就在边缘地区设哨卡，禁止私商偷运，避免影响根据地的物价波动。

4. 组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保证抗日根据地的支

出。渤海区工商管理局的稽征科，就是专管这项工作的。渤海区的税收机构，在1941年清河区行署税务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完善。在税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对建设根据地，如治理黄河、修桥筑路、发展教育、支援战争等，起了重要作用。

5. 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抗拒各种自然灾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战争年代，有大批的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并抽调大批劳动力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前线，因此，根据地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采取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

在农业方面，组织大批的互助组，插伙组和少数的合作社，这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对军工烈属的生产，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据1948年统计：渤海区共有烈属26227户，军属201061户，工属60249户，共计287537户，占总户数的14%。我记得当时渤海区比较有名声的农业合作组织的领头人有：广北贾杨李的李洪洲，高家店子的高化吉，广七区万家屋子的万汝廉，广八区的郭占一、李田英、时克钦，博兴的杨恒伦，寿光的陈凤永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曾一度出现过左的思想倾向，办大型的、高级的农业合作社。如博兴县的三里

庄农业合作社，全村办成了一个农业合作社，所有土地无条件的归社所有，统一耕种。各户的农具归社集体使用，牲口、鸡鸭统一由社集中喂养，全村一个大食堂，各户的粮食、咸菜、锅碗瓢盆一律集中到大食堂公用，碾磨也集中到一起。各户的房子由社统一划分使用，设老人院、幼儿园、男宿舍、女宿舍，实行过星期六制度（除星期六全家见面外，平时爷爷见不到孙子，母亲见不到儿子，各有各的宿舍，各有各的岗位）。吃饭分三种，老年人一种饭，青壮年一种饭，小孩一种饭，病号随老年人吃。对这种均产思想，渤海区党委作了严肃的批判，很快就纠正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当前应普遍组织插伙组和互助组这种形式。

在副业方面，也组织了大量的生产组和合作社。渤海区是个产棉区，纺纱织布是家家户户的副业生产。1942年组织了博兴县的万兴成纺织合作社，1943年在广北组织了广兴布店纺织合作社，1944年在蒲台组织聚兴布店纺织合作社。在合作社的组织领导下，组成了许多纺织生产小组。还有博兴陈户店的医药合作社，广北董家的医药合作社（主任是黄金印）。据1945年统计，共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达430多处，社组员达14万多户。如沾化县组织运输车578辆，1087户；轧花车228盘，587户；油坊24处，144户；烧砖窑40处，290户；

粉坊 48 处，195 户；豆腐坊 400 处，563 户；馒头坊 265 处，555 户。博兴县组织豆腐坊 183 处，轧花机 229 盘，皮硝组 280 个，柳编组 40 个，蒲编组 62 个，砖窑 61 处，运输车 231 辆，水果买卖 70 个组。广饶县组织轧花车 418 盘，运输车 518 辆，编席的 6000 多户，砖窑 68 处，铁木工组 129 个，做毛笔的 81 户。这些副业生产，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对支援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

除上述五项工作外，还有外贸工作（如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还有在敌占城市建立秘密商业关系等。

革命战争时期 垦利县工商管理工作的

赵继良 李永乐

革命战争时期，垦利县工商管理部，是建立较早的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单位，通过其有效的工作，对打破敌人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除军事上的“扫荡”、“蚕食”外，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和残酷掠夺。在这种形势下，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破日伪的封锁，粉碎经济掠夺，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军民急需物资的供应，取缔奸商，打击投机倒把，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是当时工商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

为了全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充裕国民财富，支援敌后抗战，中共山东分局于1943年夏天决定：“在行政机构中设立工商管理局，把工业、商业、

贸易、税务征收统一划归工商局管理，实行统一集中领导。”根据上述精神，垦利工商管理局于1943年7月正式成立，机关驻二区朱家屋子。当时工商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扶持群众手工业，开展渔盐矿产，发展公营企业，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管理对外贸易，调剂内地物资，粉碎敌人的掠夺和倾销政策，保护根据地工商业自由发展；统一币值，巩固本币，管理外汇，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根据上述方针，工商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强化贸易税收工作，建立烟、酒、盐专卖制度，把产、销、运、税结合起来，既发挥专业作用，又互相联系，密切配合；发展与敌占区的贸易往来，建立关系，沟通有无，克服物资缺乏困难；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催缴粮款，完成田粮征收任务。

二

为了反对日伪的经济封锁和倾销政策，与敌人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斗争。

（一）建立公营工商业，充裕物资财富，保证军需民用物资供应。垦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原军区兵工厂、被服厂、北海银行印钞厂和清河区工商局纺织厂等，都相继迁来垦利。随之，军区后勤部又在这里建立了皮

革厂、印染厂、鞋厂、卷烟厂、毛巾厂和油坊，还建立了大同商店、军人合作社、直属团夹河贸易货栈和行署贸易货栈等。垦利县的公营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工商局建立了酒厂（酒店）、造纸厂、皮革厂和肥皂厂；商业有永安隆聚商店、陈家庄商店和老爷庙商店等。

工业主要是搞自给性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军队和后方机关。公营商业经营的商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群众生产、生活用品；二是军需物资；三是收购剩余农副产品，组织出口，换取外汇和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和货币斗争。据原陈家庄工商事务所所长毕成贤回忆，只刁口、旺河两个港口，一年就向胶东一带运出粮食（主要是大豆）1亿斤。据原陈家庄工商事务所会计李德华回忆，仅陈家庄公营商店每年就经营粮食6000万斤。据省档案馆385卷档案中记载，1944年4月—9月，广、博、蒲、垦四县特种物资出口总值达1400多万元，换回外汇739万多元，物资折款（伪钞）660多万元。

（二）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发展私营工商业，繁荣根据地的民营经济。在永安镇建立了永安合作商店，爱国商人刘国贤（都称她刘大娘）组织了永信消费合作社。据原陈家庄工商事务所所长肖振华回忆，当时全区共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十多个，主要是生产纺织品、手工卷烟、小家具和其他生产工具等。消费合作商店主要经营

油、盐、酱、醋、茶、糖果和轻工业品。私营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据清河行署 1940—1943 年政府工作总结中记载：“永安镇有杂货铺 4 户（经理与店员共 21 人），资产多者 1 万元，少者 200 元左右；布店 5 户（有伙计 15 人），药铺 4 户，饭馆 3 户，煎饼、馍馍铺 20 户，磨坊 10 户，肉铺 4 户，皮货铺 2 户，铁匠铺 1 家，木匠铺 2 户。”再据有关人员回忆，陈家庄工商业有杂货铺 4 户，肉杠 5 户，洋布行 3 户，还有染料、茶庄、药铺、饭馆、铁匠铺等若干户。商号有：三益堂、仁和堂、同庆堂、天和堂、德生堂、同益堂、游源、万兴车行、承德堂、益丰茶庄、钱义泰、同盛永、金顺中、泉城分销处。老爷庙有私人代理店 4 处，饭馆 4 户，杂货铺 2 户。据分析，全县私营工商业有 3000 户，从业人员 4000 多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繁荣根据地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三）进行货币斗争。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代替银元、铜元在全国流通。日寇占领华北后，在北京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日伪老头票，简称伪钞），妄图以此代替法币，并大量套取法币作为外汇，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利用法币到抗日根据地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生油等物资。为了加紧对抗日根

根据地经济封锁和掠夺，在沦陷区极力扩大伪钞的流通区域，排挤北海币和法币，迫使民众使用伪钞。

为粉碎日寇在货币战线上的进攻，抗日民主政府通令禁止使用伪钞，对群众持有的伪钞，少者兑换，多者没收，并组织查缉，提成奖励缉获有功人员。为了加速伪钞的崩溃，工商管理总局指导事务所和商店在集市上挂牌兑出伪钞（但不兑入）。我解放区在敌占城市务工经商者，来解放区携带的少量伪钞，可予以兑换，但限定在一定的数量之内。这样一来，使伪钞逐渐贬值，脱离根据地市场。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在货币斗争方面取得了初步胜利，使北海币与伪钞的比值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下半年为8：1，到1945年8月就变成了1：50。

1938年4月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创建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1941年成立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北海币在我区开始流通，票面额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共14种。通过发行北海币，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战胜了敌伪在货币金融上的侵蚀和掠夺，对扶持群众生产，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量法币落入敌手，成为废纸。日伪占领区内禁止使用法币，并驱赶法币流

向解放区，又加国民党政府用大量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亏空，致使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这样也造成了根据地法币流入，物资流出，通货膨胀，人民大受其苦。从当时解放区物价指数的变化，就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37年，北海币和法币的计算指数都作为100，那么到1944年，就分别是7000和328684。

1942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就货币问题下达了通知，其主要精神是：立即实行贸易统一管制，严格实行对外以货易货制度，以阻止法币内流和物资低价外流现象；党政军民之公营事业，均应只收我北海钞，其余法币概不收受；宣布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7月1日起，所有军政民间之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海币计算，有计划地发行北海钞，提高信用，扩大流通范围，逐渐达到取消法币，并用所得之法币，速到敌占区购回我之必需品，不得留存或用于我境内。

从此，我区以北海币为本位币，限制法币流入，并使法币逐渐贬值，北海币很快占领了整个垦区金融市场。1943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下达了停止使用法币的通知，要求机关、部队、全体共产党员均不得使用法币和收受法币，无论公家和私人所存法币要限期按比例兑出。领导机关必须切实检查督促，防止不法行为。如故意纵容，

应受制裁。

通过一年多的“排法停法”斗争，终于把法币逐出了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利用法币掠夺解放区物资的阴谋，迫使法币步步贬值，一蹶不振。1944年1月，物价指数，北海币和法币都作为100计算，到1945年8月，就分别成为160和4570，法币贬值40多倍。

（四）加强贸易管理。就如何加强贸易斗争，中共中央中央财政经济部、山东省财政经济会议和渤海区都先后下达过通知，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了粉碎日寇的经济掠夺，开展贸易斗争，控制出口贸易，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建立关税，奖励土产输出，组织有关物品输入，调剂内地余缺，为抗日战争服务。垦利县工商管理局在内地设立了陈庄、永安、民丰、朱家屋子、老爷庙和宁海6个工商事务所。在沿海口岸设立了神仙沟、刁口、挑河、烂泥、旺河、宋春荣沟6个检查站，共有管理人员68人，负责市场管理，商人登记，统一出口贸易，管理内地物资，调剂金融，管理外汇，督促兑换，组织合作事业以及负责税收、缉私等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县局还成立了35人的经济工作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边沿地区缉查禁止出、入口物资，防止偷税漏税和法币伪钞入

境，保证我贸易和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支援货币斗争，以达到巩固壮大自己，打击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样一来，我垦区就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商贸易体系和金融市场，对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三

战争年代的工商管理工作是紧张而艰险的，许多同志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无时无刻不在与武装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有的同志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3年11月18日—12月8日，我抗日军民英勇地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在这期间，为适应反“扫荡”斗争的需要，局机关化整为零坚持斗争，局长张栋同志带领部分人员活动在垦利北部，监委张浩同志带领部分同志活动在垦利南部。据路瑶亭同志回忆，1943年日寇“扫荡”时，有一次他和张浩同志躲避敌人的围剿，夜间露宿在野外一条灭蝗的壕沟里，天气很冷，他俩就互相把对方的脚搂在怀里取暖。还有一次，路瑶亭在野外躲避了一天没吃上饭，晚上到了一个大娘家里，大娘只有一块高粱饼子，自己舍不得吃，给他吃，并说：“孩子，你快吃了吧，吃了好走，我好办。”一块干粮见人心。现在回想起来，路瑶亭同志还非常激动。据张浩同志回忆，工商管理局局长张栋是四川人，是老红军，只有一条腿，

当年 35 岁。他工作很有魄力，并能团结同志。杨国夫同志很关心他。日寇 21 天“扫荡”时，他被敌人追赶，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杀害了，他的遗体埋在老爷庙附近。

据工商事务所副所长李洪兴同志回忆，吴敬亭同志是上级派来做渔民协会工作的，时年才 24 岁，他可能是桓台沙河子人。1943 年日寇大“扫荡”时，他和刘光、赵景三、孙玉庆等都在刁口工作。有一天，他们正在渔船上，敌机突然飞来，向渔船扫射，吴敬亭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在清水沟子陡崖头，遗体被埋在了海边上，永远与大海为伴。

当时的工商管理人员不只和敌伪斗争，还要和汉奸、土匪斗争。1943 年农历 8 月 16 日下午 2 时许，李洪兴、赵景三和船工华玉俊、崔洪昌等 4 人划船巡逻，正遇上汉奸刘佩忱的船来渔船上绑票，利津县十六户胡秀山的一船豆饼被抢走。见此情景，我巡逻船立即向敌船射击，经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终于打跑了敌人，救下了被劫船只和人员。此事，当时还在《渤海日报》上作了报道。1945 年 3 月的一天，一股匪徒从张店流窜到刁口检查站，冒充我方人员来了解渔民情况，说话之间，趁王义亭（检查站站长）、刘兰香等不备，突然将他俩捆起装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枪支也被匪徒抢走。几天后，尸体被海浪冲到岸边，被我方船工捞起进行了埋葬。据说，这股

土匪以后被我区直属团消灭，枪支也被夺回。

垦利工商管理工作的历史，是一部光荣史、战斗史。当时战斗在工商管理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后人特别是为从事工商管理工作的同志们树立了榜样。

(垦利县政协供稿)

清河区税务工作片断

景 涛

1940年5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开始在中共邹平县四区区委任秘书。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邹平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经过全区各村代表选举产生，国民党员梁子成任区长，张佩（原名信叙久）任行政助理，我（当时用名李秉信）任财政助理。

当时我思想上是不愿做财政工作的，正巧上级9月通知调干学习，我要求去学习，后从事税务工作。

首先是邹长县税务局宣告成立。

据我的记忆，这是清河区首次开展党的税务工作。邹长县税务局成立时，上级没有派人，也没有举行成立仪式，只是把委任局长、会计的介绍信出示一下，即在9月间宣告成立了。原国民党员刘纫芳任局长，共产党员贾竹泉任会计。贾还是党内邹长县税务局特别小组组长。贾竹泉同志工作很活跃，爱说爱笑，善于做思想工作，并说服我安心做税务工作。我是第一个去县税务局报到的，后来陆续来了四、五个人。人一时等不齐，结果也没有

举办工作训练班，我们只是把税务章程及税率表学习一下就开始工作了。很快，邹长县税务局发展到近 20 人，每区设立一个税务卡。

不久，我被分配到长山五区（即敌占区苑城一带）任卡长兼会计，改名李隰朋，和税务员刘子明（共产党员）一起工作。那时税务工作也象其他地方工作一样，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到处流动。我们随身带着税收三联单，哪里碰到哪里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

1. 设路卡。每逢集时，我们在通往敌区周村的公路上设路卡，征收对象主要是大商贩，按其货物数量及税率规定收税。

2. 集市征税。我们对大的布商、杂货摊、肉铺等进行征税。逢集营业者按月征收；不经常来赶集者按一次征收。一般农产品都不收税。

3. 到户收税。主要对象是手工作坊，如陈度庄捞黄裱纸的多，我们就根据其每月产销定额收税。

4. 通过村自卫团平时在路上查获。如果发现有大商贩过路未交税者，告之我们后，我们就前去征税。当时政府禁止鸡蛋进入敌区，一般予以没收，由自卫团自行处理；也有时当场用鸡蛋打在贩者身上，以示惩罚。

5. 县局规定，每月底到县税务局开会一次，将税款上交，并借此机会召开党的小组会，过组织生活，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0年12月，接县局通知，让我代表县局去清河区税务总局开会。当时县局会计贾竹泉同志与我谈话，并将工作总结交给我，我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会计很担心我留总局工作，故意不给我开党的介绍信，只开了行政介绍信。

这时，中共清河区党委及清河区行署机关驻广饶北部的北隋、牛家庄一带。从邹长县出发，绕道而行，足有300多里，全靠步行，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昼伏夜行。那时，行路的具体办法是凭介绍信到县交通站（那时送人送信皆由交通站负责），由他们一站传一站地护送。从敌人据点空隙间穿过时，脚步要轻，时而快时而慢，有时停下来听听动静再走。幸好我在路上没有遇着麻烦，到达博兴以后，就可白天走路了。但这里地广人稀，有时这村见不到那村，见到的庙宇都被黄沙土埋到屋檐，里边的神像也只露着头部——据说这是黄河决口时黄沙淹没的。四、五天后，我到达了目的地。

当时的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状况较差，老百姓的生活很艰苦，与邹长县相比，生活差距很大。但这里最大的长处，就是环境稳定，日军轻易不敢来扫荡，不需要天天跑警报。此地的主要困难有：

1. 水咸。人不能喝，马不能饮。那里水井的形状是

上大下小，人能走下去用勺子舀水。每天夜里，人们起五更到井里争相取水，后来者只能舀些黄泥汤子，回去沉淀后再用。冬天人们就到大水塘里取冰块，据说冻水不咸。马不能饮怎么办呢？只好将马喂饱后，骑着到20里外去饮马。

2. 树木奇缺。有的村庄找不到一棵树。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孩，在一棵树上捕蝉，没捕到蝉，蝉飞了。小孩气得蹲在地上说：“你脱不了还飞回来！”原因是别处再没有树了。

3. 土地阔，粮食产量不高。天旱了，农作物也不能浇。因为水咸，越浇水，庄稼死得越快。

当时，机关部队驻在那里，虽有四面八方的支援，由于运输上的困难，有时仍免不了吃糠、吃野菜和吃草种子。每当吃饭的时候，“馍馍”都拿不起来，只好用手捧着吃。

4. 文化用品也很缺，尤其纸张奇缺，写个信尽量写得小一点，像个小纸条。信件普遍是叠成一个三角形，上面写明单位、收信人，从不用信封。这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种通讯形式。还有的人把苇杆削尖，当蘸水笔用。

以上艰苦条件，丝毫没有影响抗日军民的斗争情绪。在这片广大的平原上，到处洋溢着欢乐和歌声。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我

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每到开大会，啦啦队的呼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活跃着整个会场。

清河税务总局成立于1940年，具体时间想不清了，当时总局局长是任兴元，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其他五、六个同志，名字也想不起来了。这次我到总局开会时间也不长，三、四天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总局果真留我在秘书处工作。因我年龄最小，大家都称我小李。

在决定我留总局工作之前，还有一个插曲：一次，组织部门派一位同志找我谈话，其实就是组织上审查工作。我详尽地谈了我参加革命的经过。他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我说参加过民先组织，又说还参加了一个组织，填了表，但就不说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我没带党的关系信来，他也没有党的介绍信，所以我不能告诉他。现在看起来幼稚可笑，但反映出当时环境下党的组织秘密到什么程度。留总局工作时间长了，我才向组织讲清这个问题，并请组织替我写信与原组织联系，要关系信。

留总局工作后，正值清河区行署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我同总局其他同志都参加了。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在讲到税务工作时，除总结了工作成绩外，还指出了缺点。他在举例批评乱收税时说，×县税务人员曾这样做：“上至

绸缎，下至葱蒜，两个大瓮收一半。那个大瓮怎么推呀？砸了吧！”这是指税务人员在路上遇着一个推着两个大瓮的人，我们收了一个。这不是笑话，确有此事。

县长联席会议结束以后，行署抽调各部门干部组成了15人的工作巡视团，我同任兴元局长参加了该工作团。我们先去蒲台、博兴、高苑等县，工作是顺利的，但到邹长县检查工作时出了问题。当时，县直机关住韩刘二套。县里正向巡视团汇报工作期间，突然被长山城的日军包围了，县民政科长被捕，他所带的一包袱全县抗属册子被敌人搜去了。巡视团也有一人牺牲，一人被捕。幸好我领着任局长向西突围脱险。

此后，敌人天天拿着抗属册子扫荡，我只好领着任局长到我原工作过的五区躲警报。当时敌人既疯狂又狡猾，连他们占据的据点村镇也不放过。一会儿到外村扫荡，一会儿到据点村镇搜查。我同任局长一会儿躲到据点村镇里边，一会儿又转到外村，一天不知转移几个地点，幸好没有出事。

任局长过去在大机关和较和平的环境里工作，一下子不适应敌占区这种战争环境。后来他说：“天暖了，换不下棉衣来。”又说：“我在益都有个好朋友，我要上益都去。”我说：“有危险吧？”他说：“不会的”。我是个小干部，只好服从他了。为了避免出事，我还托人送他去

周村火车站。后来听说他在益都被捕，具体情况不详。

此后，我回到清西专署找到王兴国（即伏伯言）专员和刘雨辰县长请示：巡视团垮了，我工作怎么办？最后决定我暂回邹长县税务局。县局又决定我回长山五区任税务所长（卡已改所）。从此我改名景涛至今。

这时，县局增设了一个现金会计，姓解，焦家桥人。每到月终，各处税款都要送到解同志那里。日军的据点就在焦家桥镇的北头，但这镇的群众工作很好，所以并无危险。

大约是1941年4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带了一个月的税款3000多元送往焦家桥解同志那里。以往去解处都是从焦家桥西门进去，但这次从五区来却要直奔东门而进。这时天已近黄昏，视线不远，我路又不熟，拐弯摸角，乱走一通。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岗哨，我见是伪军，并没有迟疑，继续前进。哨兵问：“谁？”我立即回答：“我！”，并昂首直入，两个哨兵也没有阻拦。这时我怀疑是已进入敌据点圈，急忙寻找出路，但找到的都是些死胡同。忽然听到日军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抬头一望，原来我已来到日军碉堡下面，幸好下面没有灯光，敌人看不到我，我却看清两个日本士兵端着大盖枪来回走动。这时我别无办法，只有从原路走出去。于是，我又硬着头皮腋下夹着3000多元的小包袱冲到两个哨兵那里。两个伪军一齐

跑到我的跟前，两个黑脑袋几乎贴到我的脸上，端量一会儿问：“我怎么不认识你？”我用很生气的样子回答：“我天天过来过去，怎么不认识呢？”他们互相望着摆了摆手，我已大模大样地走远了。一拐弯，我就立即小跑，惟恐后边来追。我还故意多拐几个弯，总算化险为夷了。

不多会儿，我找到原路，安全地将税款交给解会计。我说起刚才发生的事，他们都很吃惊，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直到5月，我的党组织关系也没有找到。原因是原邹长县是一个县建制，清西专署成立后分成了邹平、长山两个县的建制，县局特别小组整个失掉关系，原组织部负责人已调长山县工作。所以，我就要求去长山县找组织关系。正巧碰上贾竹泉的侄子贾允兹（他是县青救会长），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很希望我做青年工作，而我又喜欢这项工作。那时组织手续也不严格，我只写了一封信给王专员、刘县长，并请转告税务局，没等复信我就被分配到长山七区任青救会长，从事新的工作了。

著名工商业家毕鸣岐

戴翮英 罗先哲

毕鸣岐，字凤岗，山东省利津县汀河乡毕家嘴村人，是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天津市副主任委员等职。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为办好社会主义的经贸实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毕鸣岐，1902年10月27日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毕克俊早年以种地谋生。因利津县境北部土地碱薄，农业收成甚微，全家难以糊口，所以不得不利用农闲为盐商推盐，赚取微薄工钱以维持全家生活。毕克俊生有六男三女，毕鸣岐是男中行五，因家境贫寒，子女们大都幼年失学。随着食指日繁，毕克俊单靠种地、推盐已经不能维持家计了。幸赖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医道，自学成才，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在村里开设了一个小药铺，他兼做医生，这样才使全家得以温饱。

毕鸣岐是毕克俊最喜爱的孩子。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童年在本村读私塾时，功课甚佳，常在班里受到老师的夸奖。村里的长辈也都说他是一棵“好苗子”。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山东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济南、青岛、济宁等地广设教堂，创办学校，以宣传和灌输西方文化。天主教堂的神甫，深入农村宣传教义，并招收一些学生进教会学校读书。

毕鸣岐从1915年秋去泰安德育小学读书数载。1921年经神甫介绍进入济南天主教会的德育师范学校。1923年又经神甫推荐转入山东济宁中西中学就读。中西中学也是天主教会办的。校章规定，凡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均须领洗入教，毕鸣岐当然也不例外。毕鸣岐在德育师范和中西中学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尤以德语名列前茅，这为他后来从事外贸生意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夏，毕鸣岐在中西中学毕业后，曾在济宁任过小学教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入济南德国商人的德孚洋行当职员。1925年冬转赴沈阳挪威洋行任翻译。1926年秋到北京德孚洋行任文书。翌年初他重返沈阳，先后在福康公司和德商礼和洋行任翻译。三年中毕鸣岐五易其职。此间，他精湛的德语和从事外贸业务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和提高，当时已经是锋芒初露了。所以在1927年冬，他就被挪威商凯利洋行聘为华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1928年6月，毕鸣岐又到哈尔滨任德商福茂洋行华经理。福茂洋行主要经营五金制品。时值奉系军阀在沈阳兴办军工厂，成为福茂洋行一大主顾。同时，该行还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产品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之福茂洋行生意兴隆，毕鸣岐的声誉和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国东北各省，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欧洲外商同样也受到了打击，毕鸣岐所在的福茂洋行出现了业务萧条，自此一蹶不振，直至不能经营。他遂辞去福茂洋行华经理职。当时毕鸣岐耳闻目睹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发民族义愤，出于爱国思想的支配，他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因此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于是在1931年冬他秘密回到了济南。1932年4月经人介绍，毕鸣岐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然后再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并且多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据毕鸣岐生前对他的亲朋好友讲，1932年间他曾利用德华洋行的运货汽车，掩护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向河北、察哈尔进犯。是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

众抗日同盟军”，指挥对日作战。冯的部下石敬亭是毕鸣岐的同乡好友。经石的介绍，他认识了冯玉祥，并受到冯玉祥将军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军衔咨议。当时在张家口担任德华洋行华经理的毕鸣岐，积极进行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国斗争。

1934年，长城内外军事形势趋紧，进出口贸易日感困难。因此毕鸣岐辞去了德华洋行华经理职务，出任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买办。不久，又转任天津孔士洋行华经理。孔士洋行经营大小五金、化工原料，并代销美国光孚石油公司的润滑油和机器油等，主要销售对象是铁路、工矿和军工厂。孔士洋行机构庞大，上海、广州、宁波、天津、汉口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总行设在哈尔滨。由于毕鸣岐善于广泛交际和经营有法，使天津孔士洋行生意兴盛，获利甚丰。他不但享有高薪，同时还分享2%—5%的销货回扣，使他获得巨额收益，每年收入达数万元。此外，他自己还囤积油料物资，并将囤积的油料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厚利。这就为他后来自办企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德商孔士洋行宣告倒闭。该行存货全部由毕鸣岐收购。1946年，他在天津独家出资10余万元创办了华胜贸易行。当时华胜贸易行主要是做德国和美国生意的。其经营方式

和品类范围，基本上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他继续担任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同时他还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经理和两名外籍高级职员。当时，毕鸣岐曾对同行业的朋友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被外国人所雇用，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雇用外国人嘛。”这三名外籍职员，直至1953年才先后离开天津回国。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济受到打击，华胜贸易行的业务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毕鸣岐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出发，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利润。随着他的经贸业务的发展，毕鸣岐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为天津市商会会长。

1948年冬，当解放战争逼近天津的时候，有些资本家由于听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而畏惧共产党，纷纷举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当时毕鸣岐也在犹豫难断之中。此间，他幼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王华庭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天津做

工商界的工作。在194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王华庭找到了毕鸣岐，向他阐明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从而解除了他的顾虑，坚定了等待解放的信心。同时，他为了王华庭的安全，将王安置在自己家的小书房里居住，并为王在其经营的华胜贸易行里谋了一个合法的职员身份，以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其间，毕鸣岐还劝说同孚贸易行的陈合增、陈毓增等一些工商界朋友留下不走，迎接解放。天津解放前夕，担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岐，偕同工商界名流李烛尘、朱继圣、杨亦周等人，代表天津市各界人士去津郊杨柳青前线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和欢迎解放军进城。天津解放后，他写信动员过已去香港的中华公司刘华千先生、中美企业公司马甦先生等天津工商界朋友多人返回大陆。

1949年春，天津解放不久，有一艘美国商船满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但货主都不敢前去提货。面对这一情况，毕鸣岐挺身而出向军管会作了请示汇报，经研究批准进港。从此天津港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都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的外贸业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津设立分

支机构,当时对活跃天津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毕鸣岐为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做出了贡献,受到市领导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党的政策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努力为促进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而不知疲倦的工作和无私奉献着。

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毕鸣岐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资。自1949年到1950年,他先后投资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国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由毕鸣岐独资兴办。为了办好这个企业,毕鸣岐通过各种渠道,广揽人才,先后从津、沪等地聘请了14位高科技人才,分别担任该厂的高级工程师。在专家的指导下,该厂生产了坚固硫化蓝、直接湖蓝SB、直接棕G、酸性青莲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整工业的急需,而且填补了我国染料工业的空白。特别令其高兴的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政府20吨直接棕G染料,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该厂从1950年创办到1954年实行

公私合营前的短短几年中就获利 74 万元。为了不断扩大企业再生产，毕鸣岐从未在新民化工厂提取历年分给他的红利。此外，他还和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共同倡导集资兴办示范机械厂和投资公司。前者为天津机器工业向制造精密机床方向发展开创了道路；后者为天津工业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为发挥私营进出口业的作用，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毕鸣岐倡议进出口业组织起来，走联合经营的道路。这对搞活外贸和为后来公私合营按业务组建进出口公司，奠定了基础。

1952 年，天津市政府举办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毕鸣岐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并广泛动员私营厂商参加。另外，他还多次率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团参加过在上海、武汉、广州和西北地区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为沟通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物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毕鸣岐在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3 年他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参加了以贺龙为首的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他任副总团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后，他积极向工商界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毕鸣岐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积极带头捐献

和认购公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率先捐献飞机 1 架，并带动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和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 5 架。在五十年代认购公债时，他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达 20 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也引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注，该行曾派人专程访问，并创办了公债保管业务，当场将 20 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毕鸣岐的爱国热情，当时曾受到天津市黄敬市长的称赞。

1954 年 10 月，毕鸣岐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申请将其独资经营的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该厂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生产硫化蓝染料的专业厂，是天津市私营企业中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厂家。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他曾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向毛主席报喜，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毕鸣岐的夫人戴翩英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家属向毛主席呈递了决心书，也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毕鸣岐的模范行动，对推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毕鸣岐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己任，热心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解放后，他捐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使之扩建成为红十字医院；推动进出口同业捐资

创建天津市实验小学；将天津自己的一所房产捐献给社会开办幼儿园；多次捐资支援灾区；他生前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因十年浩劫未得实现，粉碎“四人帮”后，由其夫人张秀如捐款6万元，代他实现了夙愿。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他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去世。1978年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年9月17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由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主祭，副市长、民建天津市委主委、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致悼词。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天津市烈士陵园。

※ ※

戴翩英系毕鸣岐的夫人。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兰园保育院院长。

延国符事略

延珍卿

一、延国符的幼年时代

延国符，名瑞琪，国符乃其别号，山东省广饶县宋店村人，1899年（清光绪25年）生。父名延良玉，号温如，系清末廪生，博览群籍，颇有学誉，曾任县学务局长，嗣从事课读。县中學生，多登門拜師。我們兄弟三人，長兄宗山，國符行二，余最小。國符幼承庭訓，嗜讀強記，初入塾讀四書，兩篇即能背誦，年十二入本縣段河村高等小學，為當時縣中教育界先進李少卿先生所器重。李時任該校英文教師。

1916年袁世凱竊國稱帝，家兄宗山時在北京清河鎮軍官預備學校上學。為了反袁，即輟學返魯與先烈薄子明將軍在博山縣起義，進占淄川及周村，成立山東省護國軍政府，時國符年僅17歲，亦投筆從戎，隨家兄任軍需。不久袁死，民國再造，時家兄宗山任薄將軍部營長，以護法目的已達，遂即辭職返回軍官預備學校復學。國

符亦去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该校校长为孙继丁先生。孙对学生活动过于限制。国符因领导同学罢课驱孙，结果被孙继丁开除。时家兄宗山已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应阎锡山邀，任山西省学兵团第九连连长。国符遂去太原，考入山西大学预科，1921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

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受到苏联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发展甚为迅速，在北京领导革命的为李大钊，丁惟汾、路友于、王乐平等人。国符与友于、乐平均系丁惟汾之亲密助手，并与李汉鸣、李澄之、郭春涛等均为同志好友。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符亦系出席代表之一。1924年，孙中山先生决定成立黄埔军官学校，王乐平与国符同为山东方面招生的负责人。第一期山东考取学生共计10名，广饶县由于国符的大力动员鼓动，即占5名，计有李玉堂、李延年、项传远、韩金诺，李景三等人。他们在北伐战争及抗日战争中，都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二、参加冯玉祥国民革命军

1925年国符在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即参加了冯玉祥先生领导的国民第一军工作。前任绥远都统署

交际处长，都统是蒋鸿遇。1926年冬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率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拥护孙中山进行革命。1927年国符随军至甘肃，转任甘肃省政府交际处长，主席为刘郁芬。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与陕军吴新田，将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的陕军杨虎城、李虎臣围困西安城内。冯玉祥将军派宋哲元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军由甘入陕解西安之围，国符任总指挥部政治处长。后刘镇华、吴新田败走，西安围解，宋哲元被任为陕西省主席，国符兼任陕西省党部整理委员及西北大学校长。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符在思想上有所抵触。当第三国际驻中国顾问鲍罗廷先生回国途经西安时，国符即密访鲍罗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后因此被诬陷亲共，致被逮捕。经丁惟汾力保，始获释放。

1928年夏，北伐军占领北京，国符即催其未婚妻唐淑文女士到北京结婚。时鲁军张荫梧任北平（北京改称北平即在此时）警备司令，家兄宗山经阎锡山邀任警备司令部少将政治部主任。国符婚礼在西单花园饭店举行，由张荫梧证婚。

三、河南反蒋

1928年秋，蒋介石与冯玉祥将军交恶。蒋任命唐生

智将军为二十路军总指挥（时唐驻北平），率军赴郑州，向豫西冯玉祥之国民第一军进攻。唐生智在离开北平时，向张荫梧要求借调家兄宗山同去河南。张因当时冀东一带尚为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溃败部队占据，正急待收编安顿；白崇禧尚在昌黎、山海关一带追击奉军残余部队；又因家兄宗山曾任北伐军总司令参谋团办公厅主任，与党政军各方面均有联系，在解决当时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等问题方面，张荫梧正深利赖，实难割爱，但又不能断然拒绝。即对唐云：宗山有位二弟，系北京大学毕业，过去一直在冯部工作，论才华不在宗山以下。孟兄（唐生智别号孟潇——编者注）此去，即是对付西北军，那更是轻车熟路。他名延国符，现正在北平新婚，你如有意，我当邀请面谈。唐甚同意，张荫梧即约国符到中南海万字廊（张荫梧住处）与唐生智将军会晤。国符与唐生智将军晤谈，颇为投契，大有相见恨晚之叹。因国符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心中宿印不满，而唐生智将军原系拥汪武汉派军人，两人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均有不满之故也。

1929年5月韩复榘经蒋介石以河南省主席及二百万现洋为饵，背冯投蒋，即所谓“甘棠东进”。不料行至黑石关，突遭庞炳勋截击，全军溃散。在郑州收集残部，仅得数千人，即编为第一师，由孙桐萱任师长。韩旋即

任河南省主席。

是年，唐生智将军在豫西击败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后，即与国符密议反蒋拥汪。当时在华北方面，以阎锡山之力量较大，反蒋必须联合阎锡山，一则可壮声势，二则可免后顾之忧。即由国符到太原谒阎，以唐生智将军拟与阎联合反蒋之计划，征求阎锡山的意见。当时冯玉祥已被蒋介石击败退守潼关，阎有兔死狐悲之感。因此唐生智将军的反蒋计划正中私愿。阎当即对国符说：“我对孟潇计划，至深赞成。请转告孟公，他通电一出，本人即通电响应，必为其后盾。”国符返郑州后，即与唐生智计议誓师日期及作战计划。当时晏勋绂为唐生智参谋长、叶蓬为副官长、郭寄侨亦系唐之重要幕僚，但直至挥戈南进，彼辈始知。

当时孙殿英已调驻安徽亳县，所部有5万余人。孙主动向唐生智将军保证，郑州后方他负全责。阎如背信，由他应付，劝唐早向武汉进击，免失时机。

唐生智将军官兵多系两湖子弟，闻回戈武汉，无不欢欣鼓舞，不数日即占信阳，进迫武胜关。蒋当时战线过长，难以接应，已下令李延年等驻豫部队向武汉退却。曾记当时国符电告家中，云预定到武汉过年。可见当时唐军士气之盛，占领武汉，已如探囊。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此紧要关头，忽然天降大雪，

一夜即雪深数尺。如此大雪，为数十年所罕见。唐部士兵，犹皆赤足草履，御寒衣物漫不充足，几日之内，几皆冻伤手脚。不唯无法作战，而行走亦感困难。双方部队，攻者难攻，退者亦不能退。而马鸿逵之骑兵汉昌雪袭，占驿河车站，截断铁路交通。唐生智将军观此情景，认为事已不可强为，乃决定通电下野，密赴香港暂避。部队交由刘建绪军长负责整理。到此，反蒋战争就如此结束了。

当时国符亦在蒋通缉之列。因在西北军与韩复榘（韩时任山东省主席）有旧，即回济南避居，韩委以省府参议，藉维寄寓生活。

四、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在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洪流面前，不得一始对爱国人士捐弃前嫌。唐生智将军变卖在香港私产，捐献现洋数百万元作为抗战军费，并出任国民政府军法总监。至此国符亦出任全国铁道运输中将军法执行监，初设监部于郑州。徐州会战后，即迁到汉口，并于浙赣路设铁道运输军法分监，委李伟民为分监。密切配合全国铁道运输总司令钱宗泽解决有关军队干涉铁道运输违法案件。为便于执行任务，并配备有宪兵两连。

1939年军法执行监部迁衡阳。不久日寇占领衡阳，铁道线已剩余无几，且均在后方，该军法执行监部即奉令结束。

五、任鲁青善后救济分署署长

1942年7月18日，国符补为国民党立法院委员，与孙科院长较为密切。1945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了善后救济总署，派蒋廷黻为署长，郑道儒为副署长，各省市设救济分署。1945年9月在青岛成立了鲁青善后救济分署，下设鲁南、鲁西等工作队及济南办事处。国符经丁惟汾与傅斯年先生推荐，任分署署长，梁传琴为副署长。嗣梁传琴调任第十一绥靖区秘书长，孙继丁接任副署长。该署与联合国救济署配合，办理省内各县市的救济工作，接受发放外国捐助的救济物资。其中有面粉、旧衣物、罐头食品及医药器材等。

1948年5月，鲁青善后救济分署工作告一段落，即决定结束。国符调任国民党立法院副秘书长。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国符亦随立法院到广州。广州解放后，即携眷至香港暂居。1949年10月我在青岛福山支路学习时，尚接国符自香港来信，询问他的旧友李澄之、郭春涛、姚仲明等人情况。后来，国符离港去台。经蒋任命为台湾国民党政府评议委员。嗣因李玉堂、李延年

在台的遭遇（李玉堂被蒋枪毙，李延年被判刑十年。二李曾参加黄埔军校一期受训，本系国符亲自动员劝说，两人出征北伐及抗日战争中均建有不朽功勋。例如有名的长沙会战李玉堂以卸任军长而负责守城浴血十余日将日寇击败。李延年在广西昆仑关及宜昌与日寇顽强作战均获大捷。负责防守潼关河防五年敌人未能过河一步，确保抗战大后方的安定，对国家对人民堪称无愧），以致长期心情懊恼、郁郁寡欢。1978年因病入院，竟至不救而逝，享年79岁。据家嫂来信云：国符在弥留之际，犹谆谆嘱告她，生既不能归，死后遗骨务必迁葬祖茔。首丘之情，可以想见也，悲哉！现家嫂已携子女移居美国，在威斯康州暂居。一则便与大陆亲人联系，二则可以重返故里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之念，天涯人更感殷切也。

鲁青救济分署简介

王经纶

一

鲁青救济分署，成立于1945年9月，历时两年多，完成善后救济任务，于1948年5月结束。

这一分署，是一慈善性机构。在日寇投降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经联合国筹募资助，针对交通情况，力求物资海运进口，设分署于青岛。在济南，设立分署办事处，以便大力空运物资，对山东内地灾区普遍救济。

二

鲁青救济分署，全名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简称“行总”或“CINRA”。联合国也派员分设机构，全名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山东分署”，简称“联总”或“UNRA”。联总与行总是平行单位，业务由行总办理，联总予以协助。实质上，在某些地方，联总似对行总有监督的意味。

三

鲁青救济分署，设正副署长。下设振务、卫生、储运、总务4组，秘书、会计、人事、技术4室和山东办事处。善后救济总署另派驻稽核人员，对行总的物资发放帐务情况，随时核查，以符实际。其主要负责人员如下：

署 长 延国符

副署长 梁传琴（先）孙继丁（后）

振务组 主 任 邹毓秀（先）

马廷燮（后）

主要搞各地区的调研、物资分配、发放计划等，由其所属的各科和工作人员办理。

卫生组 主 任 蔡庭芳

副主任 程振铎

主要搞各地区的医疗药物器械等调配善后工作。

储运组 主 任 马廷燮（先）

仲博仁（后）

副主任 王经纶

主要搞各地区的物资运输、仓储、帐务等，按振务、卫生两组的发放计划，由其所属的运输科，仓储科各仓库和汽车运输队会同办理。

总务组 主任 赵录纲

副主任 孙生芝

主要搞分署的后勤工作，由其所属的出纳、文书，事务等各科办理。

秘书室 主任 杜运庐

会计室 主任 马家印

人事室 主任 陈允杰

技术室 主任 胡道远

总纂 王统照

山东办事处 主任 王子瑜

四

鲁青救济分署，在近三年的救济工作中，对善后事务的处理上，力求所有灾区全面展开救济，不分“国区”与“共区”，只要车船可达之地，均同样救济，以利赈恤。对地区分配上，要求联总空运大队，将已进口的物资，大力由青岛空运济南向内陆发放。同时，因鲁青地区受灾严重，经多次派员协同联总当面向上申诉，请求增配物资。纵有所增补，仍难满足要求。因而在此掌握物资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抓紧时机，分头向各灾区运送，普遍救济。在鲁东，利用风船运送物资去烟台，用汽车运送物资去临沂、莱阳等地区。在鲁南，经连云港

转往枣庄、峄县并分运去鲁西及鲁西南地区。运到济南的物资，由该署山东办事处分运鲁北及济南周围较远的地区发放。当以运力所限，笨重的吃穿用品，动转搬迁，辗转需时，有难以运达之处。总的运送发放情况，对灾区难民的救济也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渤海区接收救济物资的经过

曲 溪

1947年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与我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议定在烟台市成立三方委员会，向我山东、冀鲁豫等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我山东省善后救济分会派李澄之同志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担任了该会的主任。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各有关解放区都派了驻会代表。渤海区派杨文轩同志为代表驻烟台，准备在那里接收救济物资。

不久，渤海区党委接到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董必武同志的电报，内容是：已确定分配给渤海、冀鲁豫等地的救济物资，不经烟台卸船，直接由上海船运到羊口市（抗战胜利后羊角沟曾一度改为羊口市）卸货，要我们做好接收的准备。

4月，杨文轩同志陪同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派来的胡祖农、钱一萍等几人从烟台来到了惠民。渤海行署在惠民城里设立临时交际处，由杨文轩同志陪他们住到那里。胡祖农等人名义上是到渤海区了解接收救济物资

的准备情况，实际上是想到解放区搞情报。杨文轩同志回来不久就调走了，行署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到惠民城里住了一段时间。4月底，我们又接到董老从上海来的电报，说载运救济物资的船只“美龄号”不久就要抵羊口市，并附有提货单。为做好救济物资的接收、分发工作，区党委决定派副秘书长于勋忱及吴克明和我共同负责这项任务。于勋忱副秘书长和我们研究后，决定一起到羊口市去，国民党“行总”的那个小组也随我们去羊口市。

5月19日，我们到达羊口市，找到市长杨少心同志，请他谈了卸船的准备情况，并请他参加我们的工作。杨市长还派秘书孙叔文同志配合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处理一些具体事务。

当时的羊角沟，是一个不大的渔港，根本没有轮船靠岸的码头，船只通过小清河才能到达距市区约两公里的海口。据了解，运输这批救济物资的船只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役的登陆艇卸去炮塔移交给中国的。这些船吃水量大，只能停泊在离海口很远的深水处，这更增加了卸船的困难。我们与市里商量，决定动员所有的渔船集中使用。还从外地调来两只大船连接起来。铺上木板，准备接运大型物资。羊口市的码头工人具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他们在市工会领导下积极组织起来，很高

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们3人也分了工：于勋忱同志负责总的指挥，我分管接收，吴克明同志分管分发，为提高工作效率，我们还请来翻译王绍唐同志一道工作。

在羊角沟这个小渔港接卸这么大的船还是第一次。我们觉得准备工作还是做得挺充分的，于是耐心等待着迎接救济船“美龄号”到达羊口市。

5月23日早晨，我们接到李澄之主任的电报，大意是“美龄号”于19日出发，估计今日可抵羊口市。我立即去海上准备接收救济船，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的胡祖农、钱一萍等人也跟我们乘船去海上，拟搭船回上海。我们在海上飘泊着，等到24日救济船仍不见踪影。大家心里有点焦急。25日，办事处传来了电报：“美龄号”已抵烟台，26日才驶羊口。27日早饭后，于勋忱同志也到海上来了，同来的还有冀鲁豫的高步青同志。过了一段时间，码头上送来了信，夹着两封电报：一封是烟台发来的，另一封是省里发来的。电报说：“美龄号”27日从烟台开出；“万坚号”28日离沪驶羊口。这段时间，船来的日期常常变化，几乎是每天一个电报，每天一次变化。我怕船来了联系不上，即写信给船会的刘会长，要他派船到海口去点航标灯，并派船在河口外游弋，以帮助联系。28日早晨，风很大，还下着毛毛细雨，海上大浪汹涌，接运的船只避到了靠近河口的地方。我坐的这条船

的船长突然惊呼起来：“你们看，轮船来了！”大家一齐往东北方向望去，果然在离河口约 20 里的地方看到有一个很大的黑沉沉的东西，好象一个小村庄似的。有人怀疑未必是船，而船长却肯定地说：“这一定是轮船，那个地方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风船也不敢停在那里。”我们越看越真切，是轮船无疑了。我迅速到汽船上找到于勋忱同志。他早就用望远镜看到了轮船。我们商量了一下去船上接洽的事情。等到 29 日风平浪静了，我们来到“美龄号”上。我首先会见了美国人哈维奇先生，他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管渤海区救济事务的代表。接洽后，我仔细检查了船上的物资。提货单上开列的物资相当复杂，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被服类：如毛料、旧衣服、睡袋、蚊帐以及破旧的皮鞋、袜子等；（2）医疗器械与药品，如 X 光透视机、盘尼西林、金鸡纳霜、鱼肝油丸等；（3）大宗的食品，如：各种罐头、奶粉、饼干、糖果、红萝卜干、菜种子等；（4）小型铁木工具箱。另外，还有上海的爱国人士宋庆龄捐赠给解放区的几大箱慰问袋。大型的东西有：分发给冀鲁豫解放区的几台拖拉机，给我们渤海区的两部美制小吉普车和几桶汽油（吉普车卸下后，一部留行署，一部由区党委送给中央刘少奇同志）。总之，这条船上的物资，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还

是容易卸运的。

搭这条船来的有上海办事处的李实同志，他准备到冀鲁豫解放区去。他向我谈了在上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情况，并告诉我说：蒋介石时刻想破坏解放区的救济工作，要保持警惕。

船在卸运中，于勋忱同志让我回码头休息。我还没有走，就接到了杨市长的信，信中说李澄之主任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李普尔（美国人）来羊口视察，请于勋忱同志回市府。于勋忱同志留我在海上全面负责，他即赶回市府。第二天，李澄之同志陪李普尔来到海上，视察卸运工作。我向他们谈了卸船的情况，他们表示满意。他们在羊口住了几天便回烟台了。

“美龄号”的物资卸完以后离开了羊角沟。我们即回到市里的住处，参加研究向各地区分发物资的运输工作。

5月30日，接区党委转来的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电报和提单，要我准备接收“万坚号”的物资。“万坚号”上主要装有37部美制十轮卡车。区党委很重视这批物资，再三指示要接收好，把卡车全部卸下来。区党委还派了渤海军区后勤部的熊处长带40多名汽车驾驶员赶到羊角沟，帮我们卸车。

我们一直在海上等着，直到6月2日下午，“万坚号”才抵羊口。我和熊处长、秘书、翻译及40名司机、

几十名码头工人，登上了“万坚号”。我们在船上找到了船长开普敦先生（美国人），办理了交接手续。我查点这次船上的物资，特别注意那 37 部卡车。这些卡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役的美造卡车，都还能用。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快速部队”急需卡车补充。当我们查点到一部大型推土机时，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卸运，当时也没有什么用途，决定不要这东西。检点以后，我跟于勋忱秘书长联系（当时有交通船），决定先把易卸的东西卸下，然后卸卡车。

第二天，海上的风浪很大，但卸运的船只都驶向“万坚号”周围，开始卸运船上的轻便物资。我和熊处长正在商量十轮卡车的卸运问题，忽然听到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两架国民党轰炸机怪叫着从云缝里钻了出来。一架围绕着“万坚号”盘旋几圈后，开始在“万坚号”周围投弹，炸起一根根数丈高的水柱，爆炸声震耳欲聋，浪花溅满了船板。另一架飞机俯冲扫射，掠过船杆，发出“吱吱”的怪叫声。这样轮番地投弹、扫射，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敌机又飞走了。我走上船板，这里早没有人了。我向海上看去，我们的风船分散在远离“万坚号”的海面上，交通船仍然停在离“万坚号”不远处。这时我想：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用恐吓、威胁的办法迫使救济船离开解放区，达到破坏解放区救济工作的

目的。我正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船长开普敦先生叫他的翻译匆匆忙忙下来找我，对我说：“船在这里不行了，很危险，不能再停了。停在这里就要被轰炸，必须马上走开！”

我问：“开到哪里去！”

他说：“葫芦岛。”

我又问：“你有路条吗？”

“有”。

“路条是规定开到哪里的？”

“开到解放区的。”

我反问翻译：“葫芦岛是解放区吗？”

“不是。”

“不是解放区怎么能往葫芦岛开？”

翻译神色不安地解释说：“船不能停下，一停下就要挨炸。”

我气愤地说：“是谁的飞机在轰炸？你们为什么不拍电报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国民党提出抗议？”翻译无话可答，回去了。一会儿，他又跑下来找我，急切地说：“船必须马上走开，石臼所炸死人了！”

我再问他：“到哪里去？”

翻译说：“是不是去大连？”

我说：“你去告诉你们的船长先生，除了解放区什么

地方都不能去！”翻译红着脸回去了。

不一会儿，翻译又跑下来找我，提出是不是去烟台卸货。这时我考虑到：船是不能停在这里了，再不同意到烟台，它开到敌占区就麻烦了。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船上，不怕他开不到烟台。我知道当时烟台已经第二次解放，所以我同意了。我当即写了个纸条，让交通船上的同志交给于勋忱副秘书长，说明不能在羊角沟卸货的原因，并说明为了防止美国人把船开到敌占区去，我们必须押船去烟台，所有卸船的同志都和我一起去。这时天已过午了，远处还听到飞机的声音，“万坚号”离开羊角沟向东驶去。

次日的早晨，我发现船已到老爷山，离烟台港不远了。这一带我几次坐船走过，我察觉船快进港口时，却调转方向朝东北开去。我一愣，马上派翻译去问开普敦是怎么回事。翻译告诉我：烟台市里正在轰炸，船不敢停下，一停下就要挨炸，所以等轰炸完了再进港口。我仍不放心，和熊处长他们商量好，如果船老不停地向东北开，必要时先卡他的火轮再说。我密切注视着，不到一个小时，船才又调过头来开进烟台港。

快靠近码头了，老远看到李澄之主任站在码头上向我招手。这说明渤海区党委已拍电报给他了。船一停稳，李主任走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

快休息，剩下的事给我就行了，你别管了！”直到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上岸休息，仍然参加卸船的工作。船上的物资，除一台推土机实在无法卸下外，其他物资和 37 部卡车全部卸下。我在烟台住了几天，处理完卸船后的一些事情，除留熊处长带十几部卡车帮胶东行署运了几天军鞋外，我和羊口市的同志们带着装满物资的卡车回到了渤海区。回来不久，熊处长也带车回来了。至此，我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我回渤海区行署不久，7 月 13 日接到烟台来电：蒋介石发表谈话，要封锁山东港口，遣散我上海办事处的人员，不准把救济物资运到中共解放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富兰克林先生已电请华盛顿批示。这很清楚，蒋介石公开撕毁协定，开始重点进攻解放区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救济工作已无法进行，而以蒋介石的破坏而告终。

龙口宝地 厚物载道

——东营市成立记述

杨玉珍 张月锐

1983年10月1日，我国又一新兴的石油城在黄河三角洲这块龙口宝地上诞生。从此，万里黄河有了自己的河口城市。沧海桑田，厚物载道，一颗世纪之星从这里升起。

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濒临渤海，北与天津、秦皇岛、大连遥相呼应；东与胶东半岛的西端对峙，中间形成莱州湾；西与滨州地区接壤；南与淄博市、潍坊市毗邻。全市南北纵距132公里，东西宽74公里，总面积8053平方公里。

东营市是为适应胜利油田发展和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而成立的省辖市。胜利油田的崛起，为东营市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条件。

一、矿区经济迅速发展——时代呼唤东营市的诞生

城市的产生发展是由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决定的。五十年代末，华北石油勘探处在济阳拗陷发现了良好的生油层后，国家把我国石油工业布局的又一基点引向渤海之滨的黄河三角洲，一个新型矿区城市便开始在这里孕育。

早在建国以前，山东的石油工业是一个空白。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发表了在华北平原的新华夏系沉积带内可以找到石油的创见。1955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围绕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在华北平原展开了石油勘探工作。于1961年1月，在垦利东营村附近打出了华北第8号基准井——华8井，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渤海湾地区的第一个油田——东辛油田。1962年9月23日，在东营地区打成的第二口探井营2井，获得日产原油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渤海湾地区，也是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始称“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

为了尽快在这一地区找到大油田，1964年1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在这里逐步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建设工作。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亲临

东营地区指挥会战，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任会战工委书记兼总指挥。大庆、玉门、新疆、四川等油田的石油大军纷纷会旅山东，以东营坳陷为主战场，按照会战指挥部制定的“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勘探方针，展开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经过11个月的拼搏，探明39.86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拿下胜坨油田，打出了全国第一口千吨油井——坨11井。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控制了东营坳陷的含油轮廓，并相继发现纯化、现河、平方王、滨南、尚店、八面河等9个油田。至1966年底，“九二三厂”已由原来单一的勘探单位，发展成了拥有勘探、钻井、井下作业、油田建设、油气开发、集输、石油炼制等综合性的石油矿区。形成了年产原油202万吨的生产能力，并优质快速地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条长距离、大口径输油管线——东（营）辛（店）管线。1971年6月5日，经山东省委与石油部商定，正式将“九二三厂”更名为胜利油田。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要求，国家开始对胜利油田实行原油产量包干政策，逐步建立了原油产量和主要经济指标逐级分解、层层包干的经济政策，鼓励油田利用超产分成的资金扩大勘探开发。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原油产量不断上升，到1982年底，实现年产原油1634万吨。

经过 20 年的生产实践，胜利油田不仅在生产、科技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战果，而且为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首先，石油工业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济阳坳陷复合油气藏既复杂又丰富的特征，对地下成油规律和找油气理论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勘探开发复杂地区、复杂油气藏的规律；掌握了分层注水、分层开采、防沙治沙、大泵和水力活塞泵等新的采油工艺技术。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试制成功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深井系列测井仪、千米刮刀钻头、链条抽油机和浅海钻井船等。至 1982 年底，全油田共完成了科研项目 20310 项，其中获得各类科技奖的 315 项，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科技攻关项目。其二，建立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框架。在整个黄河三角洲实现了水、电、路、讯四通。矿区供水系统已基本配套。建成了大、中、小相结合、星罗棋布的平原水库，其中设计蓄水能力达 1.15 亿立方米的全国最大的平原水库——广南水库于 1982 年底开始投入建设。油区公路建设已初步形成沟通内外的网络，初步改变了过去的区域封闭状态。油区电网和通讯网基本形成。其三，出现若干新兴城镇的雏形。到 1982 年，胜利油田已建立二级生产单位 28 个，三级生产单位 255 个，居民点 130 多个。这些生产基地和居民点，既是地域生产综合体，又是消

费市场，既推动了地下油气资源的开发，又促进了地上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并与当地农民相结合，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人口相对集中产生城市化，一座新兴石油城的诞生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人口集聚——新兴石油城东营市的成立

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胜利油田不仅在茫茫荒原上建起了钻塔林立、水电路讯“四通”的新型矿区，同时，也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在入海口第一次遇到了克星。1976年，黄河北行入海的刁口河流路严重淤积，为了保证油区安全，治黄大军实施了人工改道工程，使黄河南移清水沟流路，体现“自然力”的黄河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志掉头入海。

但是，随着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油田生产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职工队伍不断扩大，油田社会服务性工作加重；工业占地增加，费用增高；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缺乏权威性调控主体，造成资源、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的浪费。总之，这里缺少一个市级政府来行使城市行政职能，包括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协调工农关系，支持石油工业的开发建设，统筹社会生产力布局，制定和实施国土开发及城市建设规划，实现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等等。

而另一方面，处于黄河三角洲的广饶、垦利、利津三县，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力量发生了深刻变化。1982年三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9亿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三中全会前的1977年增长95.6%。但由于三县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型经济，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31.5%，亟需城市工业经济的带动，使之围绕石油工业上项目，以发展加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龙头，形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鉴于这种情况，中共胜利油田党委、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认为：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是十分必要的。于是，1982年8月22日，胜利油田党委研究、形成《关于建立东营市的请示报告》上报山东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东营市的要求，并对城市的名称、范围、性质、规模等有关问题做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全文如下：

省委、省政府：

胜利油田从一九六四年经党中央批准组织石油会战以来，已经十八年了。经过十八年的艰苦创业、顽强奋战，在黄河下游两岸的渤海之滨，建立起了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到一九八二年六月底共打各类井五千七百七十六口，进尺一千二百四十八万米，找到三十个油气田（其中已

有二十四个投入开发),探明含油气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石油地质储量十二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八十亿立方米(另有油田伴生气三百八十多亿立方米);累计为国家生产原油一亿八千二百六十万吨、天然气一百零九亿六千多万立方米;累计工业总产值一百五十七亿一千万万元;累计财政上缴一百二十六亿元,为国家基建总投资二十三亿九千万万元的五点二六倍。

在发展石油工业的同时,油田还积极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从事农副业生产。到一九八一年底,已耕种土地十五万亩,累计生产粮食三亿四千万斤、蔬菜一亿三千多万斤、油料三百多万斤、肉类五百多万斤。有近十多万名农村户口职工家属吃自产粮,基本上做到粮食自给有余。

省委、省政府和惠民地委、行署对胜利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建设,十分重视。为了更好地发展石油工业,惠民行署在胜利油田所在地设置了东营办事处,为搞好油田的工农业生产和职工家属的生活做了大量社会服务工作,为油田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随着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油田生产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职工队伍不断扩大，油田社会服务性工作负担很重。油田现有职工和家属二十四万多人，预计到本世纪末油田职工家属将达三十万人以上。由于没有统一的市政领导机构，这十几万人的生产服务、物资供应、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管理等基本上都靠油田自己来办，不仅严重地分散了油田领导的精力，而且常常因体制不顺、渠道不通、资金人力不足而使这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第二，工业占用土地不断增加。会战以来，油田征用土地矛盾非常突出，平均每年占地约八千亩（包括耕地、荒地），有的生产大队的土地几乎被征用光了。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地上、地下、工业、农业不能统筹安排、综合治理，不仅影响这个地区丰富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工农之间的矛盾不好解决，常常因土地问题出现互相扯皮甚至闹事现象，严重地阻碍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城镇建设无法统一规划。石油会战以来，胜利油田、东营办事处和垦利县都围绕东营这个中心，搞了许多基本建设，对于保证石油会战和职工、家属生产、生活需要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致使这个地区的建设十分零乱、很不合理。

胜利油田地处黄河下游入海的三角洲地带，有很多有利条件可以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 有比较丰富的油气资源。胜利油田经过十八年的勘探发展，原油产量稳中有增。根据现有地质资料分析，整个济阳拗陷和黄河入海的三角洲地带，还有广阔的勘探领域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只要努力做好工作，原油产量不仅可以稳住现在年产一千六百万吨的水平，而且在本世纪内储量和产量都还将有新的发展，特别是油田开发建设到哪里，水、电、路、讯等系统工程就要跟到哪里，这就直接为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已初建一些科研文教机构，并有一支较雄厚的技术骨干力量。在文教方面，这里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华东石油学院，有三所全国石油系统和山东重点中专——胜利油田石油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在科研方面，建立了全国石油系统测井中心——油田地球物理测井总站和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设计规划研究院、钻井采油工艺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共有科技骨干五千多人。

3. 发展农副业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①气候适中、无霜期长。全年约为一百九十天，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生长。②地广人稀，有广阔的土地

资源，人均占有耕地2.6亩。另外，黄河口每年还向外造地五十平方公里。如把水利工程建设搞上去，耕地还可增加。③有一百六十二公里的海岸线、九百平方公里的滩涂面积，黄河流经此地达一百多公里，发展水产很有条件。①黄河从油田中心穿过，水利资源十分丰富，交通发达，铁路、公路、水路都具备，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要妥善解决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发挥这个地区的优势，逐步把这个地区建设成为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及其相应的农、牧、副业生产基地、科学实验基地和适应四化需要的人才培训基地。原惠民地区办事处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建议在胜利油田所在地区建立一个直属省领导的市政府。

现将建市的有关问题报告如下：

一、市的名称和范围。鉴于胜利油田主要油区集中在垦利县、利津县以及与之相邻的广饶县、沾化县、博兴县的部分边界地区，并在垦利县的东营地区已初步形成有十几万人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营”这个地名，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全国皆知，故建议市的名称叫“东营”。（市的管辖范围从略）

二、市的性质和任务。建立东营市，主要是为了适应石油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发挥石油工业的潜力，更好地促进当地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迅速改变这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东营市是以石油工业为主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城市，是我国重要采掘工业和科学教育基地之一。整个建设必须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目标出发。做到油田建设、矿区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统一规划，田、路、林、渠、村、镇、塘、池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本着相对集中、适当分散的原则，不搞集中的城市，搞一城多镇，大、中、小结合，建设千户集镇，尽量使人口均衡分布。在适应石油工业开发建设的前提下，把重点放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上。狠抓兴修水利，根治盐碱，使渤海之滨的荒碱滩，变为绿色王国、鱼米之乡，真正把这个地区建设成为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

三、关于区划问题。（从略）

四、市政机构设置问题。总的要本着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效能的原则，既要避免政企合一中以企代政的偏向，又要避免政府和企业各搞一套、互

相扯皮的现象。为此我们建议东营市只设一个党委，既是油田党委，又是东营市委。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行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政府和企业两套班子，分署办公，各负其责。各职能部门的设置，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密切的配合，需分则分，能合则合，力求精干，避免重复。干部的配备，主要靠油田和本地区自己调剂解决，但考虑到需要新增加四个区的编制和政府工作的特点，请省委酌情支援一些对于农业、商业、财贸等方面的领导骨干。

五、工、农业生产安排问题。（从略）

中共胜利油田委员会

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同时，惠民地区（现滨州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同意垦利等县、社划为东营的报告》，垦利、利津两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关于同意划归东营市的报告、决议》，广饶、沾化、博兴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关于同意将部分公社划归东营市的报告、决议》等文件先后上报省委、省政府，加快了东营市成立的步伐。

山东省委、省政府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一致认为：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可以统一

规划和利用这个地区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石油工业带动农业的巨大力量，合理开发利用这里的丰富资源，加快改变这个地区贫困面貌的步伐，保证石油工业的顺利发展。因之，山东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鲁政发（1982）103号文《关于建立东营市的请示报告》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同年十一月十日以（1982）国函字241号文件，正式批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

山东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请示悉。同意设立东营市，由省直接领导。市区范围包括利津县的六合公社；垦利县黄河下游的孤岛地区。史口、辛店公社，胜坨公社的茶坡大队，高盖公社的辛镇、官屋、孙家、张营、王营、韩家六个大队；广饶县的牛庄、油郭、辛集、六户四个公社；沾化县的新户、四扣、义和、太平四个公社；博兴县的龙居公社和乔庄公社的老于、王家、刘家三个大队。分设东营、河口、牛庄三个区。惠民地区的垦利、利津两县划归东营市领导。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申请工作一告结束，随即展开了紧张的建市筹备工作。

1983年1月11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东营市的批示，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成立东营市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李晔任组长；成师农、任学忠、杨再文任副组长；欧

阳义、张文彦、马茂信、梁树为成员；袁青任筹备小组秘书长。

4月4日，东营市筹备小组副组长成师农、杨再文；成员欧阳义、张文彦、马茂信、梁树等一行17人，赴大庆参观考察，学习机构设置、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6月24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则同意东营市筹备小组所报的机构设置方案：一、市委工作部门设办公室、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村工作委员会；二、市政府工作部门设市政府办公室（兼侨务工作）、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民政局、公安局、劳动人事局等24个直属机构。

10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中共东营市委领导班子配备方案。书记：李晔；副书记：成师农、杨再文、张文彦；常委：欧阳义、丁恩海、赵以政。省委同意提名成师农担任东营市市长；欧阳义、李启万、马茂信、刘恽、梁树担任副市长。后市委、市政府遂确定以10月1日为东营市成立纪念日。1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命成师农为东营市代市长。

1983年10月15日，天气晴和，万里无云，东营市成立庆祝大会在胜利会场隆重举行。市和油田近两千人

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成师农代市长主持，市委书记李晔作了题为《树立雄心壮志，为创造东营市的美好未来而奋斗》的报告。省委、省政府、济南军区、石油部的有关领导以及惠民（现滨州）、淄博、潍坊、新华社、大众日报社、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等地市、单位的负责人莅临大会并致贺词。庆祝大会结束后，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中国共产党东营市委员会”、“东营市人民政府”两块大牌，分别挂在东营市市委、市政府办公临时所在地——胜利油田第三招待所（现胜利宾馆）西楼大厅两侧。

东营市的诞生，促进了黄河三角洲石油工业的发展，对于改变我国能源构成和燃料工业、化工业的布局，对于推动区域综合开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我国最后一块待开发三角洲的发展繁荣，促进山东经济的振兴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以后，油田地方紧密团结，共同奋战，原油产量逐年增加，出现了“胜利中兴”的新局面。

三、“绘事以众色成纹，蜜蜂以兼采为味”^① —— 东营市城市选址方案的确定

城市一旦诞生，就成为带动一个区域经济社会进一

^① 李晔同志《关于东营市城市选点和建设规划方案（草案）》的批示。

步发展的核心。而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城市的性质、城镇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以及城市发展的适度规模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并据以进行建设与管理。这一点对新兴的城市来说更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东营市成立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原石油部、东营市委、市政府、胜利油田党委及油田会战指挥部对此均十分重视，尤其是对首先遇到的城市选址问题更是进行了认真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五种选择方案。

这五种方案分别是：

I 号方案：该方案的选址地点是在现东营区哨头村以北、六干河南、距现基地西北 5 公里处。该方案的有利因素是：1. 地面标高（黄海高程，下同）7 米，地势高，不受海潮威胁；2. 土质较好，易绿化。不利因素是：1. 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上，东为已开发的营 14 断块（有营 14 井），南有营 11 井，处在油区地带，会造成压油；2. 建设城市地域面积小，只有 4 平方公里；3. 周围村庄多，容易造成与民争地。

II 号方案：该方案的选址地点在耿井以北、现基地南 4 公里处。该方案的有利条件是：1. 地面标高 5 米左右，海拔较高，基本不受海潮威胁；2. 离基地较近，建设投资不大。不利条件是：1. 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

上，属沙三下砂体推测含油范围。其北为营 36 井，南为河 100 井，地下含油面积 4 平方公里，会造成压油；2. 建设地域面积不大，只有 5 平方公里；3. 周围有村庄，会造成与民争地。

Ⅲ号方案：该方案选址地点在万泉庄北，现基地南 6 公里处。有利方面是：1. 地势较高，标高 5 米左右，基本不受海潮威胁；2. 离基地较近，土质较好，易绿化。不利方面是：1. 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南缘，属沙二、沙三含油构造，南有河 78 井、河 79 井，会造成压油；2. 地域建设面积更小，只有 3 平方公里；3. 其北为油田已改造的良田，南方为万泉庄，造成与民争地。

Ⅳ号方案：该方案选址地点在辛镇附近，现基地东南 10 公里处。有利条件是建市面积比前三方案有所增大，达 10 平方公里，而且地势也较高，不受海潮威胁；不利方面是也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地带，地下储油面积达 12 平方公里，造成压油；辛镇村庄处其中，不利于规划建设。

Ⅴ号方案：该方案选址地点在莱州湾畔，周围无村庄，建设地域面积大；紧临渤海，符合将东营市发展成为海滨旅游城市的目的；且远离东营凹陷地带，不会造成压油。但是该地地势太低，最低处地面标高近 0.5 米，很容易遭受海潮威胁，而且距基地太远，不能形成集合

中心。

显然，上述五个方案，从某一角度讲都有其选中的有利条件，但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选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正确的政策应当既能满足现实紧迫需要，又适应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要求，并符合东营市做为石油矿区城市的布局特点和由矿区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化的客观规律。于是，在前几个方案的基础上，东营市又请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胡兆量为首的专家组进行了综合考察论证，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专家组提出了在沙营东、西城东南 15 公里处作为新城址在方案。专家们认为，在这里建市有四个有利条件；第一，有利于油田的开发建设。根据当今石油城市的经验教训，油区城市建设要坚持“地上服从地下，以不压油为首要原则”。新城址地处“牛庄凹陷东北斜坡上，理论分析油气储藏不宜富集”。而已形成的西城和其他选址方案的选址地点都“处在了油藏比较富集的中央隆起带上”。避开这一油藏富集地区建市，宜于解决石油开发和城市建设的矛盾。第二，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工业、交通和市场核心，但这一现代化大生产的核心与自然经济形成的市场核心不同，它需要有开阔的地域作为发展空间。沙营东方案符合这一要求。第三，有利于利用已形成的生产力布局条件。这

里北有辛安水库，东有广利河港和广南水库，广利河南切本区而过，这为新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供排水系统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本区周围已形成东安镇、稻香村、广利镇、莱州镇、八分场等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在这里建市能尽快形成规模，方便油田职工的生活聚居。第四，有利于带动沿海地区的开发。这里土地平坦广阔，不与民争地，宜于建设运输干线和布置建设项目，从而有利于加强同市域各地的联系，推动黄河三角洲东部地区的开发建设。

这一方案提出后，即受到多方关注，东营市人民政府和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将此方案作为首选方案以东政发（1983）40号文《关于东营市城市选点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报省府和石油部，并于1983年12月28日在省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上由市政府秘书长袁青做了专题汇报，省政府常务会议对此做了批复，原则同意了东营市的选点方案。批文如下：

东营市人民政府：

现将第26次省府常务会议（1983.12.28）决定有关你们的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听取了东营市政府秘书长袁青同志关于东营市城建选点问题的汇报。

东营市成立后，市委、市政府会同省规划组对

城建选点问题，先后选择了四、五个地址作比较。本着地上服从地下，以不压油为主和兼顾少占良田、少搬迁村庄的原则，建设以石油矿区为特征、一城多镇、敞开式的中小型城市。根据上述原则，最后选定了东营以东15公里处、沙营大队附近100多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带，作为东城建设基地，原东营市作为西城。东城选点的位置较好，紧靠准备建设的广利码头，广利河从市中心穿过，公路干线经过市区两侧。此处地域开阔，水陆交通方便。不足之处是地势较低（海拔高程为3.6—4.1米），受内涝和海潮的影响很大，要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并要通过人工挖河、造湖，抬高地面加以弥补。

会议原则同意东营市上述选点方案。认为东营市城建选点的原则是可行的。指出：（一）东营市的城建规划要和整个油田的建设相适应。提出的依托西城，建设东城，建好东城，不放弃西城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二）对拟选的东城地址的弱点不能忽视。对低洼、内涝、海潮、黄河尾闾摆动，以及污染、绿化等方面的问题，要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充分的论证。要注意吸收有关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尤其是专家们的意见。（三）必须把基地抬高到海拔5米以上，方可动工兴建，既要防止海潮、内涝侵袭，

又能搞好植树绿化，这是百年大计。（四）东营市的建设是平地而起，用钱、用料很多。水、电、路、讯、挖土抬高地面等工程，要纳入油田建设规划，基本建设计划指标和资金也要由油田承担。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的建设经费，可由省里考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遵照省府常务会议决定，1984年5月，山东省政府组成的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规划领导小组一行50余人，由马世忠副省长带队赴东营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调查研究。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进一步确立了胡兆量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关于在沙营东建市的方案，同时也明确落实了东城的性质和建设标准问题：“东城的性质：一致意见应该建设成为东营市的政治中心、油田生产指挥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东城的建设标准问题，可以较国家规定标准略宽一些”。随之，在省规划部门的帮助下，1985年2月完成了《东营市东城总体规划》。同年7月，在省政府第四会议室召开了关于东营市东城总体规划审批会议。李启万副市长带领东营市和胜利油田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省府各委、厅、局的负责同志对东城总体规划进行了讨论研究。总的认为，东城的总体规划是好的，是可行的，并结合自己的业务工作，对东城总体规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7月26日，省政府（85）鲁政函131号文件批复了东城总体规划。东营市中心城的选址，完成了艰难的抉择，为黄河三角洲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布局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

四、城市总体规划——东营市城市建设的蓝图

（一）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尽管城市选址问题已经解决，并制定了东城建设规划，但由于领导层在规划的具体实施方面仍存在分歧，从而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决策，东城建设工程迟迟未能动工。1986年11月，市委、市政府由胜利油田第三招待所（现胜利宾馆）迁至东城市政府招待所办公。

而在此期间，东营市经济有了较大幅度增长。198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86558万元，是1983年建市时的1.3倍；石油工业不断发展，石油产量稳中有增，逐渐成为国家重点能源基地和财政收入的支柱。同时，国家《2000年全国城镇发展布局战略要点》，已把东营市列为山东省的大城市之一，与青岛、济南两个特大型城市和其他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全省城市分级体系，以推动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及时进行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科学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从而迈出坚实的城市建设步伐，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效益，以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988年3月，新当选的东营市市长李殿魁同志，决定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该院院长邹德慈率9位专家在东营市建委、胜利油田规划处等单位的配合下，从东营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历时五个月，于1988年8月完成《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

《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指出，东营市正面临着从单一矿区经济向多元化产业的城市型综合经济的转化，城市总体规划面临着由矿区建设向城市建设的过渡。为此，应逐步改变黄河三角洲城镇布局分散的特点，采用培养增长极核的模式，发挥中心城的聚集效益。从而明确了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东营市为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类建设项目的对策与建议，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解决了长期困扰东营市建设的关键问题，确定了今后城市建设重点是新的市址——东城，城市建设步伐迅速加快。1989年4月底，东城建设一期工程竣工并交付使用，市委、市政府由招待所迁入了新址办公。自此真正解决了“东营市在哪里”的问题。

（二）《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根据《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结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1988年9月再次接受东营市政府委托，并依据原东城规划，进行了全面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历时两年，于1990年10月完成。10月23日至26日，东营市邀请全国各地28名城市规划专家在东营市召开了评审会，对规划进行讨论评审，最后形成了《关于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评审意见》。《意见》认为：《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导思想明确、客观，材料完备、齐全，内容详实，依据充足，分析论证较透彻。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是科学、先进的，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关于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有关内容的深度要求。“确立了有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分片组团式结构的城市布局形式，由此妥善解决了油矿城市规划建设中压油、分散、经济单一、难以集约成城市的矛盾，创立了我国新兴石油城市具有开放型、多元经济综合性特点的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5月9日，东营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规划草案。同年8月1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91）鲁政函88号文件正式予以批复：

东营市人民政府：

省政府原则同意你市报送的城市总体规划。现批复如下：

东营市是以发展石油、石油化工和盐化工为主的综合型的新兴石油工业城市，到二〇一〇年总人口41万人，用地57平方公里。规划区601平方公里。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由中心城和河口区两部分组成。

中心城又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其发展原则是：重点发展东城，改造完善西城，走以东城为中心组团式城市建设的路子。西城规划以发展机械、电子工业为主，建成为油田服务的生产基地。到二〇一〇年为16万人，用地25平方公里。规划期原则上不再新上工业项目，重点抓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市级行政单位要逐步迁入东城，并调整扩大居住用地比重。城市道路共分3级，主干道红线宽30至50米，建设好外环路，远期在德东铁路西侧修建快速过境干道。东城是全市政治、文化中心，规划以发展石化、纺织、电子、食品工业为主。到二〇一〇年为15万人，用地17平方公里。原则上以黄河路为主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并由规划开辟的水系将城区自然分成东、中、西三个区域。近期重点建设中区。工业发展布局为：西区以发展机械加

工业为主，东区以发展电子、仪表工业为主，中区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市级货物中转仓库在规划的铁路站南北两侧建设，生活性仓库在广利河北岸建设。城市道路共分3级，主干道红线宽50米，兖州路与黄河路相交处设市级广场。铁路从城西通过，车站广场在黄河路西端。在城东北部和中部建设两个综合性公园。

河口区是黄河三角洲北部油田开发的重要后方基地，到二〇一〇年为10万人，用地15平方公里。原则上以河口采油厂和区政府为中心，逐步向南发展，以商场为纵轴，建设大型综合商业、服务业、贸易、金融、文化娱乐等设施。以中心路为纵轴，建设全区和油田的主要行政办公设施。西部发展居民区，西南部发展工业区，东部设置仓储及交通设施。规划城市主干道红线宽50米。

东营市总体规划中的专业规划，如城市风貌、环境保护、电网规划等尚需进一步论证。

东营市土地盐碱化、植被少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要十分重视对盐碱的治理和城市绿化工作，要切实搞好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油、气污染。要总结经验，强化治理措施。

希望你市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对规划

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的统一管理，保证规划的实施。总体规划批复要求补充后，报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备案。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

从此，东营市有了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城市建设蓝图，黄河三角洲城市建设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简介

《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包括中心城区（包括河口区规划）及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两部分，规划年限为 1989—2010 年。

1. 中心城总体规划。中心城是东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市委、市政府、油田机关、党委的办公所在地，担负着关系全市与发展的重要职能。从全市范围来看，其位置正处于东营市的几何中心，与最北端的刁口镇和最南端的广饶镇距离大致相等，为 60—70 公里；与西部边界及东部海岸线的距离也基本相当，为 20 公里左右，这种适中的区位使中心城具有广阔的辐射面，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其规划范围：西以辛店镇行政区界和油郭乡姜王村为界；东以广利镇为界；南以淮河路向南 2 公里为界；北以辛店镇行政界和胜利镇井下丰收村为界，并包括规划确定的东营飞机场、辛安、广南、广北水库、广利港和东营区到垦利黄河大

桥的泰山路、青州路两侧控制区，总面积 496 平方公里。

中心城由东城和西城组成，空间布局结构规划为分片组团式结构，这种有机分散，相对集中的分片组团式结构既适应了中心城规划范围内石油资源的特点，避免了城市建设的压油现象；又便于城市分散分片逐步建设，发展方向具有可选择性，适合城市动态发展的要求。

根据培养增长极核的发展模式，中心城的建设实行重点发展的对策，其发展原则是：“重点发展东城，改造完善西城，走以东城为中心组团式城市建设的路子”。按照这一原则，在资金的地域分配上，将集中围绕东城投资。在建设项目选择上尽量发挥石油、石油化工的优势和多种资源优势，利用中心城的良好投资环境，逐步开发多种产业，使中心城的实力增长主要依靠东城的发展来实现。

西城现为多功能的油田生产服务基地，担负着油田生产、指挥、科研、后勤供应等多种职能，也是全市的客货运输集散地和重要交通枢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和健全的城建管理体制，城市建设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城区结构功能分区不明确，城市用地布局混乱。因此，规划的西城建设重在“改造发展，逐步完善”，即按照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运用规划管理、驾驭城市的发展，分期改造，使其逐步完善提高。

2. 河口区城市总体规划。河口区是区政府所在地，是黄河三角洲北部油田开发的重点后方基地。其规划范围是：东起净化站；西到李坨村以西 500 米；南起河二路以南 550 米；北到八吕村，以及规划确定的孤河、孤北、五号桩、净化站水库，黄河、刁口港控制区。城市规划区总面积 105 平方公里。规划布局是以现状中心路为横轴，以现状商场街为纵轴，以河口采油厂及区政府为中心，向南展开，采取紧凑、集中的布局原则，形成组团式布局结构。

3.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东营市城镇的发展，经历了“逐水草而居”和“随矿建镇”的过程，城镇布局过于分散，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能满足居民基本要求的“门槛规模”。因此，对城镇体系规划是采用了较高速度的城镇人口集聚与高水平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统一布局，相对集中，形成以相当规模中心城和次中心城为核心的市域城镇体系，以城镇化的适度发展支持和推动全市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构想的框架中，《总体规划》将市域城镇具体规划为四个组群：

以广饶县城为中心，建成东营市南部城市组群。广饶镇是这个组群的中心，是广饶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and 东营南部地区工业集中地。结合发展大王镇、稻

庄镇、花官镇、码头镇、广北镇、清河镇，分别形成工业、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盐业基地。

以东城、西城为中心，建成中部组群，结合垦利县城，积极推进中心城产业结构的综合化，使中心城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形成以石油化工、盐化工、纺织、机电、食品、建材为主的工业结构体系。

以利津县为中心，建成西部城市组群。以利津镇为中心依托，发展盐窝镇、陈庄镇、罗家镇、刁口镇，分别形成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水产养殖业基地。

以河口、仙河镇为中心，构成双星座格局，建立北部组群。结合义和、新户、孤岛镇、军马场，发展采油、港口、水产加工、造纸等产业，并使之成为北部海上油田开发的重要基地。

以上四大组群，以东营市的中心城为中心，相互依托，相互呼应。各个组群又都有其中心城镇，使组群间、城镇间形成了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多层次的城镇发展格局。

几年来建设的实践已证明，《城市总体规划》是先进地、科学地，符合东营市城市发展客观规划的基本要求，保证了城市建设得以正确、合理、有条不紊地进行。

东营市的诞生和规划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今，它正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乘

胜前进。人们坚信，到二十一世纪，这座具有综合功能的崭新的工业港口城市，定会更加光彩夺目。

※ ※

参 阅 文 献

1. 费孝通、钱伟长主编：《区域发展战略研究·黄河三角洲——东营篇》，群言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2. 东营市人民政府、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关于东营市城市选点问题的请示汇报》，东政发（1983）40 号文，1983 年 12 月 19 日。

3. 《黄河三角洲规划领导小组赴东营市工作情况汇报》，1984 年 5 月 23 日。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1988 年 8 月版。

5. 李殿魁：《东营市的兴起和发展》，载《城市规划》1989 年第 2 期。

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东营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 年 10 月版。

黄河下游南展宽工程

史兴华

从滨州沿黄河右岸大坝东行，一入东营市，就有一股大坝蜿蜒东北而去，这就是建国以来黄河史上有名的黄河下游南展宽工程。该工程艰巨、复杂，历时8年。又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施工的领导、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当时在南展区工作，仅据所见所闻和有关记载整理如下，望知情者补正。

一、南展工程兴建缘由

黄河流入东营市，陡然来了个近90度的左转弯，折向东北，进入了长达30公里的“窄胡同”。这段河道，南起东营区龙居乡的麻湾，北至利津县的王庄，河道堤距一般为1公里左右，最窄处的小李险工段仅有460米。夏季，常是洪水涌入“窄胡同”，涨满河槽，两堤吃紧，时有险情；冬天，一旦冰凌卡塞，水位陡涨（1955年冬卡凌刘家夹河21小时水位涨高4.29米），险情更大。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段河道从筑官堤起至国民党在河南花

园口扒口改道夺淮入海（1883—1938）的 55 年间，有 23 个年份决溢成灾，计决口 70 处，80 个口门。过去决溢成灾，堤防单薄，管理不善，人为和自然原因都有。河道狭窄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自从黄河的治理权回到人民手中，党和政府虽尽了最大努力，建国初期，这河段的左岸还发生过两次决口（1951 年 3 月 1 日利津王庄，1955 年 1 月 29 日利津五庄）。这里老百姓过去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说。

1961 年后，在黄河右岸的东营一带探明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国家石油部提出了“确保右岸堤防”的议题，1968 年黄河左岸又探明今滨南油田，石油部随之又提出“两岸必须一齐确保”的要求。在两岸一齐确保方针指导下，经专家论证，提出了展宽“窄胡同”的意向。其间，是南展、北展、还是南北都展？提出了诸多方案。当然也拖了一段时间。直到 1970 年前，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会同山东省黄河河务局、胜利油田的负责人进行实地勘察、分析比较后才确定了“南展、北分、东大堤”等近期河口治理意见。随之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组织黄河修防处等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勘查规划队，在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勘测规划的基础上，提出规划报告。于 1971 年 9 月水电部报经国家计委批准兴建黄河南展宽工程。

黄河南展宽工程主旨是：以防凌防洪为主，如遇洪水或卡凌，开闸分水，确保油田生产开发和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其次是放淤灌溉，改变展区生产条件。展宽工程涉及博兴的乔庄、龙居（现属东营区），垦利县的董集、辛庄、宁海等6个公社71个大队，面积123.3平方公里。平均展宽3.5公里，近期库容3.27亿立方米。整个工程有：变单式河道为复式河道；修筑展宽大堤；原临河大堤兴建麻湾、曹店分凌分洪闸和章邱屋子泄水闸；展宽堤上兴建大孙、清户、王营、胜干等5处排灌闸；修筑展区村庄房台38个，搬迁安置人口4.89万人；调整展区内外排灌系统。

二、工程组织实施

1971—1978年为工程集中建设阶段。1971年10月动工，组建了山东省惠民地区黄河南展宽工程指挥部，先后由张汝淮、刘洪彬任指挥，李洪兴、褚衍生任政委，王占奎、崔纪明及军代表李大川、綦玉泽任副指挥，王锡栋作为工程负责人参加了施工。指挥部下设政工、后勤、工程、办事、迁占5个组。各参加施工县均建立民兵施工团。

整个施工过程由惠民地区所属11个县和农建一师三团的民工及山东省水利厅安装队、山东黄河河务局安

装队、黑龙江混江工程局安装队、胜利油田运输队、昌潍和惠民地区水利安装队、惠民地区水利专业队及省河务局，微山、菏泽、惠民等黄河系统的干部工人计 24.6 万人次先后参与施工。1978 年底完成了主体工程。总投资 5252.09 万元。

(一) 南展堤工程。自博兴县老于家村（今属东营区）皇坝接临黄堤起至垦利县西冯与临黄堤相接止，总长 38.165 公里，设计标准按艾山 1962 年 13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相应水位超高 2.1 米，堤顶起点高程 19.39 米，终点高程 14.81 米，纵比降 1.185‰，顶宽 7 米，临背边坡 1:3，堤脚外临背柳荫地宽各 10 米。

1971 年冬至 1972 年冬，由邹平、桓台、高青、博兴、垦利、广饶、利津 7 县调集劳力 107348 人次，分三期施工，第一期 1971 年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出工 43934 人，完成土方 438.02 万立方米；第二期 1972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16 日出工，41189 人，完成土方 260.21 万立方米；第三期 1972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29 日出工 22225 人，完成土方 172.52 万立方米。用工 398.58 万工日，平均每基本工日完成 1.72 个定额。

南展堤永久占地 3627 亩，施工取土挖毁土地 14320 亩，征购赔偿费支付由地区指挥部负责与县、社密切配合直接结算到大队（村）。

这样浩大的土方工程，基本上是靠人工肩挑、人抬、车子推完成的。

(二) 麻湾分凌分洪闸。麻湾分凌分洪闸位于展宽区上端的临河堤上，为桩基开敞式闸型，6孔，每孔净宽30米，闸底高程13米，设计防洪水位17米，分洪流量为2350立方米/秒，分凌流量1640立方米/秒。1972年10月9日开工，以惠民修防处为主组成建闸指挥所，由张玉田任指挥，龙于江为工程负责人，由博兴县3000名民工和山东省水利安装队、惠民地区水利安装队组成施工队伍，于1974年10月竣工。

(三) 曹店分洪放淤闸。曹店分洪放淤闸位于临河堤打渔张险工段，为桩基开敞式型，钢筋水泥结构，5孔，每孔净宽12米，闸底高程10.7米，设计防洪水位15.7米，分洪流量为1090立方米/秒。1971年10月26日开工，以惠民修防处为主组成建闸指挥所，由司继彦为指挥，陈教国为工程负责人。由昌潍地区水利安装队，垦利、博兴两县民工和邹平、桓台两县石工组成施工队伍。施工高峰期达4000人，1973年4月竣工（此闸因设计标准不符合要求于1982年废）。

(四) 展区村庄房台工程。为解决展区群众定居，建房台38个（仅龙居乡14个），31个建在临河堤外侧，7个建在展宽堤外。有35个房台工程是人工修筑，由邹平、

桓台、高青、博兴、垦利、利津、滨县、沾化、阳信、惠民、广饶等县和惠民地区水利专业队出工 12 万人，自 1972 年动工，1977 年底基本完成。共动土方 1233 万立方米。另有 3 个靠近主河道的房台，是在河中设吸泥船提沙淤筑，同期完成。38 个房台总面积 328 万平方米，永久性占地 4265 亩，挖压土地 19711 亩，共计土方 1859.43 万立方米，投资 1875.79 万元。

三、组织展区群众搬迁

自 1975 年始，博兴、垦利两县有关公社均成立搬迁组，负责所辖村庄群众旧房拆迁和新房建设工作。

展宽河道内有当时博兴的乔庄、龙居和垦利县的董集、辛庄、宁海等公社 83 个自然村，48976 口居民。修筑村房台时，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和在外职工离、退休后安置等因素，按 1973 年麦季实有人数再增 15%，作为计划安置人口数，按每人 45 平方米（包括集体房屋、街道面积）安排。1977 年房台基本完成后，交付使用。部分群众陆续在新房台建房居住，至 1979 年 6 月底，80% 已搬新居。是年汛期，展区群众迫切要求放淤改良展宽河道的土地，经中共惠民地委批准，启用麻湾分凌分洪闸，进行全展区大放淤，恰遇河枯水断流，引不出水，大放淤未成，但促成了搬迁任务的完成。

展宽区内共计搬迁房屋 80142 间（其中公共房屋 915 间），房屋搬迁费按国家原计划规定每间正房（人居屋）国家补助 130 元，粮食指标 60 斤、煤 60 斤、木材 0.1 立方米。1980 年底最终核实，国家实际共支付房屋拆迁费（包括附属设施）1079.84 万元，粮食指标 432.93 万斤，煤 1490 吨，木材 2981.5 立方米。

为了黄河的安危，为了黄河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胜利油田的生产、建设，展区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始部分村庄是由集体组织，统一旧屋拆除，砖瓦木料作价再统一盖房，按人口居住，所用物料新旧房折算互补，这对当时无劳力的四属五保户是大有益处，但因量大面广，拆迁时间冗长又有“平调风”的影响，最后结算，造成了问题难以解决。后期除公共房屋的拆迁外，群众的房屋由各户自行拆迁。那时各户运输工具很少，拆除的砖瓦木料，全是车推牛拉，一点一点地送上 6 米高的房台。新房绝对按应分的面积盖。房屋的高矮、宽窄、砖基高度统一标准，墙全部是土坯砌（后期要求放松部分是砖石结构）。展区内多是沙地，挖下一米左右才是粘土，水又不方便，脱一间屋的坯，费上若干天的气力。修房盖屋本不是一家人能办得了的事，可全村人都搬迁，谁能帮谁？只有到展区外求亲告友。旧房拆除了，新房未建起来，只好临时打干棚、住地屋，遇

是苦不堪言。俗语说：“搬家三年穷”，各户经济上不同程度的损失就难估算了。在那段时间里，展区的几万人民可说是在艰辛和愁苦里度过的。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奉献精神，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东营区政协供稿)

主 编:张玉池
副 主 编:贾林志
编 辑:刘 晖
张宝德

封面设计:吕希臻

封面篆刻:刘金保

东营文史资料

政协山东省东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东营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印制

850×1168 32开本

东准印〈1994〉第9号

工本费:10.00元